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

2012年第2期 总第6期



- ◎ 贝文力老师访谈录
- ◎ 苏联学家布热津斯基：思想、评价及启示
- ◎ “古希腊思想地图”专题
- ◎ 事发黄岩岛—聚焦南海，中国如何“走向海洋”？

靡不有初，寤志有终。

冯绍雷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与《闻道》学子共勉

林礼云

2011年3月10日

闻道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2012年6月



S A I A S

主 编： 吴途勇 尹 亮
副主编： 叶小娇 李 洋 孟维瞻 曾乔圆
编 辑： 陈安龙 崔 攀 王志航 武亚宁
许子兰 杨 茗 章航翔 周生升
朱永璋 孙 超 朱永福

封面设计：章航翔 崔 攀 朱永璋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
理科大楼A座410室

邮编：200062

电子邮箱：ggwendao@gmail.com

网址：<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卷首语

从文字到思想，打开思想可能的空间

吴途勇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但常常以道自任者，未必能闻道，更难以贯之。我们所能者，学思而已，学思之间进行思想操练，自然闻道。可思想能力并非轻易能得到。正如海德格尔在《什么叫思想？》一文中所云，“就人具有思想的可能性而言，人是能思想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尚未保证我们真的能够思想”。

思想未必能用文字完整准确表述，但文字肯定是帮助思想能力成长的最重要工具。放眼当下，在市场机制和压力型体制共同驱使下的学术生产机制中，已经很难容下思想，我们身在大学也经历了去圣化过程，往往也难以提供思想练习之平台。虽如此，我们仍要用文字以最大可能打开思想之空间，实现从文字到思想的转变。

从文字到思想，我们不仅要关注自我及身边的人与事，更要放眼寰球，具有时代与历史眼光。我们或许遗忘过世界，但世界从未遗忘我们，这条中国史之教训，不可谓不深！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不可能置个人于世界之外、置中国于世界潮流之外。唯有以世界的视野，才能理解自身，把握当代与未来。唯有扎根现实，与时代同行，学术思想之生命力才能显现。

从文字到思想，我们要凝视经典。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她为一种可欲之价值而存在。经典之选择范围不能局限于某时、某地、某人及某部作品，概言之，经典虽少，但古今中西皆有之。经典的恒久魅力，在于凝视。经典始终凝视真理和永恒价值，凝视困扰人类思想的不朽问题。凝视本身也是一种可贵的精神价值，没有凝视就没有思想。但凝视绝非闭门造车，凝视的内在价值要求我们关注单个人及人类的境况。凝视经典也是为了回应今人今事而进行的思想对话。

从文字到思想，需要有多样化的形式、兼容并包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胸怀。规范的学术研究、自由的文字表达、酣畅的直抒胸臆，均应有自己的位置，而绝非定于一尊。宽容是思想成长之理念支撑。但同时亦要有标准和取舍，为文必言之有物，切时切己，最重要是有所发，人读之有所得，如此方可取；滥竽充数，行文潦草，嚼之无味，则必不可取。

从文字到思想，最重要的是自由与独立。“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学术思想研究之可能端赖于此，应为我们持有并始终坚持。



道不遠人，遠人
非道也。

姜洪 二〇二二年五月





卷首语

从文字到思想，打开思想可能的空间/吴途勇

学人访谈

贝文力老师访谈录 1

国际问题研究

苏联学家布热津斯基：思想、评价及启示/郭金月 13

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文化因素解读/李沛 40

多元化与国际化：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邹磊 53

学术随笔

“古希腊思想地图”专题/俞岚等 64

“国际法古典理论：正义战争”专题/朱承璋等 79

天下

事发黄岩岛——聚焦南海，中国如何“走向海洋”？ 89

话语·幽默 107

流年

“未成曲调”也有情/崔攀 109

陌上花又开/章咏 112

专栏

英国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与反英雄形象/张肖肖 114

心灵的漂泊与刻写：语言·难以超越/姜边 118

音乐乱想/朱承璋 124

埋葬理想的青春——《阳光灿烂的日子》观后感/陈安龙 127

院系来音

专题：“中国——白俄罗斯关系二十年”研讨会 130

院外播报 135



“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里边，俄罗斯这朵花是很独特的，很吸引人……”

贝文力老师访谈录

【编者按】 这是一位三尺讲台上的表演者，二百人的课堂常常爆满；他也曾活跃在外交舞台，在欧洲“中心”施展才华；他流连于普希金的诗歌、乌兰诺娃的舞蹈以及《庞贝城的末日》，偶尔漫步于阿尔巴特大街、涅瓦河边；他听老柴，偶尔的偶尔，还喝点伏特加。这是一位温润的上海男人——贝文力老师。



《闻道》：贝老师，我们见过您说俄语很流利。听说您从小学就开始学俄语，那您学俄语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素影响您学习这么一门语言？

贝：首先，十分感谢你们的采访。流利地说俄语，一直是我努力的目标。其实，外语是否熟悉流利，更多是相对的。我在自己较为熟悉的文化、艺术、外交等领域，表达相对好一点。但如果来一个化工企业代表团，要交流的话，我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外语水准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

第二，我觉得如果真要去学一门语言的话，就应该把它学好。我是从小学开始学俄语的。学俄语完全是偶然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学英语。但我们这一届，到四年级开始学外语的时候，被通知说要学俄语。

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当时所谓的“两条腿走路”。大概是 1973 年、1974 年，当时要恢复生产、恢复和整顿教育，而且，光是一种外语——英语，不够跟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当时就提出外语教学“要两条腿走路”，就是说有英语又有其他语种包括俄语。

另外一个因素，是考虑到当时的一些中小学俄语老师的工作安排。“文革”的时候，只要跟俄苏有关的，都遭否定，甚至连上海的普希金的纪念碑都被拆毁了。一个世界公认的诗人，一个在 1837 年就已离开人世的俄罗斯诗人，到了 1966 年开始的“文革”，他的纪念碑也未能幸免。你可以想象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到了 1973、1974 年，在恢复整顿的背景下，要对一些原来的俄语老师的工作做些安排。我们就是在那时开始学习俄语的。那是“文革”后期，大家对学习不是很重视。俄语教学，从规范角度来讲也不到位。学校里边，大家俄语学得并不认真，但是我还是挺感兴趣的，觉得蛮合适学俄语的。

到入高中以后，“文革”结束了，一下子，整个社会风气、学习风气，都不一样了。当时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学知识被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对外语也非常重视。那时，大家重视的是英语。中苏关系还没有恢复，因此大家都转而去学英语了，留下学俄语的就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印象特别深的是：初中还是全班学俄语，到了高中就只有 6 个同学，上外语课时，就要分班，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地说，当时我们就有读研究生的感觉了，小班么，就 6 个人。

至于我自己一直学俄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确实是自己越学越有兴趣。俄语是非常复杂的，主要体现在它的变化很多。这会引发两种反应：一种是畏惧，觉得很难，没办法学下去；还有一种，反倒是激发了学习兴趣，觉得一定要把它学好。第二，受传统的“物以稀为贵”的想法的影响，觉得既然大家都在学英语，没人学俄语，那我为什么不把俄语学好呢？第三，慢慢地，开始去接触一些简单的原文，能够看得懂，这样就特别受鼓舞。此外，大概 1980 年吧，《苏联文学》创刊，当时，茅盾先生题写刊名，还专门写了一首词《西江月》。杂志上登载了大量的俄苏经典作品和当代作品，为我展现了一个无比丰富的、无比美丽的世界。这三个

因素导致我一直学俄语。后来考大学也以俄罗斯语言文学为专业。

《闻道》：您是哪一年进华东师大俄语系的？

贝：1981年。当时朱逸森、冯增义、许庆道、徐振亚、张鸿瑜等先生都在俄语系工作。王智量先生在中文系工作。他们都是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翻译和教学的大家。我非常崇敬他们。

《闻道》：那当时华东师大的俄语系也算是非常强了？

贝：(点头)非常强。那时候有种说法：华东师大是半壁江山。在上海，一半是上外，一半是在我们这里。作为综合性大学，华东师大除了俄语系，还有中文系。研究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俄语系更多是从语言，当然也通过语言从俄罗斯文化、艺术角度来切入；中文系则更多是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着手。两方面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很强的整体。刚刚说到那几位先生，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就我而言，我的俄语是我们华东师大培养的，我非常自豪。我后来曾到俄罗斯普希金语言学院进修。这自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是基础是在华东师大打下的。到普希金学院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比较自如地使用俄语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华东师大教会了我说俄语。

《闻道》：您在华师大任教以后，网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关于您的评述，说的是您以前的课非常叫座。特别有一次，说某一年的4月31号，“五一”之前，您的课是两百人的课堂爆满。后来大家提出疑问怎么会有4月31号……

贝：(开怀笑)这是日子说错了。不过确实是有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深。这是公选课，大教室有时坐满了，就有同学到隔壁教室搬椅子。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感动。但我说同学们不要这样，隔壁教室的老师会怎么想？后来就有同学站在或坐在走道里听课。当时还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张三是上这门课的，他把他的女朋友也叫来一起听。还有一些同学把外校的同学也叫来，所以后来发现不少时候在座的有外校同学。

这种全校的公选课，我从来不点名。我觉得，同学缺席，老师要先从自身角度找原因。如果学生觉得这课上得没劲，那是老师没有吸引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谈恋爱，难能可贵的是真正相爱。如果点名，张三没

来李四没来，学生没办法，只能来。来了以后，坐在下面，未必会专心听讲。所以说像谈恋爱，他不爱你的话，心不在你这里，即使人在旁边。所以，我从来不点名。但不点名反而人很多，我自己非常感动。

上面说到的事情，发生在五一节前夕。为什么印象深呢？五一放长假，很多同学要回去嘛。我当时已经做好准备，没有多少人会来。但我想，只要有一个同学来，我也会上课。一个真正的演员，即使只有一位观众，他也会把戏演好。教师，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名演员。对自己的工作，他应该忘我，充满激情，应该把知识通过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形式，传授出去。那次我印象很深，人不光没有减少，反而来得更多。我进去一看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大家对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很感兴趣，学得很投入。在课堂上，读了普希金的《我曾经爱过你》、《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吉雅娜给奥涅金的信等作品以后，有同学感动得流下眼泪，包括男同学。

《闻道》：您刚才谈到了苏联的文学或俄罗斯的文学。2006年老作家王蒙出了《苏联祭》，他就说，“我们那个时代，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就是苏联。”苏联解体二十多年了，怎么来评价当年那个苏俄文学，像保尔·柯察金这样的人物，那怎么来重新对他进行再评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放在俄罗斯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又怎么与整个世界的文化作对比呢？

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在回顾和反思70多年历史的时候，好多人带着一种否定的态度。这里既有俄罗斯本土的专家学者，也有国外的。我觉得简单的否定，不是一种严肃、科学的态度。对这70多年，难以“一言以蔽之”。就如同我们在课堂上所看到那尊以黑与白为主基调的赫鲁晓夫雕像一样，对与错、功与过、成功与失败，贯穿在整个这一历史阶段中。我们也看过伊利亚·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幅油画《伟大的试验》，画家把这70多年称作一个“试验”，因为这是以前没有走过的道路，没有做过的探索。

70多年里，包括文学在内的苏维埃文化，首先，依然是继承并发展了俄罗斯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其次，苏维埃文化又是一个崭新的文化现象，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人类文化宝库的一份奉献。在原苏联时期，除了俄罗斯文化以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各

民族的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

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和束缚，有对概念、思想庸俗简单的图解，但这又是一个留下巨大文化艺术遗产的时代，是向世界奉献出了乌兰诺娃、肖洛霍夫、肖斯塔科维奇、穆希娜的时代。举个例子，俄罗斯芭蕾，在苏联时期，攀上了又一个令人眩目的高峰。苏联芭蕾艺术家编排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且还到伦敦去演出。那是怎样的一种自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杰作，是语言艺术精品，而且，文艺作品通常由本国艺术家来诠释是最精当的。而乌兰诺娃等苏联艺术家把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莉叶》带到伦敦，打破了“舞剧没有言辞不可能表现莎士比亚的不朽剧作”的戒律，向世人证明，通过古典芭蕾的手段，可以揭示出文学作品中最为复杂和富有哲理的戏剧内容。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和说明了苏联文化艺术的特质、水平。

苏维埃时代的文化艺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那个“理想燃烧”时代所赋予的、同时也支撑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品质，影响苏维埃人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塑造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也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但同时，他又是那么全心全意地用艺术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坚持留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还参加了消防队。后来，身体衰弱的作曲家被转移到古比雪夫，在那里，他完成了讴歌祖国、人民、自由和正义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的创作。作品写完以后，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古比雪夫演，在莫斯科演，最后决定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上演！在战后缴获的德军日记中，人们读到了对这场音乐会的记述和这样一行文字：“要战胜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谈到过保尔·柯察金。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和保尔这一人物，争论也很多，有人直截了当地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坏书”。我想，第一，如果我们要去评价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包括文学，应该将它们放到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里面。第二，我们更多要做的，不是在我们现在所谓的这样一个高度去居高临下地看：你没做到什么，而是要结合当时具体的时空背景、历史条件，看看它做到了什么。第三，要看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化，是不是起到了一个推动向前、向上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是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评论，常常是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人在那里点评一

部作品，但却没有仔细地读过它。如果认真读了，再加上“关联阅读”，展开，那就能全面客观了。

《闻道》：我们再读的时候，也觉得它写得好，而且它有很多面的。



比如说刘小枫以前写过名文《纪念冬妮娅》，就是说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那种爱情。后来我看过有很多视角，都不一样。当然它能被解释地多样化，这是更大的问题。作品本身你要多展开，就会发现作家是有很多东西的，但被解释地很死。

贝：对。我还有些信息可以和朋友们分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现在还在莫斯科最主要的大街之一特维尔大街上。这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俄罗斯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态度。博物馆离普希金像不远，这也很有象征意义。从普希金纪念碑走过去两、三分钟，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博物馆。博物馆位于三楼。下面是蜡像馆，有各个时代的人物，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拉斯普京等等。这些元素比邻而居，本身就是当代俄罗斯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性的体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讴歌理想，刻画矢志不渝地对既定目标的追求。作品里还写到了纯真的感情、爱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出身贫苦，当过工人，上过前线，他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文学创作的训练，更多是凭着激情、凭着坚

实的生活基础来写作的。

《闻道》：您说苏联 70 年体现非常高的水准，那沙俄时期更是如此，我们都知道。那您最近出的专著《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化艺术》，研究的却是 1991 年以后的俄国文艺。但现在在很多人眼里看来，1991 年以后俄罗斯还有文化艺术吗？大家会这样问。大家就知道维塔斯，除了这个以外，大家知道的微乎其微。

贝：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对俄苏文艺作品的译介方面，那么多的翻译家、研究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刚才您说到的，就是经典文学、经典文化这一块。我们译介、研究工作做得很全面。俄罗斯经典作家、诗人的作品，都有中译本。更有中文版的普希金全集、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等。所以有人说，俄罗斯经典作品，除了在本国以外，要数在中国被读得最多。而从绝对人数上来说，中国的读者可能还要比俄罗斯读者更多。另外，对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文化艺术，研究介绍得也非常多。尽管在“文革”期间有过停顿。从整个时间段来讲，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国内研究介绍得都非常多，很全面。

但对苏联解体以后、转型开始以来的俄罗斯文化艺术，它的演变发展、面貌特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介绍研究得还不多。似乎，对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介绍，有一个断裂。

您刚才提到维塔斯。他其实是个过气明星，在俄罗斯的舞台上，已鲜见其身影。他的表演，没有真正高超的艺术技巧。“海豚音”，可以作为一种表达样式，不过，叫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就使人感觉到黔驴技穷了。唱到最后喊几下，除了千篇一律的“喊”之外，还有什么呢？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歌唱家、艺术家，表演中应该具有、凸现俄罗斯的元素、特点。维塔斯的演唱里面没有。俄罗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但对于当代的俄罗斯文化艺术，研究介绍得不多。但这项工作又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作为学科的研究，作为对曾经深深影响我国的文化艺术、与我们有很强关联性的这一邻国文化艺术的了解掌握，从各方面来说，这项工作都是应该持续下去的。于是我尝试着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共建单位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非常支持，提供了宝贵的条件。

《闻道》：那我们现在换个话题吧。我注意到上次鲁桂成大使来讲座的时候，就说俄罗斯人酷爱喝酒，尤其是伏特加，所谓“俄罗斯人有酒喝就

好说话”。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想写一个关于酒鬼的事，但是写着写着就写成《罪与罚》了，您觉得俄罗斯人对酒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再加一句，贝老师您喝酒吗？

贝：我不喝酒。后来，因工作关系，有时又需要喝酒，比如宴会的时候。俄罗斯、白俄罗斯朋友一般不劝酒。不过，在有的情形下，不喝又不合适，比如说，在为中白友谊干杯、在为宾主身体健康干杯的时候。在他们那里，是否喝酒，常常体现你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是不是豪爽，是不是真诚，是不是重视友谊。俄罗斯、白俄罗斯都是这样。酒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现象、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说到俄罗斯的象征的话，象征符号里肯定会有伏特加。

为什么酒与俄罗斯人关系那么密切呢？我想，这自然首先与俄罗斯所处的地理位置、漫长的冬季有关，酒能祛寒。还有，与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有关。历史充满波折，生活条件和环境远非那么理想。酒能使人忘却忧愁，增强信心和力量。喝点酒来使自己心情好，大概成了俄罗斯人最常见的做法。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签署解散苏联的文件前，也特意喝了酒，借以壮胆、增强信心。另外，在俄罗斯人看来，酒的作用非常大，无所不能，甚至包治百病。心情不好，喝点酒；天寒地冻，喝点酒；身体不舒服，喝点酒——因为它活血，能够消灭病菌。巧的是，前两天，有一位白俄罗斯女研究生给我打电话，商量一个事情，那天她大概吃了什么东西觉得很不舒服，说，老师我今天不能多讲。我就问要不要去看大夫，她说“不用，我喝了伏特加酒，会好的”。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指挥官在给斯大林的关于调配物资的报告中，请求为军官每天供应一定数量的伏特加酒。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不是给军官，而是给所有的将士。天寒地冻，伏特加酒能够暖身，另外，能提高士气，更为重要的是，伏特加酒蕴含着很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俄罗斯和生活在片历经磨难但坚毅顽强的人民。我们在“俄罗斯文化研究”课开始的时候就说过，俄罗斯是一个很感性的民族。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曾写到：“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共同的标准不能把她丈量；她有特殊的身段，对俄罗斯我们只能信仰。”俄罗斯人喝了伏特加，身体上感到暖和，同时，还有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感受，以及文化、历史、民俗的联想。感觉中，伏特加与俄罗斯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与门捷列夫有关。门捷列夫有一篇论文，是研究酒精与水的最佳比例关系，最后得出的结论

是百分之四十。伏特加酒是四十度。俄罗斯、白俄罗斯的伏特加酒里还要添加不同的香料。

《闻道》：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刚刚挂牌，有的人还有些疑问，就说这个白俄罗斯啊，就是东欧的一个小国家，为什么要有一个中心来研究呢？卢卡申科说白俄美女是战略资源，那这个白俄中心是不是重点研究白俄美女呢？您在白俄罗斯工作过，看来这个就只能您来解释了。

贝：其实我们已经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有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白俄罗斯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又是苏联的一部分，现在与俄罗斯结成俄白联盟，是独联体成员国、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研究俄罗斯的时候，自然也会关联到对白俄罗斯的研究。第二，白俄罗斯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她处于“欧洲的中心”，位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在原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苏联解体以来，她所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她以“总统制”为核心，建立“统一的、民主制社会的法制国家”，将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抑制民族主义膨胀，严厉打击犯罪；以“社会市场经济”为目标，没有采取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的私有化，保存了高度集中的出口型工业生产；主动把军队人数削减至 6.5 万人；倡议并实现了俄白联盟。20 年来，白俄罗斯保持了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尽管有外部力量的支持，反对派始终未能在国内形成气候。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又常被视为原苏联空间中最僵化和保守的国家，内政外交不断遭到西方国家的指责，政治和经济上多次受到制裁。白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其反映出的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等，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三，从文化、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她也是非常丰富而独特的。白俄罗斯位于欧洲的中心，自古以来东西部文明在此交汇、对立、冲撞。为了能顺利地生存和发展，白俄罗斯人需要理解和结合各种文明，维持各种力量的平衡。这构成了白俄罗斯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宽容性的基础。回顾白俄罗斯历史，可以看到记载着难以改变的不利生存条件的篇章，一直到苏联的解体。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白俄罗斯人的心态和价值观，很多时期的负面生存经验使白俄罗斯人更多地去适应外部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去积极改变它。白俄罗斯人习惯在一个大的政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又不消融其中。与宽容性相连的是“联盟性”。联盟能够为在白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带来保障。俄罗斯政治传统中

更多的是夺取和征服，而白俄罗斯政治传统表现出的是对联合的追求。白俄罗斯人习惯在一个大的政治和文化的空间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又不消融其中。历史上有明多夫格和达尼伊尔公爵的加冕、克列夫联盟和琉勃灵联盟等。目前实行与俄罗斯联盟、但不丧失独立和主权的方针。

刚刚您提到“白俄罗斯美女”，白俄罗斯领导人 2005 年说过，“我国的美女流失到西方是一大损失，有损国家尊严，我们决不允许年轻姑娘成为被贩卖的对象。白俄罗斯的美女没必要到国外去，她们在国内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当时我在那里工作，也知道这个事情。源于在世界选美大赛、模特大赛上，白俄罗斯姑娘成绩骄人，但夺冠后，流失严重。事情的内核涉及民族的自尊、人才的保护和对年轻一代的关爱。白俄罗斯姑娘很美丽，这有遗传基因的因素，其东斯拉夫的血统是最纯正的；还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里河湖众多，森林覆盖率达 35.5%，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姑娘自然婀娜秀美。再有一个，文化教育程度、艺术修养很高，举手投足，待人接物，别具风采。

《闻道》：最后问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俄罗斯是一个艺术的“宝藏”，但是我们了解地比较少比较浅。我记得今年春晚有一个俄罗斯舞蹈，是由俄罗斯托迪斯舞团演出的，非常震撼。我想问的是，在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呢？

贝：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里，俄罗斯这朵花是很独特的，非常迷人。人类文明史、文化史，如果少了俄罗斯部分，就会苍白许多。当代俄罗斯，依然保持了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繁荣。当然，1991 年后，有过困难、迷茫、彷徨的时期。2000 年以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国力加强，国家恢复并不断加强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市场机制也日益成熟。普京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所谓的强国，肯定也是文化强国。说到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俄罗斯的文化艺术，重要的是，要把引进、传播的机制理顺。举个例子，接下去“上海之春”有三场来自俄罗斯的重要的、高质量的演出。但常常是，真正想看的人未必能够看得起，而拿到票的人又……

《闻道》：我们这里可能是进一些比较庄重的音乐厅，票价会比较高，很多受众的话，比如年轻人如果没有工作，肯定就是不能承受的，所以它

推广起来肯定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贝：是啊，其实可以尝试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来介绍和普及俄罗斯文艺佳作。其实，我们有做普及的传统和经验。在课堂我们说过，在所有的外国音乐家当中，只有柴可夫斯基被称作“老柴”，贝多芬没有被称作“老贝”，如果称作“老贝”，我会很高兴的（笑），好像是我家里人一样——这是开个玩笑。唯有柴可夫斯基，被称作“老柴”，如同他是我们的作曲家一样。中国人对亲近的人称用“老”字。这里，一方面说明柴可夫斯基作品超越时空的特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块儿的介绍普及工作做得是很好的。方法、形式、渠道应该有不少，只要用心去做。国家的支持、政策的倾斜也很重要。形成机制，把对方优秀的艺术团体请过来，做巡回演出，到各大学演出，等等。再有一个，如果要引进的话，是哪些专家去跟对方洽谈，去挑选。专家的视野是否开阔，是不是对经典的当代的文艺有很好的把握，自己的品味如何，这都很关键。如果他还是经常去引进维塔斯们的话，我们永远只是……

事实上，大家对俄罗斯文艺是非常喜欢的。上海开过好几次俄罗斯作品音乐会，只要是公益票，那许多市民早上五六点就在那里排队了。中俄两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有趣的是，它们之间居然会有那么多的共通性。尤其是我们对对方的接收和理解。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大家百听不厌、百看不厌。本身是有受众基础的，重要是怎样来推介。再有就是多做引导性的工作，让受众更多得到与俄罗斯文化艺术有关的信息。选听“俄罗斯文化精品赏析”课的同学，在课堂上集中接收关于俄罗斯文化的信息，听课期间，他们常把俄罗斯挂在嘴边。上课如痴如醉地赏析，下节后再到阅览室借书读、买 CD 听、下载影片看。总之，有观念、有支持、有引导、有务实的操作，多管齐下，一定能更好地介绍、传播、研究俄罗斯的文化艺术。

（采访人：尹亮、朱承璋、曾乔圆、朱永福）

学人小传

贝文力老师

贝文力老师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总支书记、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艺术。

主要简历：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一年起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2001年—2002年，俄罗斯普希金国立俄语学院访问学者。2005年—2009年，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工作。2009年7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2012年起，任华东师大国际关院总支书记。

（责任编辑：曾乔圆）



苏联学家布热津斯基：思想、评价及启示

郭金月*

[摘要] 作为苏联学家，布热津斯基的研究蕴含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冷战期间他的苏联学著述进行研究和评价，并将其主要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无论是恐怖式的、自愿式的还是功能失调式的，苏联政治的本质始终是极权主义；在不同时期苏联政治的发展趋势分别是“演变”、“蜕化”和“衰朽”；苏联政治与沙俄政治在历史周期、行政权和政治文化方面存在很大连续性；从潜在矛盾到政治演变的障碍，再到影响苏联生存的严重危机，民族问题最终成为苏联崩溃的关键。布热津斯基的思想以及个人经历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布热津斯基虽然没能预见到苏联解体，但其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可取之处；这些观点存在变化性的同时也存在连贯性；布氏个人经历对其立场观点的影响不可忽视；对他来说，学术研究只是工具，他的最终目的是影响政策。

[关键词]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苏联学；思想；启示

导言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在中国算不上家喻户晓，但对很多人来说也并不十分陌生。从1977年到2010年，仅《人民日报》就提到他302次，其中有72次是在标题中。^①中国的各类期刊杂志刊载的有关布热津斯基的文章也有几十篇，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头衔必定要提及之外，“学者”、“政治家”、“外交政策专家”或者“地缘战略思想家”也是大家对他的定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政府角色之外，目前中国人对他在学术领域的关注集中于外交政策和地缘战略等领域。

其实布热津斯基还有一个鲜为国人所知的身份：苏联学家。这就不得不要提一下“苏联学”（Sovietology）这个概念。简言之，如同物理学就是物理研究一样，苏联学就是苏联研究，是冷战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研究所形成的一个学科门类。广义上，苏联学包括对苏联政治、经济、

* 郭金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购买的《人民日报》数据库统计。

军事、外交、文化和艺术等一切领域的研究总和，狭义上则专指对于苏联政治的研究。后者也是本文对苏联学所做出的界定。相应地，从事苏联研究特别是苏联政治研究的学者，就被称之为苏联问题专家或者苏联学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孕育了不计其数的苏联学家，如果要在他们之中找出一位代表人物的话，那么这个人非布热津斯基莫属。布氏今天已是八十老翁，其实他 30 多岁的时候在美国苏联学界就已经声名鹊起，被视为苏联东欧研究的研究领域的“权威”。^①从 1950 年的硕士论文《俄国——苏联民族主义》到 1989 年的《大失败》，布热津斯基的苏联研究几乎覆盖了整个冷战年代，他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苏联；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到民族问题，从政治文化到“蜕化”、“衰朽”，在不同时期他几乎研究了苏联政治的方方面面。

诚然，苏联已经作古多年，探讨布氏的苏联研究思想似乎意义不大。实际上，如同有些中国学者研究法国史一样，对于美国苏联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很大价值。冷战刚结束甚至到现在，美国学界反思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苏联学家们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如果把这作为一种指责，那么布热津斯基也难辞其咎。考察布氏苏联学的主要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他各个历史时期对苏联政治进行分析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至于其研究的成败得失，读者可以根据苏联后来发生的事实进行验证并给出自己的评价。这种梳理本身至少揭示了他误判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但对布氏苏联研究的“再研究”，其价值并不仅限于此。首先，与其他苏联学家相比，布氏苏联学有它自身特点和长处；其次，从布热津斯基的苏联学，我们试图发现这位学者思想连续与变化的轨迹；再次，作为其思想形成的先决条件，布热津斯基的身世、童年经历和移民身份对他苏联研究的影响不可忽视；最后，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布热津斯基的经历展现了学术研究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展现了有政治抱负的学者改变世界的可能。

苏联学曾是美国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先行者和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界对地区研究的质疑一直存在，然而在笔者看来，地区研究仍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必要前提。试想，如果一个学者对苏联本身的情况没有深刻了解，怎么可能对美苏关系有正确的分析？如果一个学者对苏联内政不甚清楚，怎么可能明了苏联的外交政策？一个好的国际关

^①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hD Diss.,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003, p. 6.

系研究者，必然首先是那个“国际”中所涉及的国家的专家。因为研究“关系”是最难的，他需要对关系两边（甚至多边）的国家都有相当理解。布热津斯基就是在地区问题专家基础上，成为外交政策专家和战略思想家的。在冷战年代布热津斯基提出了美国对苏政策的许多设想，其前提除了对美国自身的充分了解之外，还在于他对苏联有着自己的一整套思想观点。今天回过头去看，可以说布热津斯基的苏联学是他论述美苏关系的思想基础。鉴于布氏在苏联学界和美国政界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布热津斯基的苏联研究也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

国内对布热津斯基的苏联学思想尚没有系统研究。涉及到布氏苏联研究的文献可以大体分成三类。观点介绍方面，在介绍西方的苏联东欧研究时，刘金质（1983）对布热津斯基与亨廷顿的合著《政治大国：美国与苏联》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指出这本多次重印的著作是哈佛大学教授苏联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参考书”。作者还列举了布氏版本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六种表现。^①在分析西方斯拉夫学时，朱家明（1985）将布热津斯基视为“集权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并列举了布氏所描述的苏维埃制度的五个特征。^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前辈当年把“totalitarianism”翻译为“集权主义”而不是现在通用的“极权主义”。王鹏（1999）也对布氏归纳的极权主义六大特征进行了列举，并从现代化角度简要介绍了《政治大国：美国与苏联》这部著作。^③在阐述西方俄苏研究的过程中，林精华（2009）将布热津斯基列入西方苏联学中的政治文化历史主义学派并列举出了布氏四部著作，但没有提及他的思想内容。^④

思想剖析方面，费孝通（1980）提到了布热津斯基的重要著作《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对《政治权力——美国和苏联》^⑤一书进行了独特解析。作者认为，该书的主题是驳斥苏联现代化后会走向民主的“两

^① 刘金质：《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的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1983年第3期，第43—44页。

^② 朱家明：《谈谈西方的斯拉夫学》，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4期，第92页。

^③ 王鹏：《西方苏联学研究中的范式及范式转换》，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第58—59页。

^④ 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西方表述——关于欧美俄苏研究导论》，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7页。

^⑤ 这部著作与前文提到的《政治大国：美国与苏联》是同一本书，即 *Political Power: USA/USSR*，两位作者对其书名的翻译有所不同。

极辐合论”，^①提出苏联体制只会向前演变的“多元演变论”。费老认为，布热津斯基的这种思想“反映了美国不得不放弃追求独霸天下的局面，正在为缓和、妥协政策树立两霸长期并存的理论前提”。“布氏目的是要说明，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苏联的稳定只是亚稳状态，苏联体制也不是美国体制的对手”。^②在论述冷战时期布氏地缘政治思想时，胡莹（2009）著作的部分章节也呈现了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政治的研究。^③

书评和译作方面，陈登才（1990）对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的六个部分逐一进行了驳斥，认为这本书是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铁证，指出这反映了“西方反动势力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不变”。^④在她的硕士论文中，李翠梅（2008）驳斥了冷战结束之际布氏关于共产主义“大失败”的结论，认为“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⑤在费孝通的建议下，陈观胜（1979）翻译了布热津斯基的文章《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1989）翻译了布氏的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⑦

以上文献都增加了作者对布热津斯基苏联研究的认识，有些观点也值得借鉴。但可能由于时代、资料和篇幅所限，这些文献对布热津斯基苏联学思想的剖析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笔者研读了布热津斯基 1950 年到 1989 年期间公开出版的全部著作以及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并结合布热津斯基传记和美国苏联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文本分析方法，试图提炼出布热津斯基苏联学的思想内涵。接下来本文将尝试梳理和评价这些思想，并结合他的个人经历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① “两极辐合论”译自“convergence”，这个词目前较为常见的译法是“趋同”。

^② 费孝通：《读布热津斯基的几本书》，载《读书》1980年第6期，第129—133页。

^③ 胡莹：《地理空间与全球霸权：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

^④ 陈登才：《推行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铁证——简评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载《理论前沿》1990年第8、9期。

^⑤ 李翠梅：《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大失败”论评析——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摘要部分。

^⑥ [美] Z. K. 布热津斯基著，陈观胜译：《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载《世界民族》1979年第2期。

^⑦ [美] 兹·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一、极权主义：政权控制社会

极权主义研究是布热津斯基苏联研究中最广为人知的方面。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对之进行研究，但似乎是布热津斯基将其“发扬光大”。究其原因，大概是他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较为彻底，对极权主义模式的捍卫也最为坚决，对它的使用也十分长久。其实，“极权主义”这个词并非布氏发明。1920年代，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一次演讲中提及“*uno stato totalitario*”，这是英文单词“*totalitarian*”的来源。1926年“*totalitarianism*”进入英语世界。^①起初，这个词特指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到1930年代末苏联也被包括在内。这时开始有学者将极权主义视为一种崭新的政府形态。^②

布热津斯基以前的极权主义研究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极权主义从哪里来，即其起源问题。阿伦特（H. Arendt）和塔尔蒙（J. Talmon）试图从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和革命弥赛亚主义等西方思想传统中追寻极权主义的由来。^③第二，极权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即其特征问题。凯南（G. Kennan）列举了俄国和德国两大极权主义的相似点。弗里德里希（C. J. Friedrich）则归纳了极权主义的五大特点。这个五个特点连同“中央指令经济”，成为他后来与布热津斯基的合著《极权主义专政与独裁》的基本框架。这说明布氏对这些特征的归纳也是赞同的。实际上布热津斯基还有自己的切入点。

1、恐怖极权主义

布热津斯基要解决极权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即本体论问题。1956年他给极权主义下的定义是：^④

在全体国民强迫性一致同意的环境中，基于特定意识形态假说，精英运动的极权化领导层，行使由先进技术武装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以达到彻底社会革命目的的体制。

^① [英]艾托（John Ayto）：《20世纪新词语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② Gabriel A. Almond and Laura Roselle, “Model Fitting in Communism Studies”, in Frederic J. Fleron, Jr. and Erik P. Hoffmann, eds., *Post-Communist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Empirical Theory in Sovietology*, Boulder & San Francisco &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3, p. 29.

^③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9-118.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7.

在这个略显复杂的定义中，布氏特别强调其中的两点作为界定极权主义的标准。第一是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①第二，它试图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永不停息的改造，他认为这是极权主义最为本质的特点。布热津斯基注意到，虽然古代和现代的独裁政权也都握有很大权力，但它们的目标是维持社会现状，秩序稳定和内部安全是这种政权成功的标志。与此相反，极权主义体制追求的是巨大的内部变迁和对社会的全面重构。“如果说传统独裁政体力图固化现在、避免未来的话，那么对于极权主义政体来说，今天已经成为过去，明日的蓝图塑造着当下的现实。”^②

当时的苏联学家们普遍认为，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恐怖即杀戮只是清洗的暴力形式，而清洗还有其它非暴力形式，如打入劳动营等。他的观点是，清洗与极权主义是不可分离的联合体，苏联体制正是通过“永恒的清洗”过程才实现了对自身的再调整。由于需要持续地清除腐败，并面临领导人接班问题，所以极权主义体制对清洗的需求也不会消失。不过，他也发现，恐怖内化（internalization）使民众“自动与政权保持一致，极权主义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由于全面的政治灌输，其忠诚度也大为提高”。^③所以 1956 年作者预计，清洗过程中公开的暴力将会减少，但必须有替代性方式出现。^④五年后布热津斯基终于找到了这个方式——意识形态。这时他发现，在极权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恐怖只是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尽管恐怖还有潜在能量，但它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也不再是其推行社会改造的核心手段”。^⑤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明显变化，使布热津斯基着手对极权主义的概念进行修正。

2、自愿极权主义

“组织强迫下的意识形态化行动”（organizational compulsion for ideology-action）是极权主义的新内涵，布氏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版本在 1960 年代初诞生了。这里面的“组织”就是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苏联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斯大林时代由于他更依赖于秘密警察和恐怖统

^① Ibid, pp. 3-6.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pp. 173-174.

^③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38.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p. 175.

^⑤ Zbigniew K.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2, pp. 80-81.

治，党的重要性下降；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共产党则重新成为苏联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当时学界有人认为，技术专家和经理阶层的加入，可能使共产党的价值观发生改变，甚至引起它自身的衰落。布热津斯基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苏联共产党一直保持着政治目标导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意识形态。

在布氏看来，苏联体制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其目的性：任何行动都指向一个虽不精确但却自觉的目标。共产党和意识形态共同提供体制前进的内在动力。意识形态肩负两大任务：首先是党内灌输，最高领导人之下有理论家负责确保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确保党员对党忠诚并拥护党的政策；其次是大众灌输，由于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社会集团已经被彻底摧毁，将执政党的价值观逐步灌输到人民脑海成为必须。在这方面共产党有一个优势，即它把意识形态目标和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在宣传上，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意识形态的指引，这样党垄断权力就有了合理性。共产党采用组织手段进行的意识形态化行动成为现代化的源泉和手段。党的社会合法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增强。总之，“意识形态将共产党的权力转化为权威，并代替恐怖成为党的力量的主要支撑”。^①

尽管极权主义的涵义发生了变化，但它对苏联政治的解释力还可以保持下去。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都是极权主义的，只不过前者是以清洗为特征的“恐怖极权主义”（terrorist totalitarianism），后者则是以意识形态灌输（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为标志的“自愿极权主义”（voluntarist totalitarianism）。^②

3、功能失调的极权主义

到了 1970 年代，在极权主义模式广受批判，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陷入“停滞”的背景下，布热津斯基找到了界定极权主义的新维度：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在强制和密集的社会再造中，政治体系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与此同时政治制度向社会扩展并凝结为组织”，这个动态过程就可以称之为极权主义。^③换句话说，极权主义就是社会完全从属于政权的一个特定阶段。^④在这之后，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苏联进入相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pp. 76-80.

^② *Ibid.*, pp. 81-82.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Dysfunctional Totalitarianism”, in Carl J. Friedrich and Klaus Von Beyme, eds., *Theory and Politic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pp. 375-389.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in Paul Cocks,

对发达的工业社会以后，面对科学和思想创新的需求，政治体制被视为前进的障碍。布热津斯基发现，在垄断有效权力和纲领性思维方面，在压制其他政治组织和纲领方面，无论从组织还是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政治体制本身都还是极权主义的。然而，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政权再也不能获得社会的完全屈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具互动性和工具性，更少意识形态色彩。这是一种功能失调的极权主义（dysfunctional totalitarianism）。

根据政权与社会关系的新框架，以苏联经验为蓝本，布热津斯基将极权主义精确地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①1902年到1917年，一个致力于彻底而广泛社会重构的运动（movement）出现并成型；②1917年到1920年，在政治分裂和社会惰性的背景下，这个运动夺取政权；③1921年到1928年，政权巩固并开始社会动员；④1929年到1939年，运用暴力等政治手段对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造；⑤1945年到1956年，伴随着二战结束，政权加强了对社会的强制性控制；⑥1956年以后，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限回缩，自下而上的某些社会压力浮出水面。布氏认为，对苏联来说极权主义是在第④阶段出现并在第⑤阶段得以巩固的。对其他政治体制来说，这些阶段可能长短不一甚至被压缩。

在苏联解体的前夜，布氏把全面改造社会、意识形态化以及社会从属于政治等之前的三个版本融合在一起。1988年他认为，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除了社会被迫从属于政治体制这一点之外，还包括依照意识形态蓝图运用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在这种体制下，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正统被树立起来，真正的政治生活不存在了。静默的共识似乎反映了社会对政治体制的一致同意。实际上“政治变成了高层领导人的领地”。^①回顾苏联历史，布热津斯基将其分成三段：第一阶段是在列宁治下，极权主义政党旨在彻底重构社会；第二阶段是在斯大林治下，社会彻底从属于极权主义政府；第三阶段是在勃列日涅夫治下，腐朽的极权主义政党主宰着完全停滞的国家。^②

评价

在布热津斯基的苏联极权主义研究中，无论是否明确指出，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始终贯穿始终。1930年代初之前，经过密谋，极权主义运动夺取政府，新政权为重建社会做各项准备。1930年代初到1950年代后期，政

Robert V. Daniels and Nancy W. Heer,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41.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p. 95-96.

^② *Ibid.*, p. 41.

权完全控制了社会。前半期政权依据意识形态蓝图，运用暴力手段（恐怖）对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造。为此，政权摆脱了来自法律、传统和道德等方面的几乎所有制约，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半期意识形态灌输代替恐怖成为政权强行控制社会的新手段。此时政权（共产党）把意识形态目标和现代化联系起来，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社会合法性。1950年代后期之后，苏联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限回缩。这个时期共产党专注于维持现状，意识形态变成了口号和摆设。虽然还垄断着权力，但由于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苏联变成了带有极权主义残余的威权主义政体。所以，当19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着手改革时，他面临双重阻力。一方面，社会早已被政权彻底重构，政治制度向社会扩展的结果是凝结为组织；另一方面，政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已经十分有限，社会不再对政权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

在论述共产党的优势时，布热津斯基指出，它把意识形态目标和现代化联系起来以保持合法性。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共产主义”是一个较为抽象且未曾实现过的意识形态口号；“现代化”则是相对具体且有西方经验可资参照的务实目标。苏联只提“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可望而不可即的疏离感很容易让人民心灰意冷、悲观失望。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一方面没有丢掉意识形态的旗帜，另一方面让人们看到实现的可能。特别是这个目标本身有一定弹性，为共产党自身留有回旋余地。实际上，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充分发挥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优势，而是陷入了意识形态的乌托邦，逐步在社会和民众中间丧失了合法性。

二、演变、蜕化与衰朽：苏联政治的未来

如果说对于苏联政治的本质——极权主义，布热津斯基一直予以关注的话，那么他对于苏联政治体制发展趋势的分析，也一直贯穿着他苏联研究的始终。

1、演变

“演变”（evolution）是布热津斯基对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政治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从词义本身来看，“evolution”一词在英文中并没有向好或向坏发展的价值取向。从布氏这一时期的有关论述来看，亦未明确这种“演变”将走向何方。换句话说，苏联政治将会变化，但这种变化将会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它自身，他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探讨苏联政治的未来，首先要排除一种可能，即“在一定时期内，至

少是可预见的将来，苏联不会倒台”。^①由外向内的敌国入侵、由内向外的战争行动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起义，在当时来看发生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那么剩下的只有自上而下，即政治体制自身发生演变。尽管演变的总方向尚不明朗，但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有三个分方向可以做出预计，即共产党的力量消长、多元主义的可能以及自由化和民主化。

首先，作为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共产党的力量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削弱。共产党扮演的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整合者角色。工业社会提供了许多先进工具，有利于党进行社会控制。另外，共产党必须不断推行社会改造，不断将意识形态纲领付诸实践。苏联共产党不会引退去扮演“苏联商会”的角色。^②

第二，党国（party-state）为维护其正统地位，不会容忍任何“意识形态共处”（ideological coexistence）的观念，所以意识形态多元主义难以出现。而且现代官僚体制本身也具有“集权化倾向”。^③另外，从干部任命上角度看，只有坚持意识形态教条的干部才能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他们上台后必然坚持斯大林主义式的对社会加强控制的政策。^④这都会对社会多元主义的出现构成威胁。

第三，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不会出现民主化和自由化。首先，从概念上看，这两个术语是用来描述西方社会中所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进程，它们并不适合描述苏联。^⑤其次，在操作层面，即便苏联领导人推行任期制和党内选举等改革，政治斗争仍将局限于党的顶层一小部分人。改革会使政治体制更加制度化，但不一定更加民主化。布热津斯基估计，苏联体制仍将保持“官僚寡头制”。^⑥针对当时波兰裔英国学者多依彻（I. Deutscher）的“工业理性（industrial rationality）与极权主义不能共存，工业化和官僚阶层将使苏联体制向民主方向演变”的观点，布氏曾经专门撰文进行驳斥。他认为，“在理论上理性与极权主义是可以共存的，理性并非民主秩序生长的充分条件，极权主义进一步演变的结果，可能是体制更

^①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p. 300.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pp. 61-62 and pp. 88-91.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3, pp. 434-435.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pp. 62-63.

^⑤ *Ibid.*, p. 88.

^⑥ Zbigniew K.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p. 431.

加极权化”。^①当共产党满足于维持现状时，就变成“理性极权主义”；从1950年代后期苏联推行的雄心勃勃的国内外战略来看，苏联还是保持着“革命极权主义”。^②现代化、经济理性和进一步工业化也并不必然带来自由化。经验表明，在现代世界决策权愈加集中于更少数人手中。^③

2、蜕化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1960年代后期的苏联政治面临“蜕化”（degeneration）的危险。^④这种危险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的素质。自十月革命到1960年代中期，半个世纪时间里苏联已历经四代领袖。虽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然而，他们的资质却渐趋平庸。列宁是一位典型的卡里斯玛型（*charisma*）革命领袖，他的力量来源于其人格魅力和智慧。斯大林则只能算一个“常规化卡里斯玛型”（*routinized charisma*）领导人，他的力量来源于制度。赫鲁晓夫时代苏联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功能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s*），他本人的作用仅在于提供政治整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则被布热津斯基称为“办事员的一代”（*generation of clerks*），他们必须依靠制度化而非个人化的集体领导，官僚体系的稳定是他们权力的唯一根基。布热津斯基敏锐地注意到，在英法等国家最高层的决策和掌权职位中，总有一部分会保留给非官僚出身的职业政客。而苏联官僚体制自上而下都由官僚组成，在这里升迁靠的是循规蹈矩、小心谨慎和溜须拍马，而不是个人勇气和创见。在布氏看来，这种体制不利于人才进入精英阶层，也阻碍政治创新。

其次是权力斗争的方式。1964年赫鲁晓夫通过和平方式被罢免，表明苏共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暴力的弱化已经非常明显。那么，那么暴力弱化是否必然对政治体制有利呢？布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从暴力弱化的原因来看，第一，领导层内部分歧的范围愈加狭窄（*the narrowing of the range of disagreement*），使权力斗争由生死较量变成胜负竞赛。第二，尽管分歧范围变窄了，但斗争更多地高层官员所代表的机构和组织之间进行，所以这样参与进来的人就增加了。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这样的政治“游戏”

^①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p. 300.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ism and Rational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0, No. 3 (Sep. 1956), p. 761.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p. 433.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or Degener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Jan-Feb 1966), p. 14.

仍然是不稳定的，因为它缺乏公认规则、既定“场地”和正式“参赛队伍”。它更像操场上漫无秩序的“混战”。这种混战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削弱苏联的政治体制。

最后是共产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解释，苏联社会是苏联政治（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塑造出来的。随着岁月流逝，社会中分化出了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利益需要整合起来，国家才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传统上共产党通过“官僚仲裁”（bureaucratic arbitration）方式实现整合，即党与每个集团一对一接触，以此防止集团之间结成联盟危及党的地位。共产党这种独占地位限制了其他集团实现真正的政治参与，引起了它们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重振意识形态两者之间，新领导人鱼和熊掌又难以得兼。如果共产党不能调整自己更好地整合集团利益，那么它有被其他社会组织代替的危险。

苏联政治出现的这三点变化，使制度性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对于如何进行改革，布热津斯基开出了三个药方。第一，吸收若干杰出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经理等社会精英进入最高领导层，以扩大其代表性。第二，创设一个有任期限制的首席行政长官职位（chief executive office），并赋予其合法性和稳定性。领导人的遴选将成为公开和正式的过程。第三，建立集团利益的调解（mediation）机制，以因应苏联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参与诉求。布热津斯基认为，从长远来看，苏联政治的前途取决于苏联共产党的行动。如果苏共意识到它必须甚至可能不可避免地逐渐隐退（withering away），因此得体地（gracefully）调整自身，使共产主义专制转变为更为多元和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即使仍旧是一党制，那么蜕化的趋势就可以逆转。^①

九年之后的1975年，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已经进入“下半场”，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布热津斯基从五个方面重新审视了苏联政治。第一，除了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近年来苏联不再进行自上而下的影响广泛的社会实验。第二，由于政治机构和一些社会集团现今获得了制度凝聚性，最高领导人制定基本政策的回旋余地缩小了。官僚式的讨价还价成为常态。第三，革命和意识形态狂热消退，统治精英中间的政治悲观冷漠到处蔓延。他们口头上拥护官方意识形态，实际上却醉心于特权和官位。第四，现在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or Degeneration", p. 15.

的苏共领导层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和训练，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具有政治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代表他们对新变化和新思想反应敏锐。第五，苏联政府的效能（efficiency）虽未得到公众好评，但也没有明显下滑。苏联体制的合法性并未受到广泛质疑。^①以上五点都显示出苏联政治体制蜕化的征兆。

3、衰朽

早在 1956 年布氏就提出，如果极权主义在推进无限目标（total goals）的过程中停止下来的话，那么其结果将是“体制的衰朽（decay）和倒台”。四年以后，他在分析共产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时，又一次提到苏联和中国国内逐步的衰朽过程。^② 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说法，“衰朽”大体上有两层意思：首先，“在处理主要的国内事务时，体制越发无力”；其次，“在吸引社会上最有能力、最精力充沛和最有创造力的人进入政治精英行列方面，体制表现无能”。^③

到了 1980 年代，勃列日涅夫身后的苏联政治衰朽的前景更加明朗。布热津斯基一二十年以前列举的那些蜕化或衰朽的征兆正在逐步变成现实。除了共产党重新定位的问题，此时民族问题对政治的影响受到了布热津斯基更大的关注。经济权力下放已经成为苏联国内的共识，如果确保在少数民族获得更大权力的同时，不至于导致苏联分崩离析？少数民族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更多权力，这有利于体制的多元主义演变。然而，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s）作为苏联的统治民族，拥有着进入精英阶层的有利条件，享受了教育和语言等方面的特权，出于既得利益考量，它会阻止分权化的实行和政治多元主义的建立。这给苏联政治带来的可能结果，将是使其力量受到“削弱性衰朽”（debilitating decay），而非“建设性演变”（constructive evolution）。^④

评价

随着苏联政治的发展变化，布热津斯基在不同时期给予了不同的评判。虽然“衰朽”或者“蜕化”这样的词运用得当与否大可商榷，但不得不承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pp. 347-349.

^②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50.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Concluding Reflections", in Zbigniew K. Brzezinski, ed., *Dilemmas of Chang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52.

^④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wer of a New Typ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3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1984), p. 150;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96-99.

认他对苏联领导层和共产党角色的分析和解读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当时提出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等“建议”，在当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变成现实。在苏联政治逐步衰朽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资质变化得到布热津斯基格外的关注。

他提出，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四代苏联领袖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资质却渐趋平庸。笔者认为，这一点非常有见地。作为政治领袖应当具备一定的学识，但知识丰富、学问高深却未必有利于处理复杂的实际事务。可以说，领袖的政治能力更多地从斗争和生活中锻炼而来，而不是在课堂和书本上培养而来。列宁、斯大林能在残酷的环境下存活下来并占据高位，除了运气成分之外，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能力。这与现代西方国家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择领袖有类似之处。当然，实战和选战对人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勃列日涅夫往后直到戈尔巴乔夫，他们从官僚等级阶梯上一步步爬将上来，他们的升迁靠的是上司的赏识和提拔。布热津斯基发现，苏联体制自上而下都是由官僚组成，他们的成功之道是循规蹈矩、小心谨慎和溜须拍马。这样的领导人有的是知识和学位，缺的是谋略、胆识和创见。在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下，苏联走向死气沉沉的停滞和毫无章法的改革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对苏联政治走向的估计上，布热津斯基并没有使用许多西方学者习惯采用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而是用“制度化和多元化”。他分别从形式和过程两个角度观察苏联政治体制，得出结论：从本质和形成方式上，苏联体制和西方体制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所以西方的术语并不适合描述苏联。相比“自由化和民主化”这种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制度化和多元化”显得较为中性。他承认社会学研究路径下的工业化对苏联的影响，但不相信工业理性必然造就民主政府。在他看来，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工业社会提供的先进工具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一点已经为当代许多集权政府的多年统治提供了最好的注脚。作为极权主义模式的创立者之一，布热津斯基没有固步自封，除了社会学路径，他还吸收了其他学者关于苏联利益集团的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苏联政治多元主义的可能。这一点也值得肯定。

1950年代，布热津斯基指出，苏联政治发生变化的唯一道路是：政治体制自身发生演变。这个论断已经被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事实所验证。没有从外向内的敌国入侵，没有从内向外的苏联挑起大战，也没有自下而

上的内部革命，在戈尔巴乔夫的导演之下，苏联共产党悄然隐退，尽管算不上十分优雅。

三、文化和历史连贯性：传统作用于当代

作为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并未忽视历史和传统对当代苏联政治的影响。1950年代，他还把极权主义苏联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并列，将极权主义视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现象。然而，到了1960年代，他开始注意到当代苏联政治与沙皇俄国后期政治之间的相似性。到了1970年代，他已经明确表示，就政治文化来说苏联与沙俄之间更多地是历史连贯性。苏联解体的前夜，他似乎接受了历史循环论，认为苏联政治所具有的周期性与帝俄时代相近。

1、历史周期论

布氏一共提出过粗细程度不同的两个周期论。一个是在勃列日涅夫刚刚上台不久，这个“简易”周期论的内容是：“为应对某场重大挑战，全国强制性地组织起来；随后这种组织化应对开始僵化，官僚体系开始停滞，体制进入衰朽期”。^①

第二个更为精细的循环论，是在戈尔巴乔夫开始启动政治改革后推出的。布热津斯基将二战后的苏联与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俄国做了对比。1815年欧洲维也纳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在军事上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在随后几十年也快速增长。同时，政治改革也有望进行。然而，国家却逐渐陷入停滞。自1870年到1890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是下降的。另外，克里米亚战争及对波兰起义的镇压也使俄国的国家地位显著下降。不久以后，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开始引发革命和动荡。

与之对比，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苏联又一次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196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也相信，苏联经济将很快在世界上领先。然而，1970年代苏联却陷入了经济停滞状态。布热津斯基估计，到1990年，苏联不仅将会被美国抛得更远，甚至可能会落后于西欧和日本。耗时九年的阿富汗战争、东欧不断加剧的动荡以及高额的军费开支，引发了苏联国内社会的不满和国际威望的下滑。^②如果说这种“大历史”的周期对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Concluding Reflections", pp. 162-163.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9-40.

比略显粗线条的话，那么他对苏联和俄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比较则显得较为具体。

2、行政相似论

布热津斯基认为，行政权（administrative power）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立宪政府中的行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分享权力，并受到一系列制约；独裁政府中的行政部门独占全部权力，权力的行使相对来说不受制约。独裁行政在政府中享有中心的、主导的和最重要的地位。

经过考察布氏发现，自 1861 年至 1960 年一个世纪的俄国历史表明，除了时间非常短暂的一段例外之外，俄国行政部门在本质上都是独裁行政。这种百年连贯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独夫治国（one-man rule）。沙皇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都掌握无限权力，都是意识形态权威。第二，决策权高度集中。决策由最高统治者与其亲信组成的小圈子做出。第三，非正式行政渠道。沙皇们和斯大林及赫鲁晓夫都有正式机构以外的小集团。第四，政治集权与政治胁迫合二为一。沙俄和苏联时代地方政府都从属于中央政府，行政部门经常破坏司法独立。第五，军队效忠行政部门。俄国和苏联军方对政治的态度一直都是不干预。

总而言之，1861 年以来俄国行政权具有受到最小制约的独裁性质。同时，布热津斯基也清醒地意识到，沙俄与苏联行政部门在发挥的作用方面有显著不同。沙俄行政部门恪守传统价值观，在政治上致力于维持现状，而苏联行政部门却受到意识形态驱动，目的在于摧毁过去并重塑现存社会。尽管如此，他认为俄苏行政权的连贯性大于间断性，因为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是在一般独裁模式之内的发展。实际上，沙俄统治末期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如司法独立、农民阶层拥有自由、在多元社会基础上出现温和的政治代表制等等。在对比苏联的各项“收紧”政策后，布氏得出结论，苏联是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逆转”（reversal）。^①换句话说，苏联回归了旧日的沙俄传统。

3、政治文化论

政治文化或者政治传统论调是布热津斯基 1975 年提出来的。如果说 15 年前他对沙俄与苏联政治的比较还仅限于行政部门这个相对狭小的范围的话，那么 15 年后布氏的比较已经扩大到整个政治领域，对于历史传统也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在他看来，俄国政治传统或曰政治文化包括八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pp. 37-60.

个方面。当然，这些方面都是从国家与社会相互关系角度来论述的。(1) 权力集中于政治机体而非社会机体；(2) 权力集中于极少数，通常是一个人手中；(3) 官方版本的真理至高无上；(4) 将国家等同于神祇或历史；(5) 其他集团从属于国家；(6) 国家所有制以及国家控制农民；(7) 定期进行社会改造 (social engineering) 或“自上而下的革命”；(8) 认为政治反对派等同于叛徒，公民权利从属于政治利益。布热津斯基认为，随着时间流逝，历史间断性在苏联政治中显得不再那么重要。相反，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持久性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述俄国政治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产生了影响。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其威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一面被加以强调，其二元论式的和过分简单化的独裁式表述受到更大欢迎。其次，从政治风格和组织形式上看，列宁主义是俄国传统的延续而非终结。1917年3月由杜马产生的临时政府具有民主性质，所以它比列宁政府更具革命性。最后，斯大林通过恐怖政策和社会再造，使社会绝对从属于政治制度。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复兴了俄国的独裁传统。所以，在布氏看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并不代表传统走向终点，而是意味着传统的重生和延伸。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一场使传统获得新生的复辟 (Restoration)。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通常都指向现实和未来。既然斯大林甚至列宁身上都打上了传统的深刻烙印，那么当革命狂热逐渐消退之后，布热津斯基眼中的苏联政治开始向传统威权主义靠拢，极权主义的成分只剩下残余。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受到抵制并遭遇失败，这个事实说明传统难以抗拒。考虑到沙皇时代自由化改革最终流产，苏联出现真正的自由主义演变也将极其困难。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无论苏联如何变化，“活着的过去 (the living past) 将一直塑造俄国的未来”。^①

评价

中国有句古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看来布热津斯基先生也懂这个道理。他将苏联与沙俄做比较，力图在对连续性的追寻中发现当下。实际上，从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苏联政治，在布热津斯基前后都不乏其人。比较古今之间相似的事实，进而得出周期性或者连贯性的结论，是人们惯常采用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通过长时段的经验观察来探索人类社会规律的方法，有一定可取之处，然而，时过境迁，因缘际会，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p. 351.

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它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如何处理那些相异的事实。要证明传统的延续性，就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剪裁，就要挑选出过去与现在事实中相近或相似的部分，但不同或相反的部分仍然存在。例如布热津斯基发现，就政治风格和组织形式来说，列宁主义是俄国传统的延续。但他也承认，列宁主义具有革命性内涵和社会意义。难道这种内涵和意义没有体现俄国传统的间断性吗？应当如何处理风格和组织与内涵和意义之间的权重平衡问题？

第二，传统究竟如何作用于当代，其内在机理是怎样的？经验观察到的重复发生的事实，可能只是出于偶然。只有弄清楚传统作用于当代的理路，才能知道这种传统在未来是否会继续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传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传统可能是一种渗透到血液里的类似 DNA 的东西，世代相传。传统也可能是政治领袖成长的文化环境，传统的熏陶让他们沿着先辈的足迹领导国家。传统也可能是普罗大众生活的精神场域，传统的浸染使他们按照前人的方式对待政治和权威。所有这些都只是假设。布热津斯基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样他由传统推知未来的逻辑就大大削弱了。

四、民族问题：苏联政治崩溃的关键

苏联崩溃从纵向上看是共产党倒台，社会主义改旗易帜；从横向上看则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后者也是苏联“解体”的本来意义。民族问题是政治的重要方面，1980年代后期它成为左右苏联体制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考察布热津斯基的相关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时间流逝和苏联政治变迁，在布氏眼中苏联民族问题的分量逐渐加重。

1、潜在问题

1950年，22岁的布热津斯基对当时西方学界流行的关于苏联民族问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当时多数学者认为，如同苏联宣传的那样，其15个加盟共和国是自愿组合在一起的。然而布氏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苏联是俄国内战期间列宁暴力驱赶各民族的结果，所以这些民族之间充满了怨恨”。^①之后近20年时间，他对苏联民族议题鲜有触及。直到1968年，

^①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26.

在关于苏联发展趋势的大讨论中，他受布莱格曼（Alexander Bregman）教授的启发，开始重视民族问题对苏联政治的潜在影响。布热津斯基注意到，苏联少数民族之所以没有从苏联分离，是因为它们暂时还可以在苏联政治体制内有效实现自身民族目标。然而，无论压制还是满足，它们的要求都会有增无减。

布氏发现，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都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在布氏看来，这并非苏联一国所独有。人们还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既然加拿大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都难逃民族问题之罗网，那么苏联也难以避免。但如果苏联的民族问题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它给苏联政治造成的麻烦，将比当时种族危机给美国造成的麻烦还要大。尽管如此，布热津斯基仍然认为，民族问题可能只是个潜在的爆炸性（explosive）问题，对苏联来说分离主义或者反俄民族主义还不是一个需要迫切应对的问题。因为在苏联“任何公开的分离主义者不是已经被清除掉，就是被迫转入地下”。^①

2、演变障碍

当历史进入 1970 年代，布热津斯基发现，作为主要的抑制因素，民族问题阻碍了苏联演变。“正是由于害怕打开民族矛盾的潘多拉盒子，苏联政界上层人士和其他有关集团不敢推行宪法的以及范围较广的政治改革。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政治抱负上所受影响，可能大大削弱任何苏联自由主义者的呼吁的效力。”^②

在布氏看来，首先，通过激起大众的政治觉醒，共产主义强化了，而不是弱化了民族主义。如同东欧国家和中国所发生的情形，如今苏联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少数民族也在逐步觉醒。尽管这种觉醒的表达通常是苏联式（soviet）式的，然而它们会越来越要求更大的自治权，例如像匈牙利和蒙古那样的正式独立地位，而不是被莫斯科的大俄罗斯精英所统治。只有大规模持续地压制，才能遏制住这些有增无减的要求。但这种压制会给整个体制带来后果。^③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Concluding Reflections”, pp. 160-161; Zbigniew K. Brzezinski, “Dysfunctional Totalitarianism”, p. 386.

^② [美] Z. K. 布热津斯基著，陈观胜译：《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载《世界民族》1979年第2期，第29—30页。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p. 350.

其次，民族问题成为苏联政治体制向多元主义渐进演变的主要障碍。多元主义必然意味着给予少数民族更多自主权和自由，作为统治者的大俄罗斯人出于生存本能将会阻止这一前景的出现。在布氏看来，苏联实际上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达。出于安全考虑，在几百年时间里大俄罗斯人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持续领土扩张建立了一个帝国体系。结果导致大俄罗斯族广泛散布于许多民族地区。所以，少数民族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结果将不仅仅是分疆裂土，还有可能对大俄罗斯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布氏认为，“出于生存本能，大俄罗斯人将会继续维持独裁的、高度集权的苏联帝国体制”。^①

3、生存危机

如果说布热津斯基之前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分析，还主要停留在假设和推演的层面上，那么 1980 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则更多地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民族关系大体上还保持着一派“和谐”景象，其间产生的各种问题尚可在党的仲裁之下“内部解决”。然而，戈氏推行改革与公开性之后，随着各路民族主义势力纷纷现身，加之国内外大众传媒的鼓噪，民族问题的一角冰山陡然浮出水面，随即这座冰山又变成了即将喷发的火山。

根据苏联人口普查结果，布氏推算出有超过 6500 万苏联居民杂居在其他民族土地上。他也注意到，“从 1987 年 1 月到 1988 年年中，苏联九个加盟共和国爆发了大约 300 起民族骚乱”。^②这些冲突，特别是反抗莫斯科统治的冲突背后，是少数民族从民族语言到文化自治，到经济自决，再到政治自治，最后到主权独立这样不断递进的民族主义诉求。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苏联体制正是滋生这些民族主义诉求的温床。首先，苏联宪法中正式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享有自由分离出苏联的权利。其次，苏联势力扩张到东欧以后，它不能再使用“在国际上被孤立”这样的理由将各加盟共和国绑在一起。最后，制度失败损害了苏联作为一个联盟的声誉。少数民族渐趋将自身的相对贫困归罪于集权化的苏联国家。^③

除了制度因素以外，戈尔巴乔夫的执政路线也为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

^① Ibi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wer of a New Type”, pp. 148-151.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Post-Communis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5 (Winter 1989), p. 6;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87-90.

^③ Zbigniew K. Brzezinski, “Post-Communist Nationalism”, p. 8.

推波助澜。戈氏一上台就在是否应该改革和改革策略上面临着两难困境。^①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民族问题已经超过经济危机，成为1980年代末苏联政治中的中心问题。这中间不但有和平的修宪斗争，也有指向大俄罗斯人的暴力活动，更有少数民族间的流血冲突。^②对于大俄罗斯统治精英来说，要与其他民族共存，有两种政策可以选择：镇压与回避。镇压政策需要铲除所有民族解放运动势力，这样虽然可以有效保持权力，但将重新引发民族间冷战。经济改革因此不能推进，俄国人民将继续贫困下去。回避政策将使各民族采取实质性独立运动，俄国边界将退回到17世纪的位置，还极有可能引发流血冲突。^③这两种政策都不能带来好的结果。

布氏认为，俄国精英的最佳选择是，使苏联转变成一个真正的邦联（confederation）或者联合体（commonwealth）。在布氏看来，这是唯一能将统一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方案，它对所有人都有利：大俄罗斯人可以获得民主和繁荣，且不再是压迫者；少数民族获得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且免于因民族和领土争端而引发的暴力和冲突；外部世界将面对一个更少集权、更少军国主义、更少帝国扩张的真正的“欧亚联合体”。^④

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前后布热津斯基提及“民族”时所使用的英文单词是不同的。此前除个别例外，^⑤他使用“nationality”这个有苏联特色的词汇来称呼苏联各少数民族。然而，1975年他建议西方学者不要再用这个苏联术语。^⑥他的解释是，由于苏联宣称本国民族（nation）问题已经解决，苏联只有一个“nation”——大俄罗斯族，其他民族都是“nationality”。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接受了这种说法，并糊里糊涂地使用苏联创造的“nationality”来指称少数民族。^⑦实际上，随着1980年代后期苏联民族矛盾和冲突逐渐浮出水面，民族问题成为苏联政治进程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于是，“nationality”被布氏彻底抛弃，“nation”这个西方化的单词被重新启用描述苏联境内各个少数民族。可以说，随着苏联各民族的觉醒，布热津斯基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认识也觉醒了。

^①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97-99.

^② Zbigniew K. Brzezinski, “Post-Communist Nationalism”, p. 11.

^③ Ibid, p. 14.

^④ Ibid, p. 21.

^⑤ 1972年在“Dysfunctional Totalitarianism”一文中，布热津斯基使用过一次“nation”。见 Zbigniew K. Brzezinski, “Dysfunctional Totalitarianism”, p. 386.

^⑥ Zbigniew K. Brzezinski, “Soviet Politics: From the Future to the Past”, p. 350.

^⑦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87.

评价

民族问题是美国苏联学界关注较少的部分。事后观之，布热津斯基对其有限的研究得失兼有。他的出色之处在于对苏联民族矛盾具有敏锐的洞察力。1950年他就注意到苏联各民族之间的怨恨心理。1960年代末他又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般的高度，即当时世界还处于民族主义时代。美国有种族危机，加拿大和比利时也存在民族问题。另外，他还根据东欧和中国经验，提出共产主义强化了民族主义。首先，苏联宪法规定的正式制度安排滋生了民族主义诉求；其次，共产党关于民族解放、民族自治、提升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等理念和举措，也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布热津斯基指出的民族问题的“爆炸性”也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然而，布氏预言的大俄罗斯人将继续维持苏联体制这一点并没有变成现实，这是他的失着之处。少数民族的独立的确带来了分疆裂土的后果，但这并没有给大俄罗斯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更没有危及他们的生存。苏联解体实际上是在大俄罗斯人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用普京的话说，俄罗斯人再也不想充当各族人民的奶牛了。事实证明，布热津斯基先生对大俄罗斯人这种微妙心态的把握还欠火候。

另外，从“nationality”到“nation”，术语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布热津斯基的苏联研究走向了自觉，也昭示着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衰落。自1930年代起，许多西方学者如纪德等人被苏维埃政权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折服，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苏联官方的某些观点。许多人真心实意把苏联看成历史的火车头，认为苏联已经成功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并且为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和问题找到了良方。然而，到了1970年代，苏联的内外情势表明这个国家并没有走在历史的前列。尽管在军事上苏联采取了攻势，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逐渐无力再保持“先进性”。在很多西方人的心目中，苏联由人类希望的灯塔，变成了专制落后的象征。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布热津斯基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苏联，一个和传统威权主义政体别无二致的苏联，一个面临着和其他国家民族问题没有两样的苏联。

启示

1988年苏联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前景做出了大胆预测。他提出了五种可能。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成功。第二，旷日持久、

波及甚广的动乱 (turmoil)。第三, 改革偃旗息鼓, “停滞” 卷土重来。第四, 作为一种对第二、三种可能的反应, 出现倒退性和压制性政变。第五, 作为对上述可能组合的后果, 苏联解体。有趣的是, 尽管这些预测里面包含了“解体”这个选项, 但布氏却认为未来几年 (the next several years) 最可能发生的是动乱。以布热津斯基苏联研究凡四十年之功力, 尚有如此偏差, 可见他的研究还有改进的空间。接下来笔者准备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苏联研究思想以及他的个人经历, 对引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初步探讨。

1、莫以预测论英雄

诚然, 布热津斯基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他提出了苏联解体的可能, 但却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是动乱; 他注意到民族问题对苏联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 但却认为除非国内危机和重大国际冲突同时发生, 否则民族分离运动发生的动力不足。^①如果以预测解体论英雄的话, 布热津斯基先生免不了要面壁思过。然而, 预测问题或许只是问题的一面。1990年代有美国学者反思到, 苏联学的问题不在于谁预测了解体, 而在于谁说得正确 (who got it right), 我们从中又能学到些什么。^②如果将苏联学家们粗略的分为两派, 发现一派将苏联视为与西方类似的社会, 它正在走向现代化, 因而它是能够改革的 (reformable)。在他们看来, 苏联解体纯粹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策略失误造成的,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与错误的领导人, 合奏出了苏联崩溃奏鸣曲。从上述布氏的学术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 布热津斯基代表的是另一派。在他的分析里面, 苏联体制是独特的, 它从没摆脱传统的影响, 因而是不能改革的 (unreformable)。这种“体制论”的关键在于, 谁来当领导都回天乏术, 苏联的命运早已注定。西方学界对两派孰是孰非的争论, 实际上到现在都没有平息, 因为他们都有可取之处, 也似乎都能自圆其说。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俄国部主任卡钦斯 (Andrew Kuchins) 说了一句公道话, 他认为, 事实证明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这一派更加正确 (more right)。^③

另一方面, 预测可能并不是研究的目的, 至少不是主要目的。通过布热津斯基的研究, 美国人对苏联的理解增加了, 苏联的行为也得到了在一定

^① [美] Z. K. 布热津斯基著, 陈观胜译: 《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 载《世界民族》1979年第2期, 第30—31页。

^② George Breslauer, “In Defense of Sovietology”, *Journal of Post-Soviet Affairs*, Vol. 8, No. 3, p. 231.

^③ 作者与卡钦斯教授的访谈记录 (2010年5月4日, 华盛顿)。

解释。对一个较为封闭国家的政治进行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冷战美苏对抗的岁月。除了预测之外，布热津斯基花费近四十年时间对苏联进行的解释和理解，其中有许多教训可资吸取，有许多优点可以借鉴，这是布热津斯基的苏联研究留给世人的遗产。

2、学术观点的变化与连续之间的辩证关系

美国著名冷战史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布热津斯基一直对流行话题和概念有偏好，随着变化的环境对它们或者采纳或者抛弃。^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考察布氏的苏联研究思想，从恐怖极权主义到自愿极权主义，从演变到蜕化等等，我们发现他使用的术语确实一直在变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政治中的暴力色彩明显减少，这使得阿伦特、弗里德里希等学者改变了“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的论断。布热津斯基也不再强调清洗的永恒性，他后来甚至承认他的博士论文《永恒的清洗》中的观点是错误的。^②再如，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苏联政治的前途尚不明朗，布热津斯基用“演变”这个词，到了1970年代，他发现了苏联政治中领导人素质下降和共产党应对社会变迁的乏力，所以提出了“蜕化”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布热津斯基的苏联学确实是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的。

然而，变化只是布氏苏联学思想的一个方面。他对于苏联的根本认识并没有大的改变。尽管1960年代以后极权主义模式广受批判，1970年代西方又出现了从积极角度看待苏联的修正主义学派，但直到苏联解体，布热津斯基一直没有放弃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定位，而且根据这个框架认定，蜕化衰朽的苏联体制不可能改变，而且也不可能对它进行成功变革。而且，除了1950年代短暂地强调苏联体制的独特性，其后三十年他一直关注苏联和沙俄之间政治文化方面的连续性。他对苏联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的强调也是一以贯之的。从他的硕士论文开始，他就充分注意到了苏联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1960年代末他做出了民族问题对苏联具有爆炸性影响的论断，1980年代则认为民族问题是苏联体制演变的障碍。可以说，他思想的变化性是建立在连续性的基础之上。

^①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92.

^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查尔斯·盖蒂（Charles Gati）的课程《俄帝国的兴衰》讲义记录（2010年2月，华盛顿）。

3、学者个人经历影响学术观点

布热津斯基的出生地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历史上曾被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二战中波兰被希特勒占领，冷战中又成为两大集团对峙的前线。对布热津斯基来说，这一历史背景难免在其思想上留下烙印。对此连他自己也不否认。当美国有人指责他的观点是从波兰血统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时，他强调自己在哈佛受到的处理苏联事务的系统化教育和训练更加重要，但他也承认，在波兰度过的童年对他苏联问题的观点有重要影响。^①

他童年时对苏联的印象来源于父亲。1930年代中期，他父亲被波兰外交部派往乌克兰（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曾目睹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盛况”。很多人失踪，一些精英人物刚同他父亲吃过饭，几周后就被逮捕处决。父亲曾把这种故事讲给小布热津斯基听，这对他幼小心灵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二战爆发之时，他正跟随父亲驻节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听到苏联紧随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根据他的回忆，当卡廷事件^②被揭露出来以后，他当时毫不怀疑背后凶手就是苏联。战后波兰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他只能流落他乡。而苏联正是布热津斯基新的祖国——美国的敌人（他1958年加入美国国籍）。可以说，布热津斯基是怀着国耻家仇进行苏联研究的。

1995年12月，布热津斯基被波兰政府授予非军人最高荣誉奖章——白鹰勋章，以表彰他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及辞职以后，为支持波兰走向民主而付出的努力。在致辞中他说，年轻时代被迫离开波兰以后，他就决意进入美国政治生活，以影响美国对波兰的政策，促使祖国脱离莫斯科重获独立。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要帮助祖国的愿望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认知，又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他的学术观点。

4、学者的政策影响力问题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自然科学中的事实与研究目的没有关联，

^①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p. 76-77.

^② 卡廷事件，是指1940年春波兰战俘被集体枪杀的事件。1939年9月，苏联乘德国入侵波兰之机，出兵占领寇松线以东波兰领土，并俘获大批波兰军人。次年4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4421名波兰军人被处决。后该地区被德军占领。1943年4月，德国占领当局宣布在卡廷森林内发现被杀波兰军人尸坑。苏联政府旋即声称此事与己无关，而系德军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事件成为悬案。1990年4月，苏联正式承认事件制造者为当时的苏联内务部门。——《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2卷（H-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209页。

并且相互分离；而政治学研究目的本身就是一种事实。政治学研究的事实可以通过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例如，马克思写《资本论》为的是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实际上，他的研究也确实改变了这种态度。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事实的过程中改变了这类事实。^①布热津斯基就有通过著书立说改变美国外交甚至苏联的强烈愿望。而且希望通过传播他的思想观点，来影响这个世界。

据曾经多次采访布氏本人的传记作者沃恩（Patrick G. Vaughan）说，布热津斯基从未想要仅仅作一名学者。自从 1950 年进入哈佛大学（位于波士顿）起，他的目的就是影响政策。^②十年后，因为没能获得终身教职，他去了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当哈佛再以优厚条件邀请他回来时，他拒绝了。他后来回忆说，对于有政治倾向的活动家（activist）来说，纽约是一个更好的平台。在学术界获得第一桶金以后，1960 年代后期布热津斯基曾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任职，随后又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竞选。^③除了政府部门以外，他还大力结交媒体，通过请客吃饭和鸡尾酒会等多种方式扩大影响力。^④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频繁露面，1960 年到 2000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作者也是他。1970 年代更是参与发起三边委员会，其最重要成果当然是吸收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加入。从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位卸任以后，布热津斯基又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John Hopkins SAIS），它位于美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

作为美国知名的苏联学家，布热津斯基不仅在美国影响很大，其著作也为苏共高层所知。从 1950 年代后期到 1980 年代后期，苏联官方先后秘密翻译过数百本西方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书籍。当然这些书的读者仅限于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成员。布热津斯基有三本著作进入了这个“秘

^① [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②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269.

^③ David 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3 and p. 417.

^④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77.

密书单”，是入选著作最多的作者之一。其中两本是关于苏联政治和美苏关系的，即《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1962）和《竞赛方案——美苏竞争行为的地缘战略框架》（1970）。^①另一本《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角色》一出版就受到苏联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广泛注意。关于受到注意的秘诀，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只有故意使用（共产党人）习惯的历史分析范畴，这本书才能在共产主义世界获得最大的影响力。^②通过《真理报》和塔斯社等渠道，苏联曾经多次点名指责布热津斯基在东欧和苏联进行煽动性活动。^③甚至苏联解体以后，布热津斯基还与哈耶克和阿伦特一起，成为俄罗斯政治学教科书引用最多的作者。^④

布热津斯基的学问做得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达到了影响政策的目的。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坐而论道，起而疾行。布氏用半生精力分析苏联政治，虽然他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但他影响了世人对苏联的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苏联走向崩溃。布热津斯基的学术思想可圈可点，他走过的不寻常道路也引人深思。

（责任编辑：李洋）

^① Vladimir G. Treml, *Censorship, Access, and Influence: Western Soviet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Research se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no. 102, 1999), p. 17 and p. 50.

^②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143.

^③ Patrick G. Vaughan,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ife of a Cold War Visionary*, p. 255 and p. 313 and p. 323.

^④ [俄]科洛米采夫著，李国海译：《“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7期，第3页。

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文化因素解读

李沛*

[摘要] 在经历了激进的西式民主改革后,转型中的俄罗斯形成了独特的权威主义,将集权与民主的特征都囊括其中,同时还包含着一定的合法性和延续性。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帝国意识和文明结合部的两难文化形态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有重要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传统专制文化与民主政治文化相互激荡、吸收、妥协,帝国意识中的强国理念与国力衰微的现实差距成为俄罗斯独特权威主义兴起的重要政治文化因素。

[关键词] 俄罗斯;权威主义;文明结合部;帝国意识

2012年5月8日,尽管反对派再次举行了反对普京上台的示威游行,但普京依旧以高达63.6%的支持率“王者归来”,顺利就任总统。这意味着俄在转型过程中兴起的权威主义体制可能延续至少6年,甚或更长的时间。纵观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演变,权威主义的兴起尤其引人注目,而且独具特色。这一过程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有着紧密联系。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①因而,政治文化提供了解读俄罗斯权威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正如帕斯特(Pastor)所言:“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分析家已直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对外政策目标各不相同”。^②

一、俄罗斯的权威主义

(一) 权威主义的概念

* 李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② [美]罗伯特·A·帕斯特主编,胡利平等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权威主义 (Authoritarianism) 又称威权主义或威权政体。^①作为一种政治形态, 其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南欧国家, 二战之后普遍存在于东亚、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权威主义的探讨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对于权威主义, 学界并未形成一致的概念。1964 年, 林兹 (Linz) 定义了权威政体的基本特征: 政治多元化受限, 特殊威权心态下主导意识形态的缺失, 政治动员能力的有限性, 政治领导人行为的可预见性。^②亨廷顿则将权威主义解释为“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 但政府对社会中其它群众经济地控制是有限的”。^③我国学者罗荣渠认为, 权威主义是指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非军人统治的高度压制性的政权。^④阿根廷学者奥唐奈 (Donnell) 则把拉美出现的权威主义体制定义为“官僚威权主义”。^⑤

虽然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理解纷繁多样, 但大致可将权威主义初步界定为: 不同于西方典型民主政体的一类政治体制, 往往是由具备一定现代意识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建立起的, 政府高于社会的, 介乎于极权主义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政治体制。这一类政治体制有可能具备西方政治体制的所有外壳, 但是背离其精神实质。俄罗斯现有的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类特殊的权威主义政体。

(二) 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兴起及延续

俄罗斯政治经历了一次由西方民主政治向权威主义政治的转变过程。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俄罗斯建立起权威主义体制并不断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思潮兴起并占重要地位。

1993 年 12 月, 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 通过了新宪法, 在法律上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根据宪法的规定, 俄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 但总统拥有极大的权力, 集内政、外交、行政、立法和军事于一身, 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 形成了一种总统独大,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弱小的

^① 关于“Authoritarianism”一词, 国内较为普遍的有三种译法, 即“权威主义”、“威权主义”或者“威权政体”, 但实际都是指同一政治现象。因而本文不加区分。

^②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p. 255.

^③ 亨廷顿:《亨廷顿谈权威主义》, 载《世界经济导报》, 1989 年 2 月 27 日。

^④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74—275 页。

^⑤ 参见[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著, 王欢、申明民译:《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 南美政治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译者前言以及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与民主问题》。

失衡局面。因此，俄罗斯这种总统制又被称为“选出来的君主制”。以叶利钦在 1996 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开始形成一种强人政治为标志，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最终确立。

普京上台执政后，进一步发展了权威主义政治，强调国家权威，构建了“可控民主”体制，被西方认为是“民主的倒退”。^①在政治上，一改叶利钦时期所谓的“协商的联邦制”颓局，加强联邦对地方的控制，打造垂直政权体系。^②同时，打击寡头政治，迫使寡头从权力中央疏离。^③在经济上，又实行以俄国传统和文化为核心、汲取西方市场经济一般制度原则，政府“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新制度。正如普京指出，“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④然而，在国家权威之下产生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权威。普京作为一位政治强人，在俄政坛上始终保持着中心地位。在 2004 年的总统大选中，普京就以高达 71.2% 的支持率连任，被称之为“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2008 年总统大选后，“梅普组合”上台主政，意味着在普京个人魅力影响下的权威主义再次得到民众认可。2012 年虽然出现多次由反对派组织的反普京游行，但是依旧不能阻止普京在民众支持下重返总统宝座，这反映了权威主义仍然得到了民众认可并具有延续性。

（三）俄罗斯权威主义的特征

如果详细分析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政治，能够发现其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威权主义政体的特征。

第一、权威主义具有牢固的合法性。与拉美、非洲等军人政变上台的政府不同，俄罗斯的权威主义不是靠武力压迫确立的，而是在民众的选举

^① 其中比较代表性的观点可见：Robert Kagan, “History’s Back: Ambitious Autocracies, Hesitant Democracies”,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2008/08/25/history-s-back-a-ambitious-autocracies-hesitant-democracies/2d4e>; [俄]安德烈·索尔达托夫，伊琳娜·博罗甘著，臧博、吴俊译：《谁在掌控俄罗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Richard Sakwa 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可见：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② Anders Aslund, Sergei Guriev, and Andrew C. 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ashington D. 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pp. 71-76.

^③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eds., *After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 166.

^④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 年 12 月。

支持下产生并不断得到发展的。权威主义是民众的选择，体现民众的意识。俄罗斯民众不但没有出现“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①的情形，反而在俄罗斯现行体制下连续十年出现经济增长的奇迹，使得民众对体制普遍认可。可见，其合法性还具备牢固的有效性基础。

第二、在权威主义之下的民主进一步成熟和规范化。俄权威主义政治没有放弃西方民主制度的议会和政党制度，反而使它们的作用得到加强。如俄罗斯的多党制逐步得到规范，并受到一系列法律的保护，政党现在将议会作为主要斗争场所，通过议会斗争对政府施加影响。另外，虽然三权制约体系中存在不均衡的一面，但总统的权力也受到议会一定程度的制约。俄罗斯权威主义始终处在法律的约束之下。法律对民主自由权利进行肯定和保障，甚至反对派的政治权利也得到法律保障。2008年，普京没有利用个人的威望修改宪法以求连任，而是遵守宪法不再连任总统；2011年12月以来多次爆发的反对普京的游行，得到政府许可，并未发生暴力事件都是很好的说明。

第三、俄权威主义具有较强的延续性。这种靠民众选举的权威主义，多次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接受。目前来看，俄罗斯现有的权威政体受到了两大挑战：第一，因特网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种网络媒介在组织示威活动方面表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第二，普京竞选过程中做出了高额的社会支出承诺，由于俄罗斯财政收入极易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这给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形势蒙上了阴影。^②但是，纵观10多年的政治演变，从1996年确立至今，权威主义不衰反兴，不断得到加强。2012年5月8日，普京就任总统，意味着“今后至少6年、甚至12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各项内政外交处置得当的话，有可能是在一个政治强人的统率下，朝向完善国家构建和社会经济稳定的复兴之路推进”。^③这不仅仅是在说明梅普的换位，而且也说明俄权威主义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牢固性。

^① [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0页。

^② 2012年4月19日，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教授Stefan Hedlund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讲座时，就明确提到了上述两点。更为具体的论述可参见即将刊发的2012年第2期的《俄罗斯研究》中Stefan Hedlund发表的文章。

^③ 冯绍雷：《“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第3页。

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一方面体现出民众的选择,具有西方民主化色彩,现代化形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权威特性,具有集权的特质和非均衡性的政体特征。这种权威主义不再是传统上的专制集权主义政治,而是一种与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延续性的独特政治结构模式。

为什么俄罗斯会形成这种独具特色的权威主义呢?在探究这一现象的原因时,无论归结为经济增长的需要还是简单地认为政治文化的传统都无法充分解释这一现象。^①如果从政体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有两种可依据的观点:强势的观点认为实施某一特定的发展战略需要具备政治先决条件;弱势观点认为,威权主义政治对某一特定战略是“有用的”,尽管经济目标本身不足以解释政体的变化。^②一种解释认为民众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支持权威主义,并因为权威政治促使经济的增长而让其延续。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俄罗斯经济的确是在权威主义确立后才得到持续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没有理论上的原因认为威权主义政体是唯一能够解决与发展相联系的集体行动问题的政体”。^③权威主义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经济需要也无法充分解释俄罗斯权威主义的独特性。因此,要全面揭示俄罗斯权威主义兴起的原因,就需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揭示这一独特现象的文化因素。正如阿尔蒙德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④但如果仅仅是将原因归结为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形态,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1990年代能够抛弃原有的政治文化而接受西方政治文化?为什么在1990年代偏离西方政治文化但却没有回归传统的政治文化?需要揭示导致俄在特定时期产生这一特殊体制的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化因素,并且发掘其起作用的方式和过程。只有这样,才

^① 有关俄罗斯权威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国内学者已经进行过较多分析,代表性的可见黄永鹏:《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第44—94页;李英男:《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兴》,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第33—36页;臧秀玲、王金珍:《俄罗斯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回归的根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21—125页。

^② [美]斯蒂芬·哈格德著,陈慧荣译:《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92页。

^③ [美]斯蒂芬·哈格德著:《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第293页。

^④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能为解释俄特殊权威主义兴起，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补充。仔细分析贯穿俄民族深处的文化，可以发现至少有两个因素在塑造体制的特殊性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明结合部的两难文化和帝国意识。

二、文明结合部的两难文化

毫无疑问，在诸如日本、中亚等处在不同文明交汇处的结合部地区一样，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文明结合部。但其在地理、文化及国际影响等诸多方面远远超出其他文明结合部，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国土辽阔，汇聚了东西不同的文明，形成了与欧洲文明及亚洲文明均不相同的传统文化。正如强调俄国是“东—西方”（Востоко-запад）的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所言，“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①所有这些使俄罗斯形成独特的结合部文明形态及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即俄罗斯文明的多样性。其形成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救世主义的东正教理念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是其政治文化的主流。

一方面，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亲东方的色彩特别浓厚，东方的集体主义、国家权威和专制主义思想对其文化有突出的影响。

俄罗斯在 988 年引入了东正教，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专制王权思想在早期就影响着俄罗斯。东正教视圣母为全人类说情的人，所以东正教徒为这种说情不断地祈祷圣母。^②不仅如此，圣徒崇拜在东正教信仰中也占重要地位。^③因此，在其东正教特征中就包含着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因素。12 至 15 世纪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占领也给俄国带来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影响，因为“俄国人成功地照搬了蒙古政治和行政制度”。^④其后长达数百年的沙皇专制思想一直独占鳌头，资本主义从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哪怕是曾

^① [俄]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俄罗斯思想》，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② [俄]С·Н·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44 页。

^③ [俄]С·Н·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第 147—148 页。

^④ [美]С·J·霍尔珀林：《对蒙古帝国中俄罗斯的比较研究》，载《世界民族》1986 年第 4 期，第 41 页。

试图引进欧洲的开明专制主义思想，如彼得大帝曾以“普善”的口号，推行全面的改革；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曾以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学生”自居，并将启蒙学者狄德罗请入宫中，最后证实这不过是利用欧洲时髦理论而为我所用。沙皇的这些行为巩固、强化了其专制统治，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专制王权思想，使其专制制度逐渐成为俄政治文化的核心。^①在苏联时期，斯大林建立起来的集权政治体系，也使专制思想得以延续。正如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所引述：“在沙皇时代，我们国家是独裁统治，而现在我们国家是极权统治，但是这个极权国家仍然是从俄国的过去脱胎而来的。”^②俄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政治文化有深深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文化积淀，并且体现出对传统的“记忆和态度”，具有延续性的一面。这种深厚的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也必将对往后俄罗斯的政治演进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俄国始终又是一个向往西方，具有西方文明形态的国度，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

正如冯绍雷教授所言：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一千多年历史变迁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便是：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互关系。^③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精英和平民取法欧洲的持续努力有目共睹。^④俄罗斯引进东正教，加入基督教文明，就已开始吸纳西方文明，在其民族的基因中就已经有了西方的血液。即使是蒙古鞑靼的占领，也没有完全隔绝其与西方的联系，与西方始终保持着文化、商业的往来。彼得大帝的改革更是“西风东渐”的表现，体现的是对西方的效仿和融入西方的努力。甚至，沙俄帝国的扩张与西方因素紧密相关。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的扩张都取决于进口欧洲的制度、技术甚至是军事和行政干部。^⑤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思想始终影响着以后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不管是18世纪反映在俄罗斯诗歌上的对起源于法国的古典主义的继承，^⑥还是“十二月党人”起义背后的文化因素，或是十

^① [美]劳伦斯·迈耶著，罗飞译：《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②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俄国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4页。

^③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

^④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第8页。

^⑤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

^⑥ 任光宣编：《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7页。

月革命，都难逃西方的文化影响。苏联时期，苏联最为重要的重心也是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激进式的政治改革，倡导“民主化”、“公开性”，更是引入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体现。

正是俄罗斯的这种文明形态造就了其一种两难的政治文化形态：始终处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选择和无法将两者调和的矛盾之中。在政治文化上体现出的就是一种精英和平民身上都固有的矛盾政治心理。被誉为俄罗斯民族“良心”的索尔仁尼琴（Солженицын）身上所体现出的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矛盾情怀，^①可以说部分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这一矛盾心理。这一心理也往往迫使俄罗斯在无法调和东西方文明冲击的关键时刻，做出无奈的妥协，以调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造就的现实矛盾。这就是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文明结合部的两难文化。

三、帝国意识

如果说文明结合部形态的两难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俄罗斯传统文化相较世界其他结合部文明的特别之处的话，那么其传统文化特质中的帝国意识便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

俄罗斯的帝国意识与其自身的帝国传统有关。俄罗斯以帝国的形态存在了许多个世纪，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其帝国时代才一去不返。由版图狭小的基辅罗斯起家，莫斯科公国不断扩张和壮大，终于在沙皇伊凡四世时期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雏形。^②一经形成，俄罗斯帝国就成为世界帝国中的一个特殊和重要的帝国。正如列文（Lieven）所言，沙俄帝国是这个帝国“俱乐部”中的重要一员。^③帝国不可避免的就具有对外扩张性。^④正如，叶卡捷琳娜大帝所言，“一旦停止生长，便会开始腐烂”。^⑤与扩张性伴随而来的就是固有的大国心态和强国心理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意识——帝国意识（或是帝国心态）。

^① 可以参见尹继武：《索尔仁尼琴：一生为大俄罗斯“帝国”》，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第86—87页；[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第271—314页。

^② 潘兴明：《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第4页。

^③ Dominic Liev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p. 9.

^④ 关于帝国扩张的依据和理论可见：[美]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章。

^⑤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2—3页。

俄罗斯的帝国意识不仅仅来源于帝国传统，而且还来源于帝国传统和东正教文明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通过宗教力量把帝国意识融入民族意识之中。拜占庭的帝国历史，给俄罗斯提供了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意识。另一典型例子就是菲洛弗长老阐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为沙俄的集权和扩张性提供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沙俄提供维持帝国形态的理论根基。同时，也应看到，俄罗斯帝国意识的渗透也绝不仅仅依赖于东正教文明，两者之间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17世纪，牧首尼康实行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很大一方面就和沙皇政府意图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与新教徒渴望实现“神圣罗斯”精神思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关。^①这体现出，在宗教手段之外，俄罗斯帝国也会运用强制力等手段将帝国意识植入民族文化之中。例如，苏联就运用高压渗透其帝国意识。

俄植入帝国意识的种种手段造成的结果就是帝国意识在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使得“帝国意识深深扎根于社会，渗透到各种层次的文化之内，在民众心理中打下了烙印”。^②甚至俄罗斯的文化精英意识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具备帝国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析亚洲问题时写道：“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者和奴仆，而到亚洲我们则是欧洲人。使命，我们在亚洲的文明传播使命定会感动我们的心灵，将我们吸引到那里去”。^③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也体现出“在俄国人的‘普遍性’的障眼法的后面隐藏的是对于中部欧洲的弱小国和民族、有意识地视而不见”。^④这种帝国意识渗透力之强，甚至还深深影响着曾经遭受帝国统治的国度。如俄对乌克兰的影响上，“无论如何，俄罗斯不仅存在于许多乌克兰人的意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现代乌克兰知识精英意识之中。这是长期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帝国文化政策造成的后果。”^⑤

帝国意识一经形成，便不会因为帝国的消亡而迅速消亡，其最重要的表征就是后帝国怀旧情绪。这种情况在俄国历史上早已发生过，而且非止

^① 任光宣主编：《俄罗斯文学简史》，第20页。

^② [俄]E·T·盖达尔著，王尊贤译：《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31页。

^④ [美]埃娃·汤普逊著，杨德友译：《帝国意识：俄罗斯文学与殖民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乌克兰版前言”。

^⑤ [美]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罗斯文学与殖民主义》，“乌克兰版前言”。

一次。^①在后苏联时代的当今俄罗斯，这种后帝国怀旧情怀同样存在于俄罗斯文化之中，尤其是随着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不断衰微，就越发强烈地表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民众呼声。就如盖达尔所言，在当前的俄罗斯，倾诉后帝国怀旧之情的事例数不胜数。^②这种怀旧的背后，便是一种强国的诉求和对通过集权重振大国雄风的渴望。

四、被迫的妥协

（一）妥协的背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

在苏联统治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激进的政治改革，倡导“民主化”、“公开性”，人为地引进西方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并迅速灌输进人民的思想之中，使苏联在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掀起了一场政治文化灾难。对苏联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使得苏联社会思想严重扭曲。随之而来的是民众非理性的西方民主倾向，否定一切权威，否定任何集权，崇尚和迷信西方式的民主。一时间在苏联社会中盛行一种思想，即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民主才能给民众带来美好的未来，西方民主是拯救国家的灵丹妙药，还认为俄罗斯要回到“文明大家庭”甚至成为西方最辉煌的民主国家。正如许多普通百姓所认为的：“我们向往的是过好日子，而要过好日子，就需要一定的民主改革；现在我们的国家搞的很糟糕，我们要支持民主派上台干点事情，可能会好一些。”^③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呼声中，苏联迅速瓦解，权威和集权、专制一样被抛弃。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引入在俄罗斯这一文明结合部之中，再次上演了一次不同政治文化的冲突。只是这一次是西风压倒东风，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专制、集权因素彻底被打压。

然而，没有尊重俄罗斯传统的做法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依旧存在于民众的意识深处，即使是压制，也只是暂时的，一旦历史条件成熟便会以某种形式凸显出来。西方民主政治的确打破了原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给人民带来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和言论自由等等，同时也将西方政治文化引入了政治生活之中。但西方

^①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 2 页。

^② [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第 2 页。

^③ 李英男：《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复兴》，载《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33—34 页。

民主政治文化并没有在俄罗斯这块文明结合部中获得彻底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其与传统政治文化的不相容性，两者发生了激烈对抗，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期在社会、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混乱中都有所体现。社会及政治生活中，街头政治盛行，造成流血冲突；社会动荡不安，治安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新的政权体系几乎陷于瘫痪；分裂思想也开始盛行，民族分裂倾向日趋明显，国家主权统一面临着威胁。在经济上，西方式经济思想指导下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大幅度下降，几乎面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两极分化严重。在外交政策上，追随西方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却换来俄罗斯是美国“小伙伴”的二流国家的国际地位。

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之下，加上转型前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整个俄罗斯社会在那时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形态：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和团体皆插手全局政治，但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①

（二）无奈的妥协——权威主义的兴起和延续

1、俄罗斯的两难选择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俄罗斯人民从盲目中清醒过来：西方民主政治不能救俄罗斯，它并不是灵丹妙药，抛弃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依旧在思想的深处影响着俄罗斯，必须对传统的文化加以回归。甚至以前盲目崇拜的西方民主政治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中开始遭到贬斥。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Giulietto Chiesa）就曾写道：“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为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②西方现代的民主政治已失去合法性的基础。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对现在的俄罗斯来说稳定和秩序比自由还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发展的利益要远远高于民主利益。而且，国家要强盛和发展，需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没有这两者的稳定，国家的发展很难实现。正如亨廷顿所指出“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能有自由而无秩序”。^③在俄罗斯几家权威社会研究机构 1993 年以后连续几次所做的社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把秩

^① 有关普力夺社会形态可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60—214 页。

^② [意]朱利叶托·基耶萨著，徐葵等译：《别了，俄罗斯！》，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3 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6 页。

序与安全放在关注的第一位。^①此时的现实呼唤新变化，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开始在俄罗斯出现了反弹。

在改革中一直受到压制的传统政治文化开始回归，尤其是其中突出的集权因素和独特的帝国意识在人们的思想中又开始出现：人们希望有铁腕人物和强力政权出来稳定社会并振兴经济，提升国际地位。但经历过沙皇专制和苏联高度集权的统治阵痛的俄罗斯，不可能再接受传统帝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回到沙皇专制体制或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因为在西方政治文化指导下的激进改革确实给民众带来了民主自由思想，并已经深入人心，民众内心拥护民主；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框架也已基本确立起来了，并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这一系列因素造成了俄罗斯不可能回到原来的体制中去。这样的现实状况，再一次加剧了俄罗斯的文明结合部形态的两难文化现象，出现了两难的选择，伴随着俄罗斯长期的争论再次摆在面前：大西洋主义还是欧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苏维埃主义；多元的、个性的和自治的市民社会还是以国家为中心的集体主义。^②这种两难的境界也需要俄罗斯在自由和政府的效率，构建市场经济与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强大的政府与发展民主之间寻求一种妥协。

2、妥协下的选择：权威主义的文化因素分析

在一系列两难的现实选择面前，俄罗斯固有的文明结合部形态中的两难文化以及帝国意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权威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两难文化影响下，加上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情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俄罗斯面对极其严峻的文化冲突以及国内一系列残酷的现实，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妥协之路。在意识到全盘接受西方政治文化所固有的缺陷后，很快利用其特殊的文明结合部形态，重新将西方政治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集权和权威文化进行调和。既不排斥西方文化，同时也捡起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将两者包容在一个看似不可能成立的政治体系之中，建立起一种以民主为框架，以集权为内核的，独具民主与专制结合特色的新型的权威主义政治。这一框架成功实现了先建立权威，之后再对其进行限制的政治设计。这种政治体制的建立是基于两难选择的妥协，而其目标很明确，即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秩序和强大。

^① 黄永鹏：《俄罗斯权威主义的历史传承与现实选择》，第48页。

^② Richard Sakwa, *Putin: Russia's Cho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p. x.

这一选择是无奈的妥协，是因为“将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向往一个强力领导人”，^①而是正如普京所言，“一个弱国家的形态对于民主的威胁在任何程度上都不比专制权力差”。^②这实际上开创了一条具备俄罗斯特色的文化调和之路。这种权威主义政治是对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也是对此前一味追求西方政治的拨乱反正，是符合俄罗斯现实的正确反映，也是俄罗斯在探索中的历史性进步。恰如著名政治学家安·米格拉尼扬（А·Мигранян）所说的：“不应将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混同起来。对俄罗斯来说，权威主义并不比庸俗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桥梁。”^③这种权威主义政治正在俄罗斯人民的实践基础上得到证明：它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秩序和稳定，同时还能让俄罗斯享有民主和自由，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国力的恢复，部分地满足了俄罗斯民族内心深处的帝国意识需求。因此，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势不可挡。

自上台后，普京不断完善这一独特的权威主义政治，较为成功地调和了两种文化的冲突，现实与帝国理想的差距，从而在俄罗斯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即使是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中间阶层的不断成熟，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这一权威主义体制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来自不同层面的冲击。但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无法找到更为有效的政治路径，对权威主义的选择依旧是俄罗斯人无奈的妥协。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在 2012 年的大选中还能够毫无悬念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这一体制还会延续，只是依旧还会受到矛盾心态的制约，在矛盾中无奈地寻求更好的妥协之路。

（责任编辑：周生升、孟维瞻）

^①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著，唐贤兴等译：《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36 页。

^② Richard Sakwa,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425.

^③ 《俄罗斯主要社会思潮》，
http://219.141.235.77/upload/file/20070125003620_8017.htm（最后访问：2012 年 5 月 27 日）。

多元化与国际化：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邹磊*

[摘要] 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加强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凸显。然而，在史实重建与个案累积尚且缺乏的时候，中国外交史又面临社会史、新文化史带来的严峻挑战。与中国不同，长久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始终处于同领域的顶尖水平，本文考察了 1970 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在研究方法、取向、视野上受到的质疑，以及学界对此做出的回应，希冀这对未来中国外交史研究能提供些许启示。未来的中国外交史应加强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之间的互动；突破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重视非传统议题、非精英及观念因素的作用，并寻求多元视角的外交史；尽可能与国外同行交流，将自己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并凸显中国外交史的国际关系史特征，将外交史的国际面向与国内面向作为整体进行考察。

[关键词] 美国外交史研究；社会科学方法；多元化；国际化；中国

一、前言

伴随着现代外交主体、形式、层次、议题、场域的多元化，外交活动早已不是少数大国及其外交官可以垄断的了。但就外交史研究而言，真正对此具有浓烈兴趣和持久关怀的，却还是大国，尤其是新兴大国。一国国力之盛衰，往往对其外交史研究影响巨大。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西欧，取得了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外交史研究的中心舞台，也由西欧移向美国，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势转移”。长久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始终处于同领域的顶尖水平，其研究取向、理论诠释，乃至问题意识都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外交史研究。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使得这种对外影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反观中国，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加强中国外交史研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凸显。然而，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是在史实的重建，还是个案的累积，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 邹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若没有扎实的基础工作，宏观的理论诠释只能是空中楼阁。也正因为，虽然饱受争议，种种西来的中国外交史诠释典范至今依然难以被取代。

与此同时，社会史、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等取向与思潮又对传统政治史、外交史研究产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说美国外交史尚因其基础研究的扎实，而能在面临挑战时得以调整、自新。那么，对于中国外交史而言，情况则更为严峻。年轻学者普遍对外交史缺乏兴趣，纷纷将目光投向更为时髦的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这种转向又与大众文化的流行相契合。无论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是历史学领域，真正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不仅大陆地区如此，台湾地区亦面临着外交史边缘化的困扰。^①在日本，用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略显悲观的话来说，中国外交史研究更已近乎“绝学”。^②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无疑是一个亟需正视的问题。

就当前台海两岸外交史学界所遇到的挑战而言，有些亦是美国外交史研究曾经或正在经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美国外交史研究某些面向的回顾，亦是对未来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前瞻。也正因为，本文拟考察 1970 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在研究方法、取向、视野上受到的质疑，以及学界所做出的回应与反省，希冀对未来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些许的启示。限于本文的篇幅与笔者的学力，此种考察只能是概略性的。

二、历史与理论：外交史与社会科学方法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查尔斯·梅厄（Charles S. Maier）曾于 1980 年撰写长文，批评美国外交史研究“原地踏步”，如课题陈旧、手法单调、视野狭窄、不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他认为上述原因使得 1970 年代的外交史研究“无法被算作历史学的前沿领域”，呈现出没落之势。梅厄所开出的药方之一，就是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③

二战以后社会科学的强势扩张，对历史学造成了很大挑战，“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一度是历史学的热门议题。相较于社会科学理论的简洁明了，

^① 唐启华：《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载《兴大历史学报》（台湾）第十五期（2004 年 10 月），第 207—210 页。

^② 引自川岛真教授 2011 年 9 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演讲。

^③ 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G.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55-387.

历史学尤其是传统外交史研究对史料的高度依赖就显得“琐碎”和“枯燥”。传统外交史研究建立在多档案对照和解读的基础之上，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要求甚高，非一朝一夕所能至。相比之下，社会科学方法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迅速为研究者（即便是初学者）提供一套强有力的分析与解释框架，并且广为运用，这是历史学研究所无法提供的。

因此，在社会科学的冲击下，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坚持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开始大量借鉴（既有借鉴，也有被动接纳）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①2004年版的《解释美国外交史》一书，堪称对近年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借鉴其他史学领域与社会科学方法的总结。国际关系理论、官僚政治、心理学、国家安全、合作主义、世界体系论、依附论、边界边疆、现代化等理论或取向占据了全书的一半篇幅。^②

作为联系最为紧密的两个研究领域，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对话长期为学界所重视。强调大国、权力、军事、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传统外交史之间相互契合。然而，二战以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涌现、低级政治议题的“高级化”、军事手段作用的下降等，都对现实主义造成了挑战。^③然而，对于现实主义而言，更为致命的打击来自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它无力解释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何无法战胜物质实力远无法抗衡美国的越南。

1979年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之后，强调体系因素、以科学理论自居的新现实主义迅速支配了国际关系学界。^④在学理上，新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领域中的“后修正派”交相辉映。著名的外交史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借鉴新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了二战后美苏之间为何能维持长时间的和平。^⑤然而，冷战的突然结束，却给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号称“科学理论”的新现实主义带来

^① 翟强：《八十年代的美国外交》，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26页。

^② Michael J. Hogan &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 [美]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⑤ John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4 (Spring 1986), pp. 99-142.

了巨大冲击，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学者事先注意到了冷战两极体系的突然崩塌。以此为契机，外交史学界开始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性与局限性。^①加迪斯也重新强调外交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差异，并肯定叙述、推理、直觉、想象等“非科学因素”在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②在长时间经历国际关系理论的强势冲击后，外交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重新得到了肯定。

因此，若回到梅尔开出的药方，可以发现，社会科学理论虽然对外交史研究有所裨益，但亦非万能灵药。社会科学方法及理论有其限度，在对其适用范围有所确认之前，不能对此过于迷信。^③反观中国，无论是人员，还是知识，国际关系与外交史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都少之又少，大陆与台湾皆然。外交史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并不积极，更谈不上主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抱持着非常审慎的态度。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兴趣似乎更在于对近期或当下的中国外交做理论诠释或是政策解读，而非进行更为长时段的外交史探索。这固然与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理论导向”的研究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滞后紧密相连。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中，外交史课程所占比重日渐减少，这无疑更加强了两个研究领域间的隔阂。

因此，对于中国外交史而言，一方面要加强外交史的基础研究，以尽可能重建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研究，以尽可能澄清理论的效力与限度。与此同时，也应推动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对话。冷战史学者张曙光曾经呼吁加强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互动，他认为“历史实证”与“理论指导”之间的相互参照与相互验证，无疑将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化^④虽然张先生立足于冷战国际史，

^①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58; Paul W. Schroeder,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ot Use or Abuse, but Fit or Mis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64-74.

^②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 58.

^③ Melvyn P. Leffler, "Responses to Charles S. Maier's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5, No. 1 (Fall 1981), p. 380.

^④ 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结：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7—14页。在此思路下，寻求冷战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对话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探索。可参阅王栋：《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63—91页；柯庆生著，詹奕嘉译：《东亚社会主义同盟与美国的遏制战略（1949—1969）》，载李丹慧主编：《冷

指向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是对于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亦是重要的启发，这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研究路径。^①

更进一步而言，未来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中，不仅应该推动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二者之间的对话，还应推动外交史、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这三者之间的对话。近代中国外交展开的前提即是西方的国际法体系，一度被学界忽视的北洋政府的修约努力，亦是围绕着国际法而展开。^②若缺少了国际法这一维度，便无法理解近代中国外交，也无法对国际关系理论有更深入的省察，反之亦然。

三、新文化史的冲击：走向多元视角的外交史

传统外交史书写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主要关注上层精英的活动，外交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往往由物质力量来界定。可以说，传统外交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国家中心、精英导向、物质主义的特征。而这恰恰是最为后起的社会史、新文化史所诟病的地方。

梅厄认为，外交史研究的僵局“部分反映了学者们对书写精英和掌权

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5—72页。

^① 台湾学者唐启华、张启雄教授的相关研究体现了以中国外交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参阅唐启华：《北京政府末期“修约外交”决策机制刍议（1925-1928）》，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7页；唐启华：《追求中国之平等：修约与废约的探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主办：“革命和改革：辛亥革命与辛亥建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月8-12日；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88—114页。近年来，日本学者对清末中国与藩属国关系的转型的个案研究，也为进一步建构相应的理论提供了可能。如冈本隆司用“属国自主”这一源于中国自身，且无法为西方国际法的主权/属国框架所涵盖的概念探讨了清末中朝关系的实际情况，参见[日]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關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日]冈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關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东京：讲谈社2008年版。中缅关系的个案，参见[日]箱田惠子：“《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考析：兼论晚清外交之特性”，载[日]《史林》第88卷第2号（2005年3月），第223—258页；中琉（球）的个案，参见[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中越（南）的个案，参见[日]冈本隆司：《属国与保护之间：以1880年代初期的清法越南交涉为中心》，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3期（2010年5月），第83—116页。

^②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唐启华：《论“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35—147页。

者感到厌恶”。^①相应地，关注下层、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吃喝玩乐的社会史，则正好填补了传统政治史、外交史研究留下的空白。这不仅契合了学者与大众的需要，也对后者的正当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强调观念、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性别、种族、历史记忆的新文化史兴起时，外交史研究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这种冲击，美国外交史开始了自身的调整与回应。国家中心、精英导向、物质主义的外交史逐渐走向多元视角的外交史。具体而言，它意味着要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同时关注低于或高于民族国家层次的行为体；它意味着将研究对象延伸到少数决策精英之外的社会下层及边缘群体；它还意味着要正视观念、文化、记忆等非物质因素在塑造对外关系时的重要作用。

同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外交史学界围绕着“外交史的国际化”这一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它对全球化时代外交史研究开出的药方与社会史、新文化史有诸多契合之处。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SHARF）主席的迈克尔·霍根（Michael J.Hogan）在肯定传统外交史依然有其价值的同时，呼吁“不仅要超越民族，而且还要超越国家，超越那些影响国家政策形成之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若我们是真正的是对外关系史家，而不只是外交史家，必须探讨全球性人权运动、国际妇女运动、宗教运动与种族冲突等与政府政策无关的主题”。^②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亦竭力主张“国际关系史不只是政府间的历史，或是代表政府的个人与组织的历史。国际迁徙、环境变迁、资金流动、文化交流、科技转移、宗教、种族、妇女、人权、跨国公司、NGO，凡此种跨国力量及其人性特质都应当被认为是‘作为国际史的外交史’应予以认真对待的主题”。^③事实上，从2000年以来美国外交史顶级刊物《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所刊的论文来看，霍根与入江昭的呼吁得到了部分的响应。宗教^④、环境^①、劳工^②、国际学生^③等主题，都得到了重视。仅以

^① 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56.

^② Michael J.Hogan, SHAF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8, No. 1 (January 2004), p.14.

^③ 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47-62.

^④ Andrew Presto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5 (November

最新一期 (January 2012)《外交史》而言,其主题即是“音乐与美国外交”。

④音乐这一兼具文化和跨国双重色彩的主题,无疑契合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双重转折。

正如梅尔文·莱夫勒 (Melvyn Leffler) 所归纳的,今天的美国外交史不仅研究权力、政治、国家,研究国内社会团体、少数民族;研究神话、象征、意象和集体记忆的形成;也研究跨国公司、工会和慈善团体,还研究美国消费文化、个人自由及市场经济观念的海外传播。^⑤可以说,“新旧

2006), pp. 783-812. 从 2000 年起,《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 几乎每年都会刊登至少一篇与宗教相关的外交史论文。See Andrew J. Rotter, “Christians, Muslims, and Hindus: Religion and U.S.-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54”,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pp. 593-613; Robert Dean, “Commentary: Tradition, Cause and Effect,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pp. 615-622; Robert Buzzanco, “Commentary: Where's the Beef? Culture without Power in the Stud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pp. 623-632; Patricia R. Hill, “Commentary: Religion as a Category of Diplomatic Analy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pp. 633-640; Seth Jacobbs, “Our System Demands the Supreme Being: The U.S. Religious Revival and the ‘Diem Experiment’, 1954-1955”,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5, No. 4 (Fall 2001), pp. 589-624; Roy Palmer Domenico, “For The Cause of Christ Here in Italy: America's Protestant Challenge in Italy and the Cultural Ambiguity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4 (September 2005), pp. 625-654; Matthew F. Jacobs, “The Perils and Promise of Isl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slim Middle East in the Early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4 (September 2006), pp. 705-739; David Zietsma, “Sin Has No History: Relig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U.S. Intervention, 1937-1941”,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3 (June 2007), pp. 531-565; Paul Chamberlin, “A World Restored: Religion,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2, No. 3 (June 2008), pp. 441-469; Mark Edwards, “God Has Chosen Us: Re-Membering Christian Realism, Rescuing Christendom, and the Contest of Responsibilities during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1 (January 2009), pp. 67-94; Andrew Preston, “The Politics of Realism and Religion: Christian Responses to Bush's New World Orde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4, No. 1 (January 2010), pp.95-118; Joseph Kip Kosek, “Book Review: Faith in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5, No. 1 (January 2011), pp. 125-128; Philip E. Dow, “Romance in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rly Cold War U.S.-Ethiopian Relations, 1941-1960”,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5, No. 5 (November 2011), pp. 859-895.

① 参阅《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 杂志 2008 年 9 月 (Vol. 32, No. 4) 出版的以环境为主题的专号, 共计 5 篇文章。其中, 包括了入江昭的评论性文章。See Akira Iriy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2, No. 4 (September 2008), pp. 643-646.

② 参阅《外交史》2010 年 9 月 (Vol. 34, No. 4) 出版的以劳工为主题的专号, 共计 6 篇文章。

③ Paul A. Kramer, Bernath Lecture: “Is the World Our Campu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U.S. Global Power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5 (November 2009), pp. 775-806.

④ 参阅《外交史》2012 年 1 月 (Vol. 36, No. 1) 出版的以音乐为主题的专号, 共计 6 篇文章。

⑤ Melvyn P. Leffler, “New Approaches, Old Interpretations, 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9, No. 2 (Spring 1995), pp. 174-175.

并存”，各占半壁江山。也正因此，《解释美国外交史》一书在 2004 年做第二版修订时，相较于 1991 年的版本，更多地反映了“近十多年来文化史转向及全球化的新趋势”。^①边疆、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文化、文化转移、语言、性别、种族、历史记忆等主题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这无疑显示着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走向多元视角的外交史呢？莱夫勒认为，它将很有可能为美国史学界做出重大贡献，而这取决于外交史同行能否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与更大的美国史学社群相联结。在他看来，这样的联结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外交史家历来重视权力和国家；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联；紧握住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聚焦话语、政治和政治动员，关注比较历史和跨国历史；能够揭示美国例外论的主题。从长远来看，与其他领域的美国史家最有效的联结，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以下课题：国家政策的形成；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权力在国内外的组成与行使；过程与事件的关联；认同的建构过程与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与海外在政府、社会、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互动；国内舞台的发展与国际体系的变化之间的动态互存。正是基于以上的宏伟蓝图，莱夫勒乐观地认为，外交史研究不仅不是梅厄所描述的“原地踏步”，而是正在走在时代前列。^②诚然，这一论断正确与否必须接受时间的检验。

对于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在面临社会史、新文化史的严峻挑战时，不如抱持开放的心态，尝试与其进行对话。外交史只有接受各种不同面向的交流与启发，才有可能在目前的危机中得以自新，将危机转化为机遇。新文化史家若也能立足于多档案对照或扎实的史料，其提供的外交史研究即便另类，又何尝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呢？若能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并将眼光放宽到精英以外的个人与群体，重视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心态、历史记忆等非物质因素，中国外交史在走向多元视角的同时，亦将迎来复兴的契机。

四、国内史与国际史：外交史的两个面向

通常而言，美国外交史研究具有相互交织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面向，

^① Michael J. Hogan & Thomas G. Paterson, ed.,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 2.

^② Melvyn P. Leffler, “New Approaches, Old Interpretations, 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s”, pp. 175-176, and p. 196.

一是国内史，其焦点集中在国内社会力量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二是国际史，主要讨论国外力量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遭遇时的影响和限制。^①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推动下，国内面向的外交史逐渐重视种族、性别、宗教、NGO、传媒等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国际面向的外交史在延续传统议题研究的同时，亦开始触及一些新的方向。

然而长久以来，由于美国一直处于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成了世界的代名词，其外交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也尤为明显。这不仅限制了其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阻碍了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进程，也使得美国外交史家难以获取“美国观点”以外的新视野。这些都使得美国外交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滞后于其他史学领域。正如迈克尔·霍根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会长演讲中所批评的，即便美国外交史学已经日趋多元化和国际化，但它仍落后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美国史已有的国际化成果恰恰来自非外交史学者。^②

因此，跳出美国中心的国家论述的限制，将美国外交史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中，与国外同行密切交流，以国外经验平衡“美国观点”，就成了努力的方向。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计划”（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堪称这一趋向的典范。它成功地结合了全球各地（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观点和学者专长，从而使得美国外交史的国际面向得到很大发展，而这又反过来对理解其国内面向有很大助益。

对于中国外交史尤其是民国外交史研究而言，亦存在着这样的契机。民国时期的中国，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在其间纵横捭阖，又何尝不是一部完整的国际史呢？各国的外交档案现在基本都已解密，这无疑有着比“冷战国际史”更好的史料基础。同时，相较于后者，又能更少地受到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若能整合各国外交史学者的力量，拓宽研究的视野，作为国际史的民国外交史应当是值得期待的“下一个重头戏（the next big thing）”。^③

同时，当列强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后，内政外交已

^① Michael J. Hogan &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 40.

^② Michael J. Hogan, “SHAF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1-21.

^③ Michael J. Hogan,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 21.

连成一片，难以分开。^①这就使得民国外交史的国内面向和国际面向在根本上难以区分，甚至可以说，国内史即国际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长期主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冲击—回应”模式因其过于强调外力作用而饱受批评，^②但它依然提示了一个重要的面向：若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的外交，就无法理解其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变革。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转型，正是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展开的。外交是内政变革的出发点，也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民国外交史研究何尝不是“在国际发现历史”呢？长久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深受苏联及美国的影响，其概念运用、理论诠释、研究取向，甚至问题意识都有浓重的苏联及美国的影子。若能整合更多不同背景的学者、史料与观点，对于中国外交史跳脱出苏联/美国视野，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中国的崛起，诸如“中国的国际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等已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议题，它与时下“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社会心态和宏观背景相互契合。其中，尤以柯伟林(William Kirby)、^③徐国琦^④、张勇进^⑤等学者的研究最受国际瞩目。就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这固然是一条可供思考及尝试的路径，但亦存在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具体而言，为什么百多年来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包含了我们中国人所有的屈辱、痛苦、理想、激情等情感与记忆），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语汇中，被转换成了中国抗拒、挑战、参与、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为什么中西关系这一晚清以降中国学人的核心问题被转换成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西关系原先是中性的描述，但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就含有了价值判断。即，“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成为了“国际主流

^①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William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150 (June 1997), pp. 443-458; William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China Quarterly*, Vol. 188 (December 2006), pp. 870-890.

^④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Guoqi Xu,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uoqi Xu,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吴翎君：《从徐国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谈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新史学》（台湾）第22卷第4期（2011年12月），第183-215页。

^⑤ Yongjin Zhang,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20: 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Yongjin 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社会”的代名词。它意味着中国应该主动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之前的抗拒、挑战与游离都是错误的。于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挑战”既存的国际体系和“对抗”国际主流社会。由此，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正当性就被消解了。然而问题是，没有了中国的“国际社会”（世界），还能称为“国际社会”（世界）吗？“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前提即在于中国不属于主流社会，这是否暗含着自我边缘化甚至野蛮化的倾向呢？笔者赞同对近代中国全球化历程的历史考察，但是，与此同时，上述问题却也值得省思。

五、结语

19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取向和视野受到了诸多的挑战与质疑，挑战既来自社会科学领域，也来自其他历史学分支，同时也来自外交史学界自身。所涉及到的，都是外交史研究中较为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外交史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与调整，试图处理外交史与社会科学方法（历史与理论）、外交史与新文化史、国内史与国际史等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尽管存在着许多“学情”与“国情”的差异，但美国的同行们为使外交史摆脱困境所做出的努力，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未来中国外交史应该努力尝试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进行互动；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与新文化史进行对话，突破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重视非传统议题、非精英及观念因素的作用，以寻求建立多元视角的外交史；应该尽可能与国外同行交流，将自己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凸显民国外交史的国际关系史特征，并将外交史的国际面向与国内面向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应该正视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史实与神话之间的张力，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成熟的心智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命运。

中国大陆的崛起，为海峡两岸的中国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两岸学界若能寻求更为密切的互动，无疑将会对这一领域产生推动作用。20世纪以国共为代表的两条救国、建国道路最终导致的是国共内战，以及1949年以后两岸的全面对峙，也导致了两岸以及全世界中国人在心灵上的分裂，并且延续至今。近代中国的巨变始于外交，笔者希冀海峡两岸的中国外交史研究能为弥合心灵、重建认同做出努力，并体现出现实关怀。

（责任编辑：孟维瞻）

“古希腊思想地图”专题



引言：古希腊是一个世界。在这个文明的场域中，各城邦相互分离却又一致发展。由于存在着经济上的差距和政治上的不同，各邦国之间不是为了争夺海陆霸权而斗争，就是为了获得银矿、市场和资源而冲突。同时部族的不同、宗教的差异、风俗习惯和法律的多元造成各邦相互嫌弃。由此，诸神，从雅典的雅典娜、弗西斯的阿波罗到萨拉米斯的阿佛罗狄忒和诸人，斯巴达的埃杰斯、莱奥尼达，雅典的西蒙、地米斯托克利，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成为希腊人尊崇的对象。这种神人构成的巨大的思想网将人之天性充分发挥。英雄成为整个世界(从神到人)的核心。而整个希腊的历史无一不是围绕着英雄的世界展开的：

伯利克里的成功与失败

——雅典民主制的悲哀

俞岚*

古希腊历史学家的叙事方式，总是带着一种令人神往的传奇笔法，字里行间的人物仿佛不经意间就跃然纸上，纵然缺乏严谨的考证和客观的历史视角，但是更激发了我们对古代历史的思索和考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者往往通过人物的演讲、行事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发展，上册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第二卷第四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伯利克里的演说”。在这篇演说词中，伯利克里以鼓舞的方式安抚了民众失去亲人的情

* 俞岚，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绪，表达了他作为城邦领袖的政治主张，从中体现他高明的政治手段、天赋的军事才能和强大的修辞技巧，配合雅典在这次战争中民众表现和局势变动，更能从一个侧面窥得雅典民主制的弊端，而伯利克里本人的一生经历也从此被人们所怀念和传唱，成为一个真正的希腊英雄。

这一场葬礼发生于伯罗奔尼撒人从阿提卡撤退后的冬季，按照惯例，雅典人对于那些首先在战争中阵亡的人给予公葬，伯利克里由于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和领袖地位被推举为演讲人。在这篇演讲词中，他首先提及了雅典人的历史，歌颂了父辈们的功绩，强调了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雅典，其最为傲人之处在于其政治制度。我们知道，希腊人的政治制度代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巴达人的幼儿从小接受军事训练，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生而为战斗而存在，极少有个人的私生活，因而其对外政策也保持着刻板 and 严肃，时刻准备着应对叛变的奴隶；而雅典人推崇民主，伯利克里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雅典有公民大会，可以允许不同的意见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得到聆听，允许拥有才能的人参与管理城邦。雅典人骄傲于自己稳定、独特而又充满个人活力的政治体制，讽刺了斯巴达剽窃克里特人的政治模式建立军事管理方式，限制普通人的娱乐和私人生活。此外伯利克里还赞颂了雅典人拥有丰富的社会娱乐，以及他们的战士在战争中表现的勇敢和忠诚的品质、对美的不懈追求和对邻国慷慨的施舍。自此，伯利克里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他使雅典人为自己的城市而光荣，从而为所有为城市建设和防伪做出贡献的人而骄傲，以荣耀安抚烈士家属的情绪，是古代世界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平复民心的方法。

这一演说，虽不一定是伯利克里的原话，我们仍能从中体会到任何一个雅典人都会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自豪，为城邦的强大而自信，修昔底德本人也认为“这时正当雅典的全盛时期”。然而一场瘟疫使雅典受到严重打击，炎热、拥挤的人群和不良的卫生条件使瘟疫蔓延，连与雅典对战的斯巴达人也因怕染上瘟疫而撤军。愚昧的民众将此归罪于伯利克里的穷兵黩武，责备他高傲自大、藐视神意，决定让他接受巨额罚款，以发泄愤怒。这已不是伯利克里第一次受到质疑和责备：他的好友斐狄亚斯接受了建造雅典娜神庙及女神像的任务，结果受到了攻讦，最终病死狱中，仅为他在女神像的盾牌上雕刻了伯利克里的肖像。不能否认作为政治家，伯利克里的权力欲以及为达到某些目的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并不光彩，但民众对此不

依不饶。他们赶走了僭主，也赶走了真正的领袖。伯利克里在瘟疫中丧失了众多亲人好友，他在小儿子墓前痛哭，打破了一贯优雅的形象，而自己也染上瘟疫，缠绵病榻，不治而亡。临死前他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雅典人从来没有一个是因为我而穿上丧服的”。

雅典民主制的一大弱点在于权力下放太多，每个公民承担的责任太多太重，难免会做出感情用事的决定。民主政治虽然意在体现每个公民的意愿，但更需要理智的决策。雅典公民担任官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必须为雅典公民的婚生子、祖上是否在雅典附近有田产、品德是否良好等等。在被选举为官员以前经由前任官员或者公民大会的成员对这几项条件进行试验，而官员的才干并不在试验范围之内，这样的选拔的确符合了哲人当政的理念，却不是选拔良好政治决策者的有效方式。同时，作为一个雅典公民必须参加多种会议，如当地区域的财政会议、城邦关于修建神庙的会议、是否要征服西西里的会议等等，聆听各种演讲和辩论并为决策投票，每一项都牵涉到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家人、子孙的幸福。这样高强度的理性生活和他们对品德的严格要求使得雅典人对领袖的要求过于严苛，领袖的品德是否良好成为了他能否拥有权力的一大标准。此外，民主政治使雅典人对“平等”有了深刻的体会，而民主政治并没有改善贫富差距和社会上的不公，因此，面对富人、当权者（一般当权者都是富人）民众怀有更挑剔的眼光甚至带有些许敌意，领袖的些许错漏便会导致民众群起而攻之，将之赶下权力的宝座，名为预防僭主破坏民主政治，实则打压权贵平心中义愤。综上，我们能看出民主政治并非仅仅让每个人表达自己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它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性的决策者或者决策机构运筹帷幄，辅以公民大会和各个机构加以监督并对决策团体委以一定的信任。让适合的人做合适的事，才是一个政府良好运作的前提。

伯利克里的成功失败犹如一篇史诗。他的容貌：大头大头，如许悲愁；他的辩才：无论对手多伟大，他都能够驳倒你；他的举止：神态安详，声调有力；他的事功：尼克西利所兴建的雅典卫城的“山门”；他的权力：城市的税收和贡金连同本身的存亡继绝，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置；他的抱负：召集亚欧各地希腊人，协商雅典，扩充帝域；他的指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的爱情：亚帕斯蒂亚，顶礼膜拜的色欲女神都将这位人物丰沛心灵，复而让其成为民主国家“君王”。

希腊的历史盛衰于战争。若薛西斯没有入侵希腊之土，谁又会想到馬拉松和薩拉米斯？希羅多德也不會存在。更不必說精彩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了。修昔底德的“人性”寫法，凸顯了希臘人的“情感”：渴望，歡樂，威武，雄壯，恐懼，擔憂，困擾，安寧和悲壯。

正如修昔底德在分析戰爭起因時候提到：

因為圖利的普遍欲望，弱者安於忍受強者的統治；那些因為獲得財富而勢力強大的人則控制小城市。——對利益的訴求

照我看來，他之所以能夠募集遠征軍進攻特洛伊的原因，不是由於同盟者對他的忠順，而是由於同盟者對他的畏懼。——對強權的恐懼

古老的政體是世襲君主制，君主有確定的原則和限制；但是因為希臘的勢力增加，獲得金錢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收入增加，造船事業興旺，於是他們的野心開始傾向於海上勢力了。——對財富的渴望和對權力，領土擴張的追求。

（瘟疫發生之後）人們看見幸運變更得這麼迅速，這麼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過去一文莫名的人現在繼承了他們的財富，因此他們現在冒險做放縱行為，這種行為在過去他們常常是隱瞞起來的。

而城邦的情感，却是這些戰爭給希臘帶來最為豐富的遺產：

斯巴達

生命的意義不是在於達成個人的目標，在於城邦的整體利益。

傳聞蘇斯王帶領斯巴達人，征服阿卡狄亞，變希洛人為奴。我們於此孕育拉斯第蒙的精神。曾有人對逃難者萊克格斯說：“我們確有兩位國王，他們只是穿著皇家的服飾，享有君主的頭銜，談到心靈的本質與臣民毫無區別。”這位賢人回國進行新政，首設元老院。28位貴族連同2位國王，共同執政斯巴達。在這個城邦，沒有金銀，僅有鐵幣流通。財富無法給人帶來榮譽與尊敬，公民無需為了生計四處奔波。生活方式如同生活於軍營一般，公餐制度長期實行，因為“甘於這種飲食的人就不會反叛賣國”。

偉大的精神在方陣。戰士們戴著花環，笛手吹奏卡斯特贊美詩的旋律：凱旋、凱旋。步伐合於節拍，陣式井然有序，心情毫不緊張，面容非常安詳，莊嚴又恐怖。

雅典

我们爱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自信的哲学，自豪的政治制度和自强的雅典人总是胸有成竹。民主是雅典的实质，我们崇敬梭伦、克里斯特尼和伯利克里，但我们更尊重自己。生存于伟大的城邦，处于蛮族包围之中，需要军事操作锻炼强壮之躯，加强智慧的熏陶。与斯巴达类似，雅典之所以在世界上享有更多的名誉，在于从来不向困难低头，用勇敢和生命获得更为强大的帝国。

情感的自由释放雅典娜的灵气。雅典人在苦难之中更多使用开朗的心情和抵抗的正义。纵横海面勇战而没，我们驱逐的不仅仅是大流士和泽尔西斯，也有狂妄自负的伯罗奔尼撒和西西里的叛逆。

科林斯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科林斯人。

只有黄金才能塑造城邦的辉煌。财富能带来一切价值，包括繁荣、梦想和力量。我们崇拜一切让自己充满美德的神灵，他们赐予科林斯除了财富，财富还是财富。战争始于科林斯，雅典人的强权仅在科林斯的脚下止步。我们不畏惧一切威胁，痛恨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决定。科林斯人不畏惧霸权，自由的精神赋予科林斯人手之巧气、心之灵气。

科林斯定下的原则，哪怕是雅典人都应该服从。因为我们所制定的标准是经过希腊人讨论后认同的。公平地对待科林斯比什么都重要。

底比斯

斯巴达的荣誉被在下的战略夺去，而神圣的麦西尼最少亦夺回其孩子。迈加洛波利斯因底比斯的协助成功建成围墙并受到保护，而全希腊赢得了独立与自由！

如果说斯巴达和雅典是靠着精神和勇力获得成就的话，底比斯的成就恰恰在于情感和魅力。底比斯人相信古希腊世界，真正的爱恋存在于同

性之间。摔跤中，训练中，音乐中，无处不弥漫着一种近乎完美的感情。仇视物欲，憎恶压制，解放是底比斯人的信条。希洛人的今天时时刻刻警醒着底比斯人。

底比斯人的英雄，除了天上的太阳阿波罗之外，还有引导全希腊解放的伊巴密浓达。底比斯国虽发生过俄狄浦斯的悲剧，但光明始终让此国力克希腊霸权，走向昌盛。

科西拉

——以革命中“理智与情感”考虑

李娜*

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由于伊庇丹努的争端，科林斯与科西拉兵戎相见。在伊庇丹努附近的两次海战中，一些科西拉人被俘：除去被科林斯人转卖的原是奴隶的俘虏，其余被拘禁起来的“二百五十人”，“大多数是在科西拉很有势力的人”，科林斯人极为善待这些俘虏，“希望将来有一个时候，他们可以回去，使科西拉再转到科林斯这一边来”。而后，这一计划确实也得以实行，这些被贿赂收买的科西拉人回到国内，引起了科西拉的流血党争。最初，这些归国的俘虏个别地和一些公民商谈，想使城市脱离雅典，但在人民的公开辩论中，未能实现目的；后来又控告民主党领袖佩西阿斯（也是雅典利益的代表），反遭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其他反对党人一起刺杀了民主党的领袖佩西阿斯及其同党，结果引起科西拉贵族党与民主党内战的全面爆发。之后雅典和伯罗奔尼撒两大势力开始干涉这场内战，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最终民主党获得胜利。而这种胜利带来的并非和平，而是更为血腥的“大清洗”，“他们杀掉所有他们能够找着的敌人。那些被他们说服而上船舰的人，在上陆时也都被他们杀死了”，他们说服了部分在神庙祈祷的贵族党人，让他们去接受审判，而结果都是被处以死刑。科西拉人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屠杀着“他们自己的公

* 李娜，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这些被杀害的人中，有些仅仅是因为私人纠纷。而后，希腊各个城邦接连爆发类似革命，民主党领袖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贵族党领袖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整个希腊世界受到波动。

针对“科西拉革命”这一事件，修昔底德作了较为长篇的评述，其中“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战争是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以下”等话语尤其引人注目，让人深感人性的悲哀和政治的堕落。但除了表面所展现的“人性的罪恶”和“历史的循环规律论”这类习见的看法，是否可以在这段评述中找到其他别有深意的内容？

二

提及希腊的特征和个性，似乎可以在两大传统中寻找：一方面是荷马史诗以来诗人传统中昂扬的情感^①；另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哲学传统中对理性的重视。前者如荷马的《伊利亚特》。阿伽门农因老羞成怒而夺走阿喀琉斯的女俘，阿喀琉斯会因为一时愤怒，不顾大局，宣布退出战斗，并对阿伽门农破口大骂。^②在得知好友帕特洛克罗斯死于赫克托尔之手后，阿喀琉斯痛不欲生，在刺死赫克托尔后，更是对其尸体加以野蛮凌辱。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故事里，爱神阿佛罗狄忒会因嫉妒希波吕托斯尊重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而实施报复，美狄亚会因为成为弃妇而在愤怒中对亲生儿子痛下杀手等等。我们在这些诗作中，看到的诸神和人物通常是“任性”的，他们行事往往是凭着一时意念，一腔热血，或者一时之愤恨。与此不同，苏格拉底的哲学传统则强调理性。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四卷中，将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Nous），欲望（Epithumia），激情（Thymos）^③，认为理性应当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应当一致赞成理智，而不反叛。

^① 这里的“情感”，主要是运用行为心理学中“情感”的概念，其作为一种生命冲动的存在，基本上包括人的感情、欲望、情绪。而“理性”则主要是控制住这种生命冲动，一种节制的力量。

^② 很多学者对此，将其引申出“反抗专制”或者“分配正义”等深意，但简单一点看，阿喀琉斯的形象更像是一位单纯的英雄，血气方刚，易于冲动。

^③ Thymos 一词，有多种译法：“激情”、“意气”、“血气”等等。“激情”的译法，主要取自郭斌和、张竹明所翻译的《理想国》。但刘小枫先生主编的《血气与政治》一书中，将其翻译为血气，而这一翻译也事实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林国华老师在课堂上也将此词翻译为“血气”。

激情应服从并协助理性，理性在激情的协助下领导欲望。由此，我们可以在希腊性格中看到一种情感（Emotion）与理性（Reason）的抗争。

在关于“科西拉革命”的章节中，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种昂扬而激烈的情感。例如“猛烈的热忱是真正丈夫的标志”，“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人们倾向于先发制人，行为极端。而究其原因，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是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以及伴随着斗争产生的“激烈的疯狂情绪”。而情感的缺陷在于其经常像一锅沸腾的水，猛烈地冲撞着，急切于寻找宣泄口，因而在缺乏理性束缚的情形，疯狂而又激烈的行为时有发生。在“科西拉革命”中，“有父亲杀死儿子，有从神庙中拖出，或者就在神坛上屠杀的”。在后续革命中，出现很多“新的暴行”，人们更加处心积虑地夺取政权，更加残忍严酷地进行报复。在党派斗争中，各个党派看重的既不是正义，也不是国家利益，只要能取得斗争优势，其他毫无顾忌。即使对方党派的言论合理正确，也同错误言论一般被戒备、阻碍，“他们惟一的标准是他们党派一时的任性”。因此，战争是严厉的教师，使大多数人的心智降低。这种“心智降低”是否指一种理性自制的缺失，任由情感左右人的行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这种评述是否除了人性的悲观主义，还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在探问人性中不可回避的弱点，而这对整个政治制度的设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弱点是否是一种脱离理性节制后人类情感的弱点？如果确定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弱点，是否可以在教育、法律、政治制度上进行一些努力？

三

“科西拉革命”造成的灾殃是否会是一种历史循环规律，有待深究，但“科西拉革命”确实预示着整个希腊的悲剧。在“科西拉革命”中及其后续的革命中，大多数人为失去理性制约的情感所控制。而这导致的后果，从政治上看，一方面，政治的激进主义犹如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般，邪恶的气味充满整个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能在情感上进行煽动的演说家、政治家往往受民众推崇，“那些能够发表动人的言论，以证明他们一些可耻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受到赞扬”。但这些人继承过去理性政治家的领袖地位时，其实也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希腊的崩衰。理性政治家如伯利克里，他在《战争史》中引得修昔底德大加赞颂：贤明、廉洁，能够领导人

民等等。据苏格拉底之见，伯利克里也是具备统治者、护国者资格的人。而煽动者——那些之后充当领袖的人，则为私欲、冲动的情感左右，缺乏理性节制，按苏格拉底的理论看来，本没有资格左右城邦政治。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演说家执掌了希腊大多数城邦的政权，同时，希腊各城邦却变得日益衰落，“它们装作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活力，并且拿一种徒有其表的独立来傲然自夸”。

密提林：恐惧

佟鑫*

公元前 427 年夏，伯罗奔尼撒联军在谷物成熟之际进兵亚狄迦，继续破坏田地和房产的策略。雅典后院起火，列斯堡全岛除麦提姆那外，以密提林为首的雅典盟邦，在斯巴达人和彼奥提亚人支持下叛乱。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原因的核心阐述。发生于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 427 年的密提林暴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恐惧。

密提林人在要求加入由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演说中这样评价他们和雅典的关系，“我们的同盟关系是由于畏惧，而不是由于友谊来维持的。任何一方在任何时候，首先觉得破坏盟约能够使自己安全的时候，它就会破坏这个盟约的”。密提林对雅典的恐惧使其破坏条约以求安全，雅典对密提林的恐惧则使其镇压叛乱。

密提林的恐惧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洛同盟的逐渐转变。“同盟的目的是解放希腊人，使他们免受波斯人的压迫，而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只要雅典人在领导的时候，尊重我们的独立，我们是热心跟随他们的。但是当我们看见他们对于波斯的敌视愈来愈少，而关心奴役他们自己的同盟者愈来愈多，于是我们开始恐惧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战争时期，同盟者是独立的国家。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体力量解放遭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防御波斯再次入侵。但随着东方威胁逐渐淡化，提洛同盟丧失了存在的理

*佟鑫，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由，逐渐从“联盟”变为“帝国”。雅典人由亚狄迦的主人一跃成为全帝国的主人，原提洛同盟诸国成为雅典的属国，国民亦沦为雅典属民。提洛同盟变成雅典维持帝国生存发展及对外扩张的强有力工具。属国国民时刻准备起义，以摆脱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雅典民主制全盛时代的到来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勒索与剥削本国奴隶和盟国，因为要维持甚至不断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要脱离体力劳动获得闲暇来参加政治活动，在经济上都是极为浪费。雅典很多盟国在帝国中逐渐成为廉价劳动力市场、原材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对其盟国的经济剥削窒息了古希腊城邦的自治。

二、密提林在提洛同盟中地位尴尬。雅典的纳贡同盟国有两类：大多数缴纳贡金，少数则不纳金而出船。“在这些同盟国中，开俄斯、列斯堡和科西拉供给船舰；其余同盟国供给步兵和金钱”。雅典决定先发制人制止密提林暴乱时曾扣留其在雅典舰队中服役的十条三列桨战舰。密提林等列斯堡国家和开俄斯、科西拉在提洛同盟这个多阶帝国体系中位于中间位置，隐约可以看出，雅典对密提林这类负责提供船舰的国家的重视程度，是优于不出船只纳贡的国家，而这种地位也会造成一种尴尬。伯利克里曾指出“我们目前的整个世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陆地和海洋；每个部分都是对人有价值和有用的。这两部分中，整个一个部分是在你们控制之下——不仅是现在在你们手中的地区，而且其他的地区也在内，如果你们有意扩张的话”（p166）。雅典对制海权的重视使其强大在军事上主要体现为海军的强大，因而其对密提林等盟国的恐惧在战时要远大于对其他国家的恐惧，因为前者的叛乱可以增强斯巴达的海军实力。越强烈的恐惧相应产生越强烈的控制，反而引起更大的离心力。

三、前车之鉴。密提林不是第一个叛乱者，但它是战争发生后的第一个叛乱者。在对卡里斯都开战后，“那克索斯叛离同盟，于是雅典人对它们作战。在被围攻之后，它被迫又忠顺于雅典了。这是原来的同盟宪法遭到破坏的第一次例子，一个同盟国丧失了它的独立。这些暴动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交纳贡款或法定数量的船舰，有时完全拒绝提交船舰。雅典人坚持严格履行义务；他们对于那些不惯于牺牲的同盟国进行严重的压榨，因此他们丧失人心”。另外公元前446年，优卑亚叛乱。“雅典人在伯利克里指挥之下，又渡过海峡，攻入优卑亚，征服了全岛。优卑亚将来的地位，在条约中规定：只有赫斯提亚的居民被雅典人驱逐，他们的土地被雅典人占领了”。同盟国是雅典力量的基础，靠暴力维持的帝国即使从最基本的安

全考量也会对其严惩。此类暴动让密提林人看到了雅典的真面目，看到对叛乱者的处罚会带来更残酷的奴役，丧失更多主权。“我们能够保全独立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费尽心血以讨好雅典的民众会议和他们各个主要的政治家。但是从他们对待其它国家的办法中，我们得到了教训：如果不是这次战争爆发的话，我们绝对没有希望能够保持得多么久了”。因此，密提林的恐惧在雅典前车之鉴的思考中呈增长之势。

四、雅典的扩张趋势。“他们把那些和我们平等的国家控制了之后，如果他们有能力做的时候，很可能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雅典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的帝国，是战胜波斯而来的荣誉、对城邦安全的担心，和维护城邦利益三方面原因所迫。雅典人勇于冒险的精神不仅将其冲到了海洋也冲到了陆地。“当人们有机会利用他们的优越势力得到扩张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因为这种考虑而放弃的”。随实力增长日益强化的强者意识提供了其扩张动力。而雅典外向型经济某种程度上也要求持续对外扩张。所以战争后期雅典要倾尽国力远征西西里。“如果我们这些同盟者还都是独立的话，我们比较相信他们不至于改变现有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大部分已经被征服了，而只有我们被看作平等者，自然他们会反对这种大部分同盟者均已屈服而只有我们独立的局势，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势力愈来愈大而我们外面的支持愈来愈小了”。密提林看到这种扩张趋势，自然对自己的独立地位相当担忧。

“如果我们有和他们一样的能力，可以计划进攻，可以推迟的话，那么，我们和他们是势均力敌，也用不着做他们的属民了。事实上，他们所处的地位，随时可以向我们进攻：我们的自卫也应当先发制人”。密提林将自己的叛乱视作“自卫”，自卫行为的来源无疑是恐惧。而雅典这个以其同盟国为生存、发展基石的帝国在对于密提林暴动的镇压和处罚的讨论中，也体现了雅典对同盟国恐惧的多元化。

情感的迸发促使世界为之疯狂。而人与人之间一旦进入战争状态，也就回到了赤裸裸的人性之中。虚伪，做作，自以为是的希腊人最终被蛮族所征服。易宁先生总结说，修昔底德是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

既然人性已现，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纯粹。统治法则似乎成为战争时期的人们关注的话题，剥夺了赤裸裸了伦理政治学，战争时期的政治回复到了现实主义的维度：



统治的法则

叶小娇*

统治是宇宙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天体系统中，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如此层层环绕；在地球上，自然界、人类—上帝的相互关系，都可看作是一种统治秩序。这种秩序自然而然形成，宇宙就这样和谐地运转直到时空尽头。统治如此普遍地存在于浩渺的时空，必定遵循内在法则。即便是万物的创造者——上帝的全能意志，也不足以成为这个法则本身或超越它。因为上帝作为统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自身也要合乎统治的法则。这并非是质疑上帝意志的自在性，相反，上帝的参与，表明统治的法则一定存在，而且是普适的和正确的。这个宇宙中，应该由谁统治？统治是如何发生的？如何统治？

没有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上帝除外。事实上上帝不是天生的，而是自在的存在）。苏格拉底说，人虽一土所生，但老天在造人时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最可宝贵，是统治者。他又说，人按其天性从事最适合的职业，这是正义。这表明，统治是一件对“美德”^①要求很高的工作，需要有统治的天赋。苏格拉底强调要从小对有统治潜能的孩子进行教育，培养其应有的美德。因此，统治者并不是天生的，后天培养也很重要。亚里士多德说，有人天生是主人，有人天生是奴隶。可他隐去了奴隶制的前提。制度总是在时间中累积合法性，并形成社会习俗。但这种社会习俗违背了自然法。

虽然没有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存在“美德”的不平等。地球的引力大于月球，小于太阳。因此月球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照料着并以最严格的公正来评判人类事务，因此，上

* 叶小娇，华东师范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① 美德（virtue）在此处借用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所指的君主所应有的能力、智慧等善（goodness）的含义。

帝统治万物。人与人之间由于美德的高下之分便产生了统治。统治的发生基于“美德”的不平等。“美德”，按照马基雅维利的理解，是力量、能力、智慧、道德等种种善（goodness）的统称。它的不平等既有先天禀赋的原因，也有后天教养的原因。其中，先天禀赋是基础，起决定性作用，后天教养则产生能动性影响。有人说，客观的美德不平等不足以产生统治，还要有主观的统治欲望。福特说，帝国是每个强大城邦自然且不可避免的热望。其次，由于人类来自泥土，所以，与人类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与自身有关。统治不仅是意愿的问题，还是一种责任。

统治与被统治是一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自然吸引关系。统治者通过自身美德感化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地归顺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都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为自然界和奴隶都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当然，自然界和奴隶不相同，自然界不是人的财产，它有力量要求人类尊重。统治不是奴役和剥削，而是爱护和给予。如果被统治者感到奴役和剥削，统治就已退化成为专制，不再正义。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反抗波斯的战争中，原来斯巴达的同盟国自愿转向与雅典结盟，而在打退波斯之后，同盟国要求退出希洛同盟，企图“叛离”雅典了。雅典人获得希腊同盟的领导权是因为其勇敢、贡献了三分之二的海军以及在萨拉米海战的胜利，同盟国相信雅典的领导能带来希腊的独立和自由。此时，雅典对同盟国的统治是源于美德，基于认同，是合法的。然而，这种认同只是权宜之计，只是想尽快获得解放。当波斯被打退之后，同盟国不再认同这种统治，它们不再愿意交出船只和缴纳金钱。而当雅典以武力强迫时，意味着同盟国只不过从一种奴役陷入另一种奴役。同盟国必然再度反抗，希腊内战在所难免。

人类社会大致存在三种统治秩序：个体灵魂的，国家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就灵魂而言，它的三个部分即理性、欲望和激情中，理性被用以思考推理，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谋划，统治着欲望；欲望被用以感受爱、饿、渴望等物欲，是被统治者；激情则是理性的盟友，协助理性统治欲望。若欲望篡夺了理性的位置而成为灵魂的统治者，将会毁灭人的整个生命。理性统治欲望合乎统治法则，但为什么欲望会夺权？这跟雅典的寡头政变很类似。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雅典人扩张欲望极大收缩，物欲横流，在寡头党的诱骗下选择支持寡头统治。但雅典人在享受了长达约一百年的自由后，想让他们放弃自由也非易事。很快他们便恢复了民主政治。同样，

个体灵魂中，当欲望的力量压倒理性和激情，也会导致统治失序。但由于欲望的极具破坏性，故而必将适可而止，否则便自取灭亡。

在国家共同体中，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被统治者（臣民）的认同。霍布斯等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让出一部分权利，以便使国家按其认为有利于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政府无能或者败坏时，臣民有权收回权利，另立契约。因此，国家的统治不仅没有损失臣民的自由，反而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对统治者来说，统治是很棘手的工作。统治者要比别人智慧。但也需要勇气以保护臣民，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刚直不阿，不伤害臣民。如统治者违背当初的契约，政治体即走向死亡。维柯列举了三种民政制度变迁的方式：第一，臣民另立统治者；第二，若共同体内部找不到合适的统治者，就由外部征服并统治之；第三，若是内部找不到合适的人，外部也不愿意介入，就任由这个共同体自生自灭、自然恢复。

对世界的统治典型是世界帝国。福特说，帝国只是每个强大的城邦自然且不可避免的热望。而在雅典人那里，这种欲望尤为直白和强烈。当反抗波斯的雅典人决定放弃城邦，登上船舰，成为水手的时候，他们就宣示了自己作为希腊拯救者的地位。雅典人理直气壮地宣称维护帝国是出于荣誉、安全和利益，是正义的。因此，他们丝毫不惧怕同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此时雅典人的统治欲虽然直白，但仍蒙着一层“正义”的面纱，即便在受雅典奴役的城邦看来是强词夺理。当瘟疫的结束和休战使得雅典力量基本恢复时，他们的统治欲强烈得连“正义”的面纱也被摘下。他们违背了伯里克利“不要在战争中再扩张帝国领土”的忠告，消灭弥罗斯，远征西西里。“远征西西里不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而是因为国内忙于个人的阴谋，……他们让这个远征军失掉了它的动力。”此处的“动力”不是指战略物资的增援（事实上雅典人给远征军增援了大批的金钱和军队），而是指雅典人从前线召回并企图杀害亚西比得，从而导致远征的失败。因为亚西比得回国后一度使雅典恢复空前的繁荣。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亚西比得。我认为，雅典人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背离了正义。

维柯说，自然秩序有两道大光辉，第一：不能统治自己的人就得由能统治他们的人来统治；第二：世界总是由自然最适宜统治的人们来统治的。在思考适宜的世界统治者时，不免让人想起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

演说。他希望雅典人具有帝国统治者的美德：民主、自由、宽容、有法治、富裕、自足、节制、理性、开放、慷慨。狂热的天主教徒认为，只有神一样的人才能统治；神的形象是自然理性，如果这种形象彻底或大部分遭到损毁，统治权不复存在。虽然这对野蛮民族过于极端，但根据近邻、慈善以及人类出自同一块泥土的原则，文明民族对严重违反自然法和万民法的国家发动战争，加以征服，施行统治，是合法的。

宇宙由“美德”统治，人世也应如此。雅典人用暴力和强迫，这注定了它的帝国大业不可能成功。雅典人也不自足（粮食等资源都靠进口），不开放（公民权是封闭的），不宽容（消灭了中立岛国弥罗斯），不慷慨（向同盟国征收过多贡款）。按照统治者的“美德”标准，它也不适宜担当世界的统治者。脱离美德的统治欲望，对整个世界无疑是灭顶之灾。在格劳修斯看来，关于美德、智慧、和完满幸福的知识是宗教（上帝），正义属于宗教。因此，宗教堕落对全世界都是损害。

结语：用什么不重要吗？当手段没有合理性的时候，目的也就难以实现。统治与政治紧密相连，但是却在战争之中，我们还是：

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借用阿卡奈人的语言：

我徒劳地想望着庄园，
我厌恶这座城市，渴望和平，
渴望返回着我那贫穷的村庄和我的农场，
在那里从来不用大声招呼“过来买我的木炭”，
也不用喊“买我的油”，“买什么什么东西！”
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自由而且公平，
从来不用“买呀”、“买呀”这样的词。

（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责任编辑：孙超）

“国际法古典理论：正义战争”专题

【编者按】格劳修斯与培根，两位生活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伟大的立法者，面对走出中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和一个逐渐展开的新世界，洞悉新旧政治社会的大变局，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极其关键性的问题——圣战。对于这一问题，格劳秀斯和培根又都极具远见地指出：“罗马人的实在法和民法以及其他民族的法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只能是蚂蚁撼大树”。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整个人类置于同一坐标系下来考察，找寻一种“最高最普遍的善”，直接诉诸自然法、万国法甚至神法的支持。本专题试图以培根的《宣告一场圣战》和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相关内容为思想文本来剖析这一当时的世界性问题，宣告一场圣战。

超越圣战

朱承璋*

英国 17 世纪大哲人、大法官弗朗西斯科·培根（Francis Bacon）爵士在模仿柏拉图式对话体的短文“An Advertisement touching a Holy War”中（中文版译为“宣告一场圣战”，收录于培根的文集《论古人的智慧》（李春长译，华夏出版社，2006），为发动一场针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进行了激烈而精彩的合法性探讨。作者高妙的笔法、睿智的观点着实令人佩服，不过，妙处更在于另一位思想大家——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的论述心有灵犀地构成了对培根爵士的呼应。在此，笔者试图参考格劳修斯《战争与和平法权》中的观点对培根精致的短对话（主要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西庇太乌斯的言论）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这篇对话出现了六个人物（尤西比乌斯，迦玛列，西庇太乌斯，玛尔提乌斯，尤波利斯，波利奥）一共进行了两天。依笔者看来，前一天的讨

* 朱承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论虽然比较零散但也绝非鸡肋，由政客尤波利斯充当着主持者的角色，引导着军人玛尔提乌斯对发动基督教战争的合法性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并借由玛尔提乌斯之口掷地有声地点到了要害：“无论人民的文明程度如何，只要目的在于他们最高最普遍的善，所有的行为都是正义的。”笔者认为，这构成了本篇讨论的律法基础，为随后具体分辨宗教战争进而推广到一切人类战争的合法性问题竖立了界碑。可疑窦恰恰在此浮现，所谓“最高最普遍的善”如何界定？若继续推究到战争目的、战争手段等具体细节处又如何判断善恶？无论怎样，作者的目的是为圣战做辩护，我们且看他如何深究下去。

如果说第一天的讨论决定了一道大餐的菜谱，那么接下来就该分门别类地准备食材进行加工了。培根假狂热的天主教徒西庇太乌斯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意图，用一个大的问题来概括就是“如果没有其他敌对的原因，也没有引起战争的情况发生，基督教国家或君主仅仅为了传播信仰而发动侵略战争合不合法？”随后罗列了这个大问题所衍生的几个分问题，即：1. 通过战争让自古以来就是基督世袭遗产的这些国家恢复宗教是否合法？2. 国家中有大量基督徒时，通过战争让他们从异教徒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是否合法？3. 圣地圣物若受玷污和亵渎，用战争净化是否合法？4. 上帝的惩罚往往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进行，如此一来人类鲁莽地通过报复性战争“替天行道”是否合法？5. 圣战应该高于所有世俗战争，进行圣战来驱逐人民或强制改变信仰是否合法？珍馐美馔被一股脑儿端了出来，可问题在于没有餐具！（“怀疑案件而不是法律”）总不能像阿三那样吃手抓饭吧？培根敏锐地注意到要为这场战争辩护绝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必须寻求更高的律法和道义工具，他并没有急于回答这些散落的问题。为了找寻“最高最普遍的善”，他抛弃了罗马法和一些琐碎的政治体内部律法，直接诉诸自然法、万国法和神法的支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果国家的体制、基本风俗和所谓的法律违背了自然法和万国法，那么我认为，对他们发动战争是合法的。”故培根找到的“最高最普遍的善”便是自然法和万国法，神法也可作为补充，但最根本的还是自然法。依此行事，便自然附有正义性。可自然法从何而来呢？

对话中培根没有理由对自然法大加解释，笔者认为这里用格劳修斯对自然法的天才认识作参考是恰当的，他认为自然法可以分为两部分加以认识，第一，“that is ,by arguments drawn from the very nature”（自然天成无

需证明)；第二，“which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so by all, or at least, the most civilized, nations....And there cannot well be any other cause assigned for this general opinion, than what is called common sense.”(即人类社会共识塑造的自然法的那方面，格氏更为看重)。(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Chap. I. Sect. VII)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下里巴人，爹妈人人有，可以把爹叫爸爸但不能管妈叫大妈。

此等普世法则构成了自然法重要的组成部分，故意违反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准则的人就等于触犯了自然法：“War may be justly undertaken against those who are inhuman to their parents...who eat human flesh....who practice piracy...If a man, says Seneca, does not infest my country, but is only vexatious to his own; tho' he is at a distance from my nation, yet if he disturb his own; so great a depravity of mind has cut him off from human society, and makes him to me, and all the world, a foe.....the justest war is that which is undertaken against wild rapacious beasts, and next to it is that against men who are like beasts.”(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Chap. XX. Sect. XL) 凭一般人的见识就知道，有事儿没事儿乱个伦，吃个人，兴致来了买把 AK-47 陪着黑哥们儿扫货亚丁湾的事正常人干不出来，也难怪格劳修斯会觉得他们都是野蛮人和公敌，人人得而诛之了。英雄所见略同，培根同样看海盗不顺眼，举例佐证这种破坏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纽带的行为应当毫不留情地加以鞭策：“海盗们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所有国家得而诛之，这并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人类社会有共同的纽带。对于特定的敌人，会产生书面上的正式同盟，同样，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所有人也会自然地组成心照不宣的联盟。因此，对待海盗时，不必要宣布开战或停战，同样，也不要求受到困扰的民族这样做，自然法会办齐所有的手续。对待陆地上的强盗也是一样。”

海盗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大肆劫掠财产，侵犯了他人财产的自然权利，视海洋为自己的田地，人人都可以替天行道剿灭他们；“西印度群岛…大部分地方…的祭祀，尤其是他们吃人肉令人厌恶。根据自然法，这种风俗及其他一些风俗使他们不能再拥有自己的领土，西班牙侵略他们，或臣服或灭绝，也是合法的。”这样的个人也好、民族也罢，由于违背了自然法已经失去了其法权地位，好比政治体中的公民由于触犯民法和刑法被剥夺个人公民权一样，“他们（笔者注：指那些民族）的权利也会遭到剥夺。

有一些人是事实上的国王，但不合法，因为他们的头衔已经无效。同样，也有一些民族，他们是事实上的领地占领者，但并不合法，因为他们的契约和统治也是无效的。”所以，“根除和征服巨人、怪物和外国暴君不仅是合法的，甚至还会得到神的嘉奖。任何人如果认为，各个国家假如在主权上不是统一的或没有通过条约和盟约结成联盟，那它们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这种看法极其错误，是心胸狭隘的表现，因为还存在着其他社会纽带和不言自明的联盟。”格劳修斯同样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种惩罚：“We must also know, that Kings, and those who are invested with a power equal to that of Kings, have a right to exact punishments, not only.....but likewise...are...in any persons whatsoever, grievous violations of the law of nature or nations.”

(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Chap . XX . Sect . XL) 笔者还想补充一点，这种“代表月亮消灭你们”的行为任世事变幻，百转轮回都是货真价实的正义行为！

写到这里，当我们再次回溯西庇太乌斯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宗教芥蒂和信仰冲突越来越不足以声明开战的合法性，不足以承担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被作者巧妙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类为了维护自然法权（其中当然包括神法的一些内容）对违逆它的同类进行战争惩罚是否合法？是否正义？答案不言自明，是信基督还是信安拉并非决定开战与否的终极合法性来源，培根其实早有跳脱狭义宗教偏见的先声：“一群乌合之众，尽管我们称之为王国或国家，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占据统治地位，另外有个文明国家发动战争去降服他们是正义的，即使发动战争的是不信基督教的居鲁士或凯撒，战争也是正义的。”

有了合适的餐具，吃起来来自然得心应手。握住了了正义的权柄，奥特曼才有如此荣幸被小朋友年复一年乐此不疲地奉为童年偶像。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然法的“道”掌握在谁手中，谁就可以替天行道，惩恶扬善，他的正义性也就不容置疑。这么说来土耳其是不是异教国家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只要土耳其的当政者继续施行专制暴政，戕害百姓以至生灵涂炭，万物凋敝。只要那片土地上依然“只有一群诸侯和奴隶，没有贵族，没有绅士，没有自由民……缺乏道德、文学、艺术和科学”那么，他们就是“人类的一大耻辱”，使他们“不占有一英亩的土地，也不活在世上一小时”也是正义的！用神学的律法来看，基督教模糊了城邦的界限，将整个人类置于同一坐标系来考察，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一块泥土，他们笃

信自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沿袭的分参神性的传统，笃信善好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间，亿万人的善好组成了联系人类社会坚韧的纽带（培根笔下“不言自明的联盟”），这也为自然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只有基于维护善好和自然法纽带的这个“心照不宣的联盟”我们才有力量去对付“那些乌合之众和暴民”因为“这些人背离了自然法彻底堕落，他们国家的肌体和形式都呈现出畸形……他们就是人类的敌人和痛苦，是人类本性的耻辱。鉴于有些国家虽然犯了罪却不能改过自新，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应该憎恨和讨伐他们的人民。”

至此，西庇太乌斯的疑问也可以大致回答了：不论是为了扩张领土还是王朝斗争，不论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仅仅为了传播信仰而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是当下美国为了实践普世价值而进行的针对邪恶轴心国的战争都需要师出有名，假正义之名是进行战争动员之必须。而正义最坚不可摧的源泉并非来自一国一地民众的价值信仰，而是来自全人类普遍共同持有的基本价值信仰，这些信念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庞大肌体，使其运转有序，生生不息。为维护这些基本律法而进行战斗的人们，阿斯特赖亚之剑必将授予他们，他们的事迹必将为无数来人纪念和颂扬。

圣战与俗世之战

周生升*

一、研究背景

在《论古人的智慧·宣告一场圣战》（以下简称《论战》）一章中，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西庇太乌斯就对土耳其开战的合法性展开了一段的论述。他力图从“自然法、万国法”和“神法”两个角度来说明，“即使我们不是为了宗教问题（笔者按：当然，宗教问题必是西庇太乌斯的论点），为平定那个帝国发动战争也是正义的”。本文将以格老秀斯《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以下简称《法权》）第二卷第二十章“论惩罚”为重点，对西庇太乌斯的观点进行一些探讨。

* 周生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二、正文

在《圣战》一文中，西庇太乌斯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基督教国家或者君主为了传播信仰、反对渎神者而发动惩罚性（侵略、报复）战争是否合法？这里的“合法”，西庇太乌斯指出是自然法、万国法和神法，“至于罗马人的实在法和民法以及其他民族的法律，它们对这个问题只能是蚂蚁撼大树，无能为力。”同时，他把这里的战争定义为“圣战”——高于所有的世俗战争，随后就说到，“即使我们不是为了宗教问题，为平定那个帝国发动战争也是正义的。”由此，我们应当注意，西庇太乌斯把他的讨论不仅仅限定在了基督教反对异教徒的框架中，具体后文将会讨论到。

西庇太乌斯先就自然法和万国法角度展开，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提出，当人与人之间出现如人与兽、灵魂与肉体之间的不平等时，优秀的人就有资格统治匮乏的人。他进一步补充了两点：1. 鉴于优秀的人无法准确评估，所以他特指匮乏的人，即，一些地方虽然被称为国家或者王国，但里面的人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占据统治地位，另外有个文明国家发动战争去降服他们是正义的；2. 国家的体制、基本风俗和所谓的法律违背了自然法和万国法，对他们发动战争是合法的。

那让我们来看看格老秀斯是如何定义开战的合法性，或说正当性。在《法权》2卷1章中，他指出了三条战争正当性的来源：1. For defence, 防御；2. Recovery of one's property, 讨回财产；3. For the punishment of an offence committed, 惩罚违法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格老秀斯的第三条战争合法性原则似乎与西庇太乌斯所说的第二点原则有共通之处。但后者明确指出是“国家的体制、基本能风俗和所谓的法律违背了自然法和万国法，对他们发动战争是合法的”，所以，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惩罚国家层面上的“违法行为”到底是指什么。在2卷20章40节，格老秀斯详细进行了回应：

“that Kings, and those who are invested with a Power equal to that of Kings, have a Right to exact Punishments, not only for Injuries committed against themselves, or their Subjects, but likewise, for those which do not peculiarly concern them, but which are, in any Persons whatsoever, grievous Violations of the Law of Nature or Nations”

可见，格老秀斯和西庇太乌斯都认为，当出现严重违反了自然法和万国法

的现象时，主权者都可以对其进行惩罚，无论对象是个人或者其他主权者（笔者按：一个主权者对另一个主权者的惩罚，即是战争）。在这点的论据方面，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只举其中一处：西庇太乌斯以海盗为例，谈到“一个国家虽然没有受到海盗的侵扰和侵害，但它对海盗发动战争毋庸置疑是合法的……公认的真正原因是，海盗们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所有国家得而诛之，这并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人类社会有共同的纽带”；格老秀斯大篇幅讲述古希腊神话英雄 Hercules 的事迹：

“.....He travelled over the World to punish the Wickedness of Men.....He punished bad Men, and either destroyed the Dominions of proud Tyrants, or transferred them upon others.....”

前者因侵犯人类共同利益而被谴责，后者因为维护这利益而被赞扬。至于为何自然法和万国法赋予了人这样的权力和义务，不妨简单回顾下格劳修斯在《法权》1卷2章中是如何描述以“Right Reason”来定义的“自然法”：

“shewing the Moral Deformity or Moral Necessity there is in any Act, according to its Suitableness or Unsuitableness to a reasonable Nature.”

以“Right Reason”，正当的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展示了一种行为中的道德性，并且“reasonable Nature”，理智的本性，强调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自然法是特属于人类的（笔者按：由此产生万国法）。其论据，格劳修斯引用了古犹太哲学家 Philo：

“Right Reason is an unerring Law.....written by this or that mortal Man.....and engraved by immortal Nature on an immortal Mind.”

正是因为人存在理性和德性以及人类社会的产生，作为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等的考量，自然法和万国法应当得到人类遵守。格老秀斯在《法权》1卷4章“论臣民对主权者开战”中层引述过：

“No Law can be convenient for every particular Person, it is enough, if it be beneficial in general, and to the greater Part.”

可见，既然具有纯粹正义性的法律在人类社会难以成立，少数人的利益固然不能忽略，但作为考量标准，还是在于“be beneficial in general, and to the greater Part.”同时，也因为上述“Right Reason”的缺失，导致了西庇太乌斯第一点补充所说的，人类不平等的统治——匮乏之人应当受到统治。进而，西庇太乌斯阐述，如果一个主权者也存在这样的自然理性缺失，即国家的体制、基本风俗和所谓的法律违背了自然法和万国法，那么其统治和契约

即宣告无效。论据有，阿萨辛王国的暗杀体制、亚马逊王国的女人统治、西印度群岛的吃人风俗等。作为这一观点的对勘，格老秀斯在《法权》1卷4章“论臣民对主权者开战”中论述道：

“if a King shall, like an Enemy, design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the whole Body of his People, he loses his Kingdom.”

笔者认为，这句话似可进一步延伸。主权者以民为敌，其统治已然无效，更何况他与整个人类社会为敌呢？为文本所限制，且不论当时土耳其帝国是否已经堕落到与人类社会为敌的程度，这里依旧存在一个紧张关系，即，自然理性缺失到何种程度则算作与人类社会为敌呢？西庇太乌斯的论点态度决绝，“他们就是人类的敌人和痛苦，是人类本性的耻辱”，并要求彻底惩罚。而格老秀斯则留下了余地，在2卷20章36节引述道：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just Balance, says Seneca, therefore let the Inequality be on the milder Side.....If it can be done safely, let the Punishment be quite remitted; if not, let it be moderated.”

现在，我们需要把讨论深入到神法层面去。原因在于格老秀斯和西庇太乌斯都阐述过，神法（Gospel，或称 Divine Law），是最完美法律。由于西庇太乌斯的讨论在结束完自然法的论证后就戛然而止，无法进一步了解他如何从神法角度诠释。而且本论文进行到这里，笔者认为西庇太乌斯的谈话，似乎是未入正题。因为整个对话的开端，是为了解决宗教战争，而非世俗战争。我们只能从在他论述自然法的部分对于神法的引入略窥一二。对于神法的引用，西庇太乌斯集中在了两点：1.有一些民族根据上帝的律法，他们的（统治）权利遭到剥夺；2.亚当的子孙都来自一团泥土，故所有人都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无法改变的亲缘和社会关系。在这两点上，西庇太乌斯没有详述是如何关联到最初的问题，即，基督教国家或者君主为了传播信仰、反对渎神者而发动侵略战争、报复性战争是否合法？那么格老秀斯是如何论述的呢？在2卷20章48节：

“St. Athanasius says, That Our LORD, using no Force, but allowing every one the Liberty of his Choice, was contented to address himself to all, in no other Terms than these, If any Man will come after me.....Thereby disclaiming all Violence and Compulsion.”

这一段已经表明了，基督本人在传播信仰上是不会使用强制手段的，而是让人们自由选择，则土耳其帝国信不信基督教是无法成为基督教国家对其

发动战争的理由。需要注意的是，这段引文中，基督虽然说“using no Force”以及“disclaiming all Violence and Compulsion”，但并没有明确表示禁止使用强制手段。

西庇太乌斯对土耳其信仰有如下论述：“波利奥，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无意中陷入拜占庭皇帝康尼努斯的异端学说，他曾断言，默罕默德的真主才是真正的上帝。”这里说，土耳其帝国是相信上帝的，但陷入了异端邪说。那么，按照西庇太乌斯自己所说“对上帝和我们神圣的救世主的亵渎和侮辱行为采取的报复性战争合不合法”？在2卷20章50节中，格老秀斯引用了圣奥斯丁的论述：

“it is my Opinion that GOD does patiently bear with them, because he sees, that tho' their Tenets be false, yet do they proceed from a pious Zeal.”

可见，对于曲解神圣意志的行为，上帝本身是容忍的，更没有发动战争的说法，这都源于异端者本身真挚的热诚。当然，他们最终还是会在末日审判中受到惩罚，只是“is a Secret to all but the Judge himself”。不过在2卷20章51节中，我们发现：

“But to punish those, whose Deportment to the Objects which they esteem as Gods, is irreverent and irreligious, is more reasonable and just.”

凡是把某个“object”认作是上帝者应当遭到惩罚。那么，土耳其信奉“默罕默德的真主”，究竟是对上帝意志的曲解还是对错误认上帝呢？在培根原文中，波利奥坦言土耳其人“承认创造天地的上帝，认为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格。”可见，土耳其人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在本源思想上是一致的。如果退一步说，土耳其人完全亵渎、悖逆了上帝的意志，那无疑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但这里的问题是，由谁来执行呢？是西庇太乌斯所说的基督教国家么？格老秀斯对此的看法见于2卷20章51节最后：

“whatever GOD we invoke in our Oaths, the Violation of them will be punished by the only true GOD.”

显然，他认为渎神行为只能由真正的上帝自己来惩罚，而并非假人之手。对此他引用了塔西佗的论述：

“The Injuries of the Gods are left to the Care of the Gods”

《圣经·罗马书》也有同样的话：

“Vengeance is mine”

由此可见，针对神的亵渎行为，人是不应该插手的。一方面格老秀斯又指

出，如果是人针对人的伤害行为，则可以由人来惩罚，见于2卷20章44节：

“Whence it follows, that, as in Ecclesiastical Affairs, Bishops are said, in some Measure, that is, To have taken upon themselves the Care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So Kings, besides the Charge of their particular Dominions, have upon them the Care of human Society in general”

这段论证是恰好与西庇太乌斯所提的“人类都来自于一块土”的至高血亲原则相符合，一同佐证了人类惩罚人类的合法性。但不能忽略的是，格老秀斯一直强调的一点，即人的判断力是有限，“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just Balance”，故惩罚应当从轻，战争更是应当避免。

三、小结

纵观全文讨论，笔者认为，从自然法角度来看待惩罚性战争的正义性上，格老秀斯和西庇太乌斯的观点是较为接近的，即土耳其帝国如果违反了自然法和万国法，对其发动战争是正义的。但在必要性上，格老秀斯则强调因为人类的局限性而应当慎重，后者则更激进（笔者按：符合其角色定位，狂热的天主教徒）。从神法角度来看，培根笔下的西庇太乌斯没有进一步论证，而格老秀斯虽然认为渎神行为应当遭到惩罚，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惩罚必须以战争的形式进行，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每次当他论证某些行为触犯了神法当受罚时，总是用“Punishment”而极少用到“war”这个词语；同时，对于神法范畴的事件，他似乎更倾向于“The Injuries of the Gods are left to the Care of the Gods”，含有把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区别对待的意味。

（责任编辑：陈安龙）

天下/World

事发黄岩岛

——聚焦南海，中国如何“走向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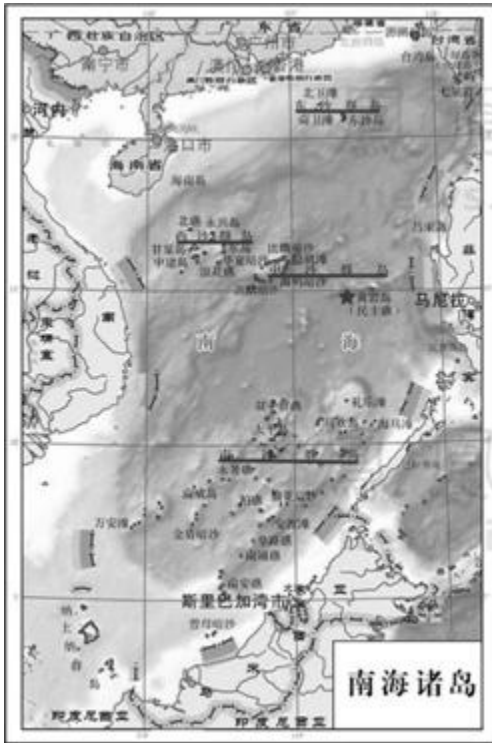
【主持人语】 北纬 15°07'，东经 117° 51'。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沙群岛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个岛，是黄岩岛，是炎黄岛。黄岩岛事件或许正是一次提醒，提醒我们这个以黄土地为象征的老大国度，该如何“走向海洋”。

南海方舆

南海范围：整个海域约 350 万平方公里

南海是世界著名的热带大陆边缘海之一，面积辽阔，水体巨大，水域深渊。整个南海几乎被大陆、半岛和岛屿所包围，北面是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大陆和台湾、海南两大岛屿，东面是菲律宾群岛，西面是中南半岛，南面是力里曼岛与苏门答腊岛等。南海位于北起纬 23° 37'；南迄北纬 3° 00'；西自东经 99° 10'；东至东经 122° 10'。南北横越约 2000 公里，东西纵跨约 1000 公里。整个海域面积约 350 万平方公里，其平均水深为 1212 米，最深处为 5559 米。周边自西、南、东依次毗邻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

南海诸岛是许多岛屿、沙洲、礁、暗沙和浅滩的总称，南北绵延 1800 公里，东西约 900 多公里。诸岛礁北起海岸附近的北卫滩，南至曾母暗沙，西起万安滩，东至黄岩岛，自北至南大致可以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通常依据岛礁距水面的上下，分别称为岛屿、沙洲、暗礁、暗滩和暗沙等。南沙群岛是中国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最多、散布最广的群岛。主要岛屿有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弹丸礁、郑和群礁、万安滩等，一共有 230 余个岛礁，露出水面的岛屿和沙滩有 36 座。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 0.43 平方公里。



★ 东沙群岛

位置：是我国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北的一组群岛

组成：主要由东沙岛、东沙礁（环礁）、南卫滩（暗礁）和北卫滩（暗礁）所组成。附近海区还有不少暗沙和暗礁。

管辖：名义上归广东省汕尾市管辖，实际上由台湾省高雄市新屋区控制。

★ 西沙群岛

位置：以永兴岛为中心，距三亚市榆林港约330多公里，距文昌县清澜港也是约330多公里。

组成：共有岛礁40多个，主要集中在两群：较东的是宣德群岛，较西是永乐群岛。

管辖：由中国控制，建有中国海南省西沙群岛办事处，现有赵述岛村委会、永兴岛村委会等村级组织。

★ 中沙群岛

位置：中国的南海诸岛四大群岛中位置居中的群岛，西距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约200公里。

组成：主要部分由隐没在水中的3座暗沙、滩、礁、岛组成，包括南海海盆西侧的中沙大环礁、北侧的神狐暗沙、一段暗沙及耸立在深海盆上的中南海沙、黄岩岛等暗沙。

管辖：隶属海南省三沙市（县级）。中沙群岛为中沙岛礁虚拟镇，目前黄岩岛为军管岛。

★ 南沙群岛

位置：西北与越南遥遥相对，南部水域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沿海相邻。

组成：已发现和命名的岛的礁滩有近200个，其中露出海面的岛11个，沙洲6个，岛的陆地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

管辖：目前除中国大陆和台湾控制少数岛外，主要岛均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侵占。

（图片来自凤凰网）

海上要冲：每年约4万多艘船只经过南海海域

南海与南海诸岛介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特别是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与号称“亚洲门户”的马六甲海峡仅一水之隔，扼居太平洋、印度洋要冲。在国际航海交通上，我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以及欧洲等地来往的航线往往都经过南海诸岛海域，每年大约有4万多艘船只经过南海海域。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90%以上的石油输入要依赖南海这个航道；经过南海航道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占世界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就中国来讲，通往国外的近40条航线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航线经过南海海域。从军事战略上而言，控制了南海岛礁，就意味着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香港、从我国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上通道。南沙群岛不仅能扼制南海的海上交通线，而且能对马六甲、巽他和望加锡等海峡产生重大影响。

四 链接：与中国国家利益关系密切的海上咽喉

海峡名称	地理位置	相关国家和地区	沟通海域
津轻海峡	日本北海道与本州岛之间	日本	日本海与太平洋
朝鲜海峡	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	韩国、日本	黄海与日本海
大隅海峡	日本九州岛与琉球群岛之间	日本	东海与太平洋
宫古海峡	日本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	日本	东海与太平洋
台湾海峡	中国福建省与台湾岛之间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	东海与南海
巴士海峡	中国台湾与菲律宾之间	中国台湾、菲律宾	南海与太平洋
马六甲海峡	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南海与印度洋
巽他海峡	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	印度尼西亚	爪哇海与印度洋
望加锡海峡	加里曼丹岛与苏拉威西岛之间	印度尼西亚	苏拉威西海与爪哇海
龙目海峡	爪哇海与龙目海	印度尼西亚	巴厘海与印度洋
霍尔木兹海峡	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	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等	波斯湾与阿拉伯海
曼德海峡	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间	也门、厄立特里亚、吉布提	红海、亚丁湾、印度洋
直布罗陀海峡	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之间	西班牙、摩洛哥	地中海与大西洋

资源丰富：约有“石油储量 350 亿吨”

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1969年，联合国的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在南海周围海域进行过石油资源的预测研究表明，南海海底可能是世界上蕴藏石油和天然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02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初步查明南海海域为全球少有的海上油气富集区之一，有石油储量 350 亿吨。从实际产量来看，南海地区的石油产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根据美国能源部的资料，2001 年，整个南海地区每天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了 200 万桶的水平。南中国海的可燃冰储量足够用上几万年。南中国海的其它资源价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陆地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简直是起死回生之地。

仅就南沙群岛而言，按已知储量和目前开采量计算，南沙海域的海底石油尚能开采 17 年，天然气尚可开采 40 年。在 1986 年以前，越南是石油进口国，石油产量只有 6 万吨。自从 80 年代开始大量掠夺南海石油以来，91 年石油产量超过 450 万吨，目前石油产量已达 700 万吨，使越南成为石油输出国，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经济支柱产业。

马来西亚自从在中国南海发展海上石油生产后，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石油出口总值已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20%，海上石油年产量超过 3000 万吨。就连文莱这个只有 5770 平方公里、人口 27 万的小国，也使从南海掠夺的石油成为其主要收益。

据“全球安全组织”网站的数据，各国在南海的石油产量分别是：马来西亚 64.5 万桶/日，中国 29 万桶/日，越南 18 万桶/日，印尼 4.6 万桶/日，各国合计 136.7 万桶/日。天然气也是马来西亚最多，年产 1300bcf(1bcf 为十亿立方英尺)，占到南海目前天然气总开采量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 141bcf。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中国海之争，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也是资源之争。

“主权在我”：中国南海主权发展史

我国南海从无名到有名，以及历代沿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我国今存上古典章文献类编的《尚书》中的《禹贡》篇最早出现“南海”之名，接着《诗·江汉》也出现“南海”之名，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但其确实情况不详，其范围同后世所讲的南海不一致。

周秦 据考据认定为周秦时代人所作的《山海经·海内南经》(卷五)记载：“郁水出湘陵南海”，郁水今广东西江，流入南海中。但这种认识尚不成为人们统一的认识，在秦始皇时，秦的上层人物尚不明确南海的方位，如秦始皇到今浙江绍兴祭大禹，他的臣下留下的记载是“祭大禹、望于南海”，句子中指的南海，实际是东海。到秦始皇 23 年(前 214 年)，秦统一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都濒近南海边缘，自然要对附近海域实行政治管理和防守。其次，边疆历史考古学家王恒杰 1992 年在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上发现秦汉米字压印纹硬陶片。这表明上古时代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沙群岛。当时南沙尚属无主土地，只有中国人“原始取得”。

这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

西汉 武帝在地处南海海域的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二郡，更注意对南海的防守，而当时周围尚无今日南海边缘各国。据说西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南征交趾过程中到过西沙群岛。西汉时南海诸岛与我国大陆关系日渐密切。

东汉 杨孚著《异物志》，已把当时或以前中国人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认识做了原始性的地理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记载，“涨海”是古代中国人对南海的泛称；“崎头”是古代中国人对岛礁、滩、沙洲的泛称。这也是中国人在公元一世纪以前发现南沙群岛的证据。

三国 吴国人万震著《南州异物志》内，记载：“句椎去典遨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多磁石。”这是对经营南沙群岛的中国古代人对南沙群岛航行方位，距离和海况的记录，该书还记载：“玳瑁如龟、生南海……”先有实践，后有文字，这显然是古代中国人在南海经营活动的记录。

东晋 中国著名高僧法显从印度返中国时，曾穿过整个南中国海。他撰写的《佛国记》内记载从印度、斯里兰卡到广州的航程，其中从爪哇取道南海只需 50 天。这表明中国人在东晋时已开辟了穿越南海的航路，并且航行。

南北朝 已有大陆人民在西沙群岛一带活动，证据是考古学工作者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和九礁等十一个岛屿和礁盘上发现南北朝的六耳罐、陶环及后世的陶瓷器大约 2000 多件。

唐朝 不但有中国人在西沙群岛活动，还有人在其他南海诸岛活动，《旧唐书·地理志》载：“振州（今海南三亚）……南至大海……，东南至大海二十七里，西南至海千里”。其所指包括南海诸岛。这是我国从唐代起南海诸岛正式归入中国又一证据，从此确立主权，加快海洋开发。

宋朝 中国人对南海进行命名，如《宋会要》记载：“……数日，主占城界，十日过洋情，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翻者十七八。”这里石塘专指南沙群岛。此后史书往往用“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以及类似的称呼泛指或专指南海诸岛，这种命名是中国古代人对南海实施管辖而拥有南海的证据。此后随着航海实践的增多，中国人对南海命名的事更多。宋朝周去非在岭南为官多年，晚年写一本《岭外代答》，书中具体指出南海中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这里的“交洋”即“交趾洋”，为现在北部湾。交趾洋与昆仑洋（今越南昆化岛附近海域）一线为中越海域分界线，这对确立南海诸岛主权属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宋代继承前朝行政设置，将南海列入“琼管”范围，这标志着南海诸岛纳入中国版图初现端倪。从宋代起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常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区域，而且更成为水师巡防

的重要海域。

元朝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派遣大将史弼领兵五千远征爪哇，据考证这支舰队是先经西沙一带海域，也可能包括今天的南沙发动进攻，虽未达目的，但这毕竟是中国古代人在征服南海上迈开了一大步。《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其中《元史》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了南沙群岛。我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曾奉元世祖之命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主持全国性的“四海测验”，曾到南海一个岛屿上观测它的纬度，并取得卓越成果。这在天文测量史上和南海开发史上均是大事。

明朝 永乐年间，造船业和航海业达到鼎盛时期，郑和船队扬帆远航，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至宣德八年（1433年）闰十二月初九，郑和共7次率部远航，历时28年。中国战船在“鲸波接天，浩浩无涯”的南沙群岛海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沧溟十万余里”，“若履通衢”。在南沙群岛，郑和对地理环境进行核治、定位和命名，使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得到实质性的佐证，巩固了对南沙群岛拥有的主权。今天南沙群岛中的郑和群岛，就是为纪念郑和的航海业绩而命名的。据明王佐《琼台外记》载：万州在明时辖有“长沙”、“石塘”，海军指挥佥事“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南海，确立明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铭》中的记载也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

清朝 清代初期流传于民间的《更路簿》记载南沙群岛73个地名及其方位，地名是用海南方言拼的，但为外国人所用，即把地名拼写成外国文字记载在他们出版的航海图上。清朝雍正时高凉总兵陈伦炯所著的《海国闻见录》，内附有《四海总图》，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南海诸岛较早的地图，开始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为以后各类著作所转载，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輿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輿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

民国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分别在1934年和1935年公布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和《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审定公布了132各岛礁名称，这是第一次较全面公布南海诸岛的命名，第一次将南海诸岛分成四部分：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之南沙群岛）。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报》收回了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失地。1946年当时的海军总司令部派兵舰前往接收南海诸岛。永兴舰和中建舰接收西沙群岛，于11月29日在西沙永兴岛登陆。太平舰和中业舰接收南沙群岛，于12

月 12 日在南沙太平岛登陆。永兴舰还巡视了甘泉岛和珊瑚岛等，太平舰还巡视了南钥岛、中业岛、双子群礁和中建岛等地。1947 年 3 月太平舰又奉命接收东沙岛。当时内政部方域司审定南海诸岛地名 172 个，同年方域司又刊印《南海诸岛位置略图》，此举对于维护我国南海诸岛的主权起着重要作用。1948 年初，内政部将上述的南海诸岛标绘范围收入公开发行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向国际社会正式公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

新中国 1951 年 8 月 15 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1954 年，新华地图社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取消了海南岛同越南海岸间的 2 段断续线，并在台湾和琉球群岛之间增加 1 段断续线，形成南海 9 段，东海 1 段的断续线。1974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反击作战。此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完胜告终，从此中国牢牢控制西沙群岛。1988 年 3 月 14 日，中国海军为保卫南沙群岛，与入侵中国领土的越南海军展开了近距离海战，中国海军以 1 人负伤的微小代价取得胜利，深刻影响了整个南海局势。

搁置不了的争议：南海争议现状

当前所谓的“南海领土争议”，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争议。南海领土争议虽说由来已久，但真正成为问题却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1969 年，联合国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在南海周围海域进行石油资源的预测研究，认为南海海底可能是世界上蕴藏石油和天然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随后，1971 年的全球石油危机和 1973 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开（最终设立了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使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沙岛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纷纷以种种借口非法占据我南沙岛礁。

越南

越南对南沙群岛的侵占开始于 1956 年，当时的南越政权派了一支海军小分队在南威岛登陆。1973 年，南越政权把南沙群岛合并为其福绥省的一部分，此后不久，又将该地区的石油勘探权授予几家外国公司。在 1974 年被我解放军驱逐出西沙群岛后，南越又占据了南沙群岛的五个岛礁，包括位于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正南方约 13 海里处的鸿麻岛，此外还有南威岛、南子岛、景宏岛和安波沙洲。1975 年 5 月，越南统一后，北越军队接管了原先由南越控制的南沙岛礁。三年之后，据估计，越南已在岛礁上驻军 350

人，配备有海岸大炮和高射炮，但还没有简易机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又陆续占据了南沙群岛中的某些岛礁，到目前为止，据称已占据达 29 个之多。具体是：南子岛（占据年月：1975.4.14）、敦谦沙洲（1975.4.25）、鸿庥岛（1975.4.27）、景宏岛（1975.4.27）、南威岛（1975.4.29）、安波沙洲（1975.4.29）、染青沙洲（1978.3.23）、中礁（1978.4.2）、柏礁（1987.2）、毕生礁（1987.4.10）、西礁（1987.12.30）、无乜礁（1988.1.26）、日积礁（1988.2.5）、大现礁（1988.2.6）、东礁（1988.2.19）、六门礁（1988.2.27）、南华礁（1988.3.2）、舶兰礁（1988.3.15）、奈罗礁（1988.3.24）、鬼喊礁（1988.6.28）、琼礁（1988.6.28）、蓬勃堡礁（1989.6.30）、广雅滩（1989.6.30）、万安滩（1989.7.5）、西卫滩（1990.11.4）、李准滩（1991.11.3）、人骏滩（1993.11.30）、金盾暗沙（1998.6）、奥南暗沙（1998.6）。在这些被占据的岛礁上，越南除了驻有军队、建造各种军事设施外，在一些较大的岛礁上，如南子岛、敦谦沙洲、鸿庥岛、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等，还建有简易机场、雷达，气象站、卫星电视天线、灯塔等。最近几年来，越南甚至做出决定，计划在其占据的南沙岛礁上建立地方政府机构以宣示主权。

菲律宾

菲律宾早在 1946 年刚独立后不久，就对我南沙群岛表现出兴趣。但直至 1971 年该地区被报道蕴藏有石油之后，菲律宾才正式提出声称，并送“外交照会”给中国台湾，要求其撤走在太平岛上的驻军。而在此之前的 1968 年，菲律宾则已分别在南沙群岛的南钥岛、中业岛和北子岛设立哨所，并先后占据了马欢岛（占据年月：1970.9.11）、费信岛（1970.9）、中业岛（1971.5.9）、南钥岛（1971.7.14）、北子岛（1971.7.30）、西月岛（1971.7.30）、双黄沙洲（1978.3.4）、司令礁（1980.7.28）、仁爱礁（1999 年新占）等九个岛礁。

1978 年 6 月 11 日，菲律宾发布了由总统马科斯签署的第 1596 号总统法令，把南沙群岛的 33 个岛、礁、沙、洲，面积达 64976 平方海里的海域声称为“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并对之实施行政管理”。他们把该海域内的岛群命名为“卡拉延群岛”（意为“自由群岛”）。

马来西亚

1979 年 12 月 21 日，马来西亚出版了一张新的领海和大陆架疆域图，把我南沙群岛东南部 12 个岛礁（安波沙洲、安渡滩、柏礁、司令礁、光星礁、簸箕礁、榆亚暗沙、南通礁、卢康暗沙、南海礁、皇路礁、弹丸礁）划入其声称范围。马来西亚自 1983 年起，已先后占据了弹丸礁（1983.8.20）、光星仔礁（1986.10.9）、南海礁（1986.10）、榆亚暗沙（1999.4）、簸箕礁（1999.4）等五个岛礁。1983 年 6 月初，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组成的“五国防御组织”在南海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代号为“海星”的联合军演，五国出动了 18 艘舰船、16 架飞机和约 3000 名官兵。在演习期间，马来西亚 20 名海军突击队员于 6 月 12 日登上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1986 年 11 月，马来两亚又占据了光星礁和南海礁及其附属的六个小岛。在 1999 年 6 月间，马来西亚在榆亚暗沙建起一座 50 米×20 米的两层混凝土建筑。据有关消息称，马来西亚的建筑是在槟榔屿建好后拖到现在的位置的。

文莱

文莱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为由，对位于南沙群岛南部的南通礁提出声称。此外，文莱于 1988 年出版的一张地图，其声称的大陆架亦延伸到南沙群岛南部的南薇滩。不过，文莱没有在南沙群岛占据任何岛礁沙滩，这可能与南通礁在高潮时几乎完全被淹没，不好派兵驻守有关。

印度尼西亚

印尼原来被认为是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中惟一对南沙群岛无领土要求的国家。但由于其纳土纳群岛与南沙群岛邻近，拟从该群岛基线量起的专属经济区进入了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之内，于是产生了海域争议问题。加之印尼近年来在纳土纳群岛发现了蕴藏量非常丰富的天然气田，故印尼对此问题显得特别敏感，不断以鼓励移民、军事演习等各种方式来显示主权。



“法理何在？”——周边国家占有南海岛礁之依据及评析

在南海周边国家中，越南是惟一对整个南沙群岛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越南声称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的“占有”，声称“越南封建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占领、组织、控制和勘探这些群岛者”。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先把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改名为“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然后将其史书中有关黄沙和长沙的记载都说成是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于是就成了“最先占有者”。其实，越南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偷梁换柱、张冠李戴。通过对越南史书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考释，并参照中国史书中的有关记载不难看出，越南历史上所谓的“黄沙”、“长沙”只能到越南中部沿海的岛屿上寻找，与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根本不沾边。

早在 1954 至 1975 年，越南政府曾多次公开承认过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其中包括 1958 年 9 月 14 日范文同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照会，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甚至在 1960 年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出版的一张《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就标明属于中国领土；1972 年，越南测绘局印制的一张地图，图中南沙群岛用中文标识而不是用越南文、英文或法文。这些做法都表明越南当时承认南沙群岛确实是中国领土。

越南提出的另一种依据是，作为法国统治越南领土的继承国，应当继承南沙群岛。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二战后法国并没有拥有南沙群岛，且没有文件证实法国与越南做过移交。按照法国的说法，南沙群岛并没有交给后来已被准许独立的越南。上述事实进一步削弱了越南的声称，因后来是北越政权接管了南越，而北越曾承认过中国拥有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且现在的越南政府是继承北越而不是继承南越，故按国际法中“禁止反言”的原则，越南必须坚持它原先的承认。

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提出声称，其依据如第 1596 号总统法令所言：(1)群岛对菲律宾的安全和经济命脉至关重要；(2)菲律宾与这些群岛最邻近；(3)这些群岛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国家，是“无主地”，如果有其他国家提出主权要求，这种要求已因放弃而失效。

这些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菲律宾不能以安全和经济利益为理由，随便对一块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即使是菲律宾的确极其需要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来维持其经济活动，即使是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遭到某种损害，但是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其他国家的领土窃为己有，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其次，以邻近为理由提出主权要求的做法，是不能成立的。在国际上类似这种远离本国的大洋区域，或在邻国海岸附近拥有岛屿或群岛的事例很多，而它们从不因地理位置的接近而改变岛屿的归属。再次，南沙群岛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不是“无主地”。至于所谓的“因放弃而失效”，纯属无稽之谈，中国政府向来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无丝毫放弃的表现。

马来西亚与文莱都对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提出声称，其主要依据似乎是说这些岛礁位于他们声称的大陆架之上。马来西亚与文莱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国际法与海洋法的规定，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勘探和开发其海床和底土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拥有大陆架内岛礁的主权。另外，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陆地支配海洋，而不是海洋管辖陆地。这就是说，只有某个国家对该岛礁拥有主权，才能对该岛礁周围的海域提出声称，而如果不对该岛礁拥有主权，则不能以该岛礁在其臆测的大陆架之内而提出主权声称。就以南沙群岛的岛礁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该群岛拥有主权，这种事实使马来西亚与文莱不可能将其大陆架再扩展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之上，不管这些岛礁与其海岸的距离是如何靠近。

对峙黄岩岛



黄岩岛(曾用名：民主礁)，在中国海南岛的东南方向，是中国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黄岩岛西北距海南岛900多公里，北距广州1100

多公里，东距菲律宾马尼拉 300 多公里。黄岩岛四周为距水面 0.5~3 米的环形礁盘，其内部形成一个面积为 130 平方公里、水深为 10~20 米的泻湖。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黄岩岛是在涨潮时高于水面、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不是终年隐藏于水底的沙洲或暗礁。从地质构造上看，黄岩岛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不是一个游离的海岛。黄岩岛地处马六甲海峡至台湾、巴士海峡的南海重要航线上，扼守南海咽喉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2012 年中菲船舰南海黄岩岛对峙，又称“中菲南海对峙”或“中菲黄岩岛对峙”。面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借势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心向西太平洋的转移，努力打造旨在封锁中国大陆海上的所谓“第一岛链”，近来南海周边诸国动作频频，不断挑起南海领土争议。2012 年 4 月 8 日，菲律宾海军非法进入黄岩岛持枪抓捕我国渔民并扣押渔船，随即我方派出船舰前往该地区，自此与菲律宾方海军展开船舰海上对峙。



“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经过（4月8日—5月中旬）

4月8日 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海域发现8艘中国渔船。菲海军持枪登上中国渔船，对中国渔民进行检查。被检查的中国渔船被菲方指控为非法捕鱼。

4月10日 菲律宾海军欲在南海中沙群岛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赶到的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

4月10日 国家海洋局派“中国海监75号”和“中国海监84号”编队赶赴黄岩岛海域，对我渔船和渔民实施现场保护。

4月11日 外交部称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4月12日 中方要求菲舰立即撤离黄岩岛海域，菲在黄岩岛袭扰渔船侵犯中国主权。菲方表态称不会放弃黄岩岛。

4月13日 中方已在北京和马尼拉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菲律宾外交部13日称，中国派驻在黄岩岛海域的三艘海监船中的一艘已经驶离。

4月14日 护送中国渔船离开中国海监船重返黄岩岛水域。中方还派去了一架飞机在菲律宾的海岸护卫舰的上空盘旋。

4月15日 中国外交部就黄岩岛紧张局势提出交涉。中国渔政44061船从湛江港出发，前往南沙海域开展为期50天的维权护

渔巡航任务。

4月16日 中方表态：菲应该回到承认和尊重中国对黄岩岛领土主权的原来立场上来。菲方表态：不会因对峙事件而同中国交战。

4月17日 菲律宾外交部长称“要和中国一同到国际法院寻求解决途径”。菲律宾护卫舰“埃德赛”号进入黄岩岛海域。

4月18日 南海渔政310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南海执行维权护渔任务。此次派出执法船为国内最先进执法船。

4月18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第二次约谈菲代办。菲方表态：4月18日，在黄岩岛海域与中方船只对峙的菲律宾考古船已离开这一海域。

4月19日 曾被菲律宾军舰在黄岩岛泻湖内袭扰的中国12艘渔船之一的船只再赴黄岩岛从事渔业生产活动。

4月23日 菲海军另外两艘战舰和一架反潜机赶往黄岩岛海域。菲外长称中国的南海主权毫无根据，呼吁周边国家对抗中国。

4月24日 中国渔政310船和中国海监84船离开黄岩岛海域，仅留一艘中国海监船留在黄岩岛海域。菲律宾否认向黄岩岛增派舰船飞机。

4月25日 菲律宾外交部宣

布将在一周内“邀请”中国到国际海洋法法庭打官司。对此，菲律宾参议院主席称支持这一行动。

4月26日 菲媒体援引菲北吕宋军区司令的话表示，有5艘中国渔船已经返回黄岩岛海域展开作业，中国海监71船在旁护渔。

4月28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表示美方已多次表示对南海主权争议不持立场，希望美方信守表态。

4月29日 菲总统阿基诺表示，相信中国不会对菲律宾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菲当局正在收集中国“欺负”菲律宾的相关“证据”。

5月1日 菲律宾国防部就已持续三周之久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作出表态，声称希望和平解决，不会考虑武力对抗。

5月2日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方在南海主权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支持通过“和平、合作、多边和外交渠道”解决海上争端。

5月3日 菲律宾外长在美国表示，南海为菲律宾“核心利益”，呼吁美国提供更先进的军事装备以加强菲律宾的军力。

5月5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埃德蒙·陈表示如果中方开火，将不得不撤离，评估状况然后再返回去。

5月6日 菲律宾正式将黄岩岛命名为“帕纳塔格礁”。

5月9日 菲军方称，在黄岩岛海域的中方船只已从上周的14

艘增加到了目前的33艘，其中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执法船310号。

5月10日 菲律宾政府称，菲律宾并未在黄岩岛海域对中国进行挑衅或加剧紧张局势，并再次强调想要用尽一切外交手段解决黄岩岛问题。

5月10日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9日晚间向媒体透露，菲律宾方面恢复了与中国方面就黄岩岛事件进行的外交对话。

5月11日 菲律宾民众就中国海监船与菲方对峙一事举行示威。

5月12日 菲律宾200余人举行了针对中国的抗议游行。当日，菲律宾政府派出百余名警察保护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的安全。

5月13日 中方要求中国公共服务船只和中国渔船可在黄岩岛自由行动，同时，菲方船只离开黄岩岛。菲方将“永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

5月14日 本月底，菲律宾从美国购买的第二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将正式交付，比原计划提前了近半年。

🔗 链接：中菲双方在黄岩岛问题上的主要争议

中方	菲方
<p>一：南沙和西沙群岛均属中国固有领土</p> <p>史料记载，1279年，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四海测验”，在南海的测量点就在黄岩岛。1935年1月，中国政府将黄岩岛作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列入了中国版图。</p>	<p>一：菲律宾与黄岩岛最邻近</p> <p>菲律宾认为“卡拉延群岛”（菲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称呼）已成为菲律宾的组成部分，在菲的主权管辖之下。菲认为其与黄岩岛最邻近，故拥有主权。</p>
<p>二：中国对南海诸岛实施接收得到国际公认</p> <p>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南海诸岛实施接收并得到国际公认；1947年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在南海标明了九段线；新中国成立后在1958年发布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中重申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p>	<p>二：黄岩岛等是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地”</p> <p>1978年6月11日，菲律宾发布了由时任总统马科斯签署的第1596号总统法令，把南沙群岛的33个岛、礁、沙、滩，面积达64976平方海里的海域声称为“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并对其实施行政管辖”。菲律宾将该海域内的岛群命名为“卡拉延群岛”。</p>
<p>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法取代其他既成国际法准则</p> <p>《公约》只是允许沿海国家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无任何条款规定沿海国家可以据此声索或侵占他国固有领土。同时《公约》也无法取代其他既成的国际法准则。</p>	<p>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黄岩岛拥有主权</p> <p>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的法规颁布实施，菲政府认为黄岩岛位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因此对黄岩岛拥有海洋管辖权，以及拥有主权。</p>

指点江山

@李洋:

中国与菲律宾国力差异大，在国际地位也完全不同，这是优势也是劣势。大国地位可以保证中国在与菲律宾的武装冲突中毫不费力的获胜，但之后可能就会面临着大量战略负担，简单说就是延宕中国权力增长的步伐。首先为了黄岩岛与菲律宾开战虽然可以获胜，但放在整个南海问题来看只能逼迫东盟国家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在中国的南海主张相对缺少国际法法理依据的情况下将会对中国在东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若是中国不顾一切诉诸武力，则战争的规模可能很难控制，而美菲之间有着军事同盟关系，何况时值十八大前夕，最糟糕的情况则可能导致台湾趁机独立以及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什么都做不了。也不尽然，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两点：建立预防机制以及控制冲突程度。第一点是战略层面上的，中国没有利用美国重心的空档期与东盟建立起南海问题稳定的协调机制，否则菲律宾这种挑衅行为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发生，即便发生菲律宾也讨不到多少实质上的利益。虽然建立国际机制并非中国可以一家完成，机制的合法性与解决能力也存有疑问。但依托国际机制却能最大限度的约束小国的破坏现状行为——国际制度天然的具有现状偏好——或者使小国破坏现状的成本高得无

法接受。当然，话说回来，中国是否具有建立一个公认的国际秩序的能力本身也值得怀疑，但是如果以富有诚意又能依托某种公认的价值态度与东盟国家互动，南海问题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严峻。至于第二点则属于策略性问题，即控制冲突的规模、参与者与互动程度——这也是中国目前采取的方法。只使用准军事力量与外交途径，军队被约束住了（虽然声音似乎很多很强）。目前来看还在可控范围内，危机也会逐步趋于平息。这点上，中国外交还算表现不错。

@王心志:

在无政府体系下，中国这一大国的存在对于东盟而言是巨大的一个安全威胁，东盟也十分担心中国对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采取军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付的手段其实比看上去的有限，而菲律宾的操作空间则很大。在事件中充分利用与之相称的国际地位，始终处于主动，中国的行为则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弱国靠外交了。这次菲律宾表现不错。因为菲律宾已经基本达到目的，即将黄岩岛问题扩大化、国际化（引起美国与东盟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本来还不在于南沙岛屿争端范围内），转移国内注意力等。因此，哪怕最低限度的正常情况下中国也不会使用武力。所以，政治不但要看现在，还要看过去和未来。

一个好的政治家必须清楚许多问题的历史背景、现状；要清楚哪些目标是值得追求的，而其中哪些是可以实现的；也要清楚手里有多少张牌可以打，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多少牌，打到什么程度就要收手以避免被别人连锅端。动不动嚷嚷着打仗的人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至多是匹夫之勇。

@俞岚：

美国结束十年反恐战争，重返亚洲计划使得南海问题愈演愈烈，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洋各国成为前沿阵地。近来中菲在黄岩岛紧张对峙中，中方不断声明对黄岩岛的正当主权，而菲律宾也通过购买美国先进武器积极筹措对峙资本、拖延时间。中国应尽快解决黄岩岛事件，以强硬政策应对，为全面解决南海问题作出示范。

@陈安龙：

黄岩岛，炎黄岛。中国自古便有重陆地、轻海洋，重边疆、轻海疆之观念，并着力将欧亚大陆打造成自己的安全倚靠，面对神秘的海洋则踟蹰难行。虽有诸如宋、明海洋功业的昙花一现，但最终一道道禁海令如长城的修建闭锁了中国的政治视野和政治空间，空留遗恨数百载，不亦悲乎！愿这次的黄岩岛事件能成为一个让国民重新认识海洋的契机。无海洋观念，何谈海权保障！而近代以来诸大国的崛起争雄，最后的王者无一不是与海洋联姻的宠儿。海洋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准备好了吗？天知道。

@王志航：

中国对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海诸岛拥有者无可争议的主权，中国政府最早对这些岛屿进行了命名，并进行了有效管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出于资源考虑，菲律宾先提出黄岩岛是其专属经济区，紧接着又宣布对黄岩岛拥有主权，这无论从道义还是国际法角度都无法说通。在中国的南海地区，我们希望可以共同合作，共享资源，但是在主权问题上绝不会让步。

@崔攀：

黄岩岛事件对于中国领土争端问题以及未来东亚区域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关重大，可谓一步险棋。面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中方需要作出积极的回应，但不得突破最后一道关卡，否则对于中国的损失将会很大。菲律宾方面不断的挑衅，希望激怒中国，希望由中国首先动武，这样菲律宾就有机会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因为美菲之间是有安保协约的菲律宾不敢轻易主动动武的，毕竟中菲之间的综合实力、军事实力等力量对比差距较大。中国不能主动动武，只能在情势比较严峻的时候方可。对于中国而言，解决好黄岩岛问题意义重大，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甚至是东海问题的解决都将会突破领土争端的困境。解决不好黄岩岛问题，中方也将损失很多。

@田艺伟：

缓！稳！挤！

@李荟：

黄岩岛的局势现在似有所缓解，不过这件事还是给中国外交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题。当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在主权问题上受到挑战时，作为改革开放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期见证者的民众自然希望见到一个强硬的中国。从这一点看，江忆恩从文化现实主义角度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分析似有其合理性，而外交部门乃至决策层也应该从这次事件入手，深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做外交。

@吴途勇：

近期南海问题又因黄岩岛而成为舆论焦点，对此我不关心问题本身。我考虑的是，此类问题以前出现多次，为何此次被拔得如此之高、之激烈，中、菲、美三方都如此“高调”、激昂？联系自2月以来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我猜测，一种可能是美、菲，尤其是美在对华进行压力测试，测试中国统治集团在面临重大内在政治困难时的政治动员能力、控制能力与决策能力，以对中国统治集团统治能力进行评估；另一种可能，我则从政治学理论角度分析，是政府在操纵整个事件进程、尤其是舆论过程，转移舆论注意力与焦点，通过放大外在政治压力效应，局部缓释内在压力，有些行为是故意而为之，我更担心的是，美、菲也在这一过

程中予以配合，实现跨国联合操纵，而最可悲的则是我们这些或激情澎湃，或看热闹，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草民。

@叶小娇：

海岛问题扑朔迷离。神法不被适用，国际法解释各异，莫衷一是。大国实力似乎是真理，但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外交处境很尴尬，不得不硬着头皮玩下去。战争是不得已的、最后的解决途径。

（责任编辑：朱永福）



话语·幽默 / words humour

I 我们的大学，包括北大，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表演、懂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大教授钱理群批评当今的大学教育培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贪官危害更大。

II 禁书大致分政治性与道德性两类，最终以维护统治集团利益为标准。而大凡禁书，只要属于有价值的，未必禁得了，最终都由坊间保存下来。“雪夜闭门读禁书”，描绘的就是这情景。

——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说，读书当无禁区。

III 基层社会管理机制方面的改革，如果不是动真格、不能到位，那么即便解决了乌坎问题，可能又会冒出新的问题，恐怕还会出事。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谈及“基层社会管理机制改革”时谈到。

IV 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 30 多年

任更加艰难。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V 当谋生不再成为基本需要，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他想做的事情。

——瑞士拟每月向每个公民发放最低 2000 瑞士法郎的无条件补贴。提案委员会成员奥斯瓦尔德·西格说。

VI 再见，梅德韦杰夫总统、普京总理；你好，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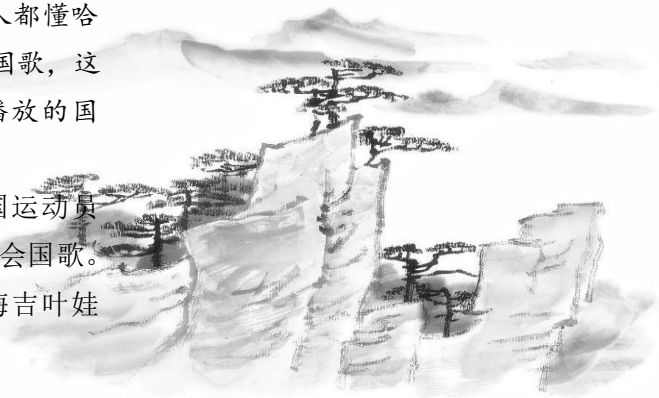
——5 月 8 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梅、普换位。俄罗斯媒体如此说。

VII 我和罗姆尼都有哈佛学位，我只有一个，“自命不凡”的罗姆尼却有两个，但我们的支持率都落后于夫人。

——奥巴马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调侃罗姆尼。

VIII 我能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哈萨克语，不过至少要学会国歌，这样他们最差也能辨别出播放的国歌是否正确。

——哈萨克斯坦要求本国运动员必须在伦敦奥运会之前学会国歌。哈国体育部门负责人叶梅吉叶娃说。



【看图说话】人家老美的选举，看来应了咱中国人一句老话——“敌人的敌人，便是自己的朋友”。对于选民来说，或许谁当选远远不如谁落选重要。（珞平）

“未成曲调”也有情

崔攀*

我是外行，连戏迷都不是，看《牡丹亭》只是想看看昆曲到底有多美，同时也想看看她到底为什么会没落，而关于这两点或许都带着一丝虚荣的情绪。



之前看过一次现场版的《牡丹亭》。冲着昆曲去的。因为之前大家把昆曲说上天，说昆曲是最讲究身段的，精巧细腻到每一根手指，举手投足都是一幅画儿。也说昆曲是最高雅的，戏词文采精华，感情渲染得开却也点到即止，有一种含蓄优雅的美。但是也很戏剧性地说昆曲终将要没落的。这种情况可以参照这次的演出情形。这次的《牡丹亭》只是在学校小范围的演出，演

出的原因是宣传传统戏曲文化，演出的票价是五块钱，演出时的观众不及一半。昆曲是高雅的，这个高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意思，只是其中一些元素比如戏词，不是我们通常的大白话，所以并不直观，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领略个中意味。所以他们选择在大学里演出，也算是选对观众群，因为一般对昆曲心存挂念的多半还是与文学界沾边的人，并且还怀着一丝对戏剧本身的欣赏。但可惜的是即使是在大学也并没有多少受众。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的，到场的时候小型的剧场里没有多少人，甚至不用对号入座，随便找位置就好。刚开场就从游园惊梦开始，这算里面

* 崔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最有名的一段了。只是以游园惊梦这个名字为题，就有不少文学电影作品。当然最有名的可能是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此后白先勇全力推出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掀起过一阵波澜，当然反应最大的还是文艺界和年轻的女同胞们。

更早之前接触过文本《牡丹亭》，心里也比较期待春香闹学的一段，所以一看到是从游园惊梦演起，还以为是要演折子戏。看到底后当然发现不是，可毕竟也没有演全。上演的曲目是惊梦、寻梦、写真、离魂、拾画、叫画、幽媾、婚走。

游园惊梦这段是杜丽娘先上来。看台上杜丽娘粉衣衫，兰花指，凌波微步，清水芙蓉。虽然映衬她的布景道具都比较简单，但演员还是有把杜丽娘的神韵传达出来。不过开口就不行了。倒不是她唱得不好，只是我觉得昆曲这个咿咿呀呀的调子实在不够圆润流畅的，就那么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的唱下去。如泣如咽的感觉是有，也是映衬着“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赋予这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意境。只是太过缓慢又不流畅的曲调也真是无味，我看完了身段也忍不住四下张望，却不想我身边某君已然呼呼大睡矣。其实只从文学性看杜丽娘的独白部分，其用语浓丽华艳，内心世界倾泻而出，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是很成功的。尤其是一些唱词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但除掉唱词这文学性的部分来看，曲调的问题就上来了。就像优美的乐章用破旧的乐器来演绎，戏词和情节是很好的，但曲调就是不能与它相得益彰。虽然可以说成如此这般低低诉说，才符合杜丽娘的心境。但一出戏，如果我不看舞台两旁的提词器便难以跟上，而又觉得这样的调子过于沉闷，那我的观赏所得在哪里呢？

还好终于看到柳梦梅掩着柳枝上场了。如果是在正戏里，柳梦梅也是出场较晚的，更何况这次前面的戏还让我觉得有点烦闷，更觉得柳梦梅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出来后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不管是不是戏曲的故意安排，他都算很好地抹亮了戏台。可是观众总有“恶趣味”，柳梦梅的高底靴将大家的眼球吸引过去。而他一声“姐姐”还带着昆曲特有的宛转，终于活泼了整个剧场。男女对戏，只是对话也会生动许多。所以这段要比刚才杜丽娘的独白更有意思（原谅我这个趣味一般的凡人吧）。尤其是拾画、叫画一段，对画中人的猜测；对画上诗“他年若在蟾宫处，不在梅边在柳边”的联想：“这梅与柳与我有关的啊”；对着画狠狠叫“美

人、姐姐”；其中有点呆的书生气，反而让人觉得意趣多多。

而说到陈最良与石道姑的一段戏，石道姑的戏词及两人的对白是北曲的泼辣动荡，与杜丽娘典丽宛转具有南词特色的独白风格迥异，但别有一番风味。我是北方人，虽然有时候觉得江南婉转多情很美丽，但还是对于脆利落的北方风情更为习惯。而另外一点则是源于我对《牡丹亭》的一个“偏见”，就是一直以为《牡丹亭》整篇都是缠绵的爱情，即所谓“生生死死为情多”，却不想其中还有这么泼辣生动的场景，当然感受上更特别一些。

后来我上网查看《牡丹亭》原文，说实话文言文看起来很费力，相对来说演出的剧本读起来更容易些。其实我对这出戏的戏词、扮相、身段都无可挑剔的，唯一让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曲调。《牡丹亭》的戏词本来就很好，昆曲的身段又是最美最婉约的，只是曲调总让人听着不够活泼动荡。对白还好，一到唱词，连最活泼的春香都是咿咿呀呀的，曲调不够爽快利落。我之前看人听评弹，也是拖音拉调的曲子，但抑扬顿挫听来很有韵味。可即便如此，台下听书的人也多半是富贵闲人，他们最多的便是时间，也最愿意这些悠扬长调消磨光阴。普通人为生活奔波，难得有谁驻足听上一段。况且《牡丹亭》这出昆曲也算不上是雅俗共赏的，所以受众面还是很窄。就是比较其他戏种，昆曲也算不上是琅琅上口的。爱戏的人一般都想唱两嗓子，但昆曲真是不好唱。而且唱昆曲太需要感觉了，尤其需要一种伤感。谁会喜欢自己常常有这种情绪呢？

我是外行，连戏迷都不是，看《牡丹亭》只是想看看昆曲到底有多美，同时也想看看她到底为什么会没落，而关于这两点或许都带着一丝虚荣的情绪。看完之后也没有很失望，昆曲的雅致、剧情的安排、对白的设置都觉得很棒。一看旦角拿捏的兰花指，就觉得是极讲究的。流云袖搭上对方肩膀就是拥抱，对于我们如今开放的风气有种“不合时宜”的含蓄之美。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透着静雅，也很有看头。但是，最怕他们开口唱，一则听不太清戏词，二则就是我深深诟病的曲调问题。

我对昆曲的了解浅显，但感受既对立又反复。我欣赏她，但同时我也觉得她终将没落。可是地球是圆的，现代生活虽然节奏快而又开放随性，可说不定哪一天从前的那种如昆曲般的含蓄细致又会重新俘获人们的心。可是的可是，尽管那可能只是一小股的复古风气。

（责任编辑：尹亮）

陌上花又开

章咏*

霓虹灯火，照得亮的繁华，照不亮的丝丝牵挂；
陌上花开，放得开的年华，放不开的潸然泪下。

明天是母亲离开后的第二个母亲节。多少次梦回乡村，母亲的笑容都一如从前。那些关于母亲的回忆，浮雕一般的清晰，我却心痛地从不轻易提笔。

昨晚的一场小雨，点点凉意，似乎又找回一些江南的感觉。这个时候，江南的田埂阡陌间，到处可见一种小花。翠绿的枝条从草丛间伸出，举起一个粉色的小花朵，花很小，星星点点，开满了梯田的边沿。小时候的清晨，母亲背上竹篓在溪间田边摘猪菜，我就沿着田埂一朵一朵的采着小花。偶尔我和母亲被稻田隔开视线时，母亲就呼喊一声我的小名，我就答应着站起身来，挥挥手中的小花束，我在这里。

陌上花初开，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捧着您回家，奔跑在母亲的视线之下。

我爱着我的家乡，但她是那样的贫瘠。变的是日移东西，不变的是母亲忙碌的身影。母亲爱的表达，充满了艰辛。我还很小的时候，生活很难，家里只有一床给我睡的小棉单。母亲早上看着天晴洗好晒了出去，没想到下午又下雨了。于是，晚上母亲只能点着灯抱着我，直到把棉单烘干。

转眼我要去上学了。母亲给我缝了一个布包，绿色的还散落着白色的小花。我很小心，用了四年。在我要去五年级时，母亲说那包太旧了，于是母亲去挑了两天沙，给我买了一个黑色的尼龙包，我用了四年。母亲没有读过书，只认识那个“一”。于是，我决定不让母亲再有任何一次的失望。小学初中我拿回来的奖状都是第一名。

陌上花又开，花心花朵花满天，一瓣一瓣裁。

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母亲要带着我去庙里拜神。母亲认真地洗手，上香，烧纸，然后双手合十，跪地，“法力无边灵显的大神在上，我今天把永儿带到您的面前，祈求您的保佑。永儿将要去北京，请您一定要保佑

* 章咏，现居地为上海。

他出行要平安，身体健康，学习要一直这么好。我知道您一定会显灵，我会每个月都祷告，我会年前再跪谢您的神灵。”母亲再对着每一处神灵都磕了三次头，虔诚地重复着。

临行时，母亲把我的箱子塞得很满。我背上包，母亲说：“去吧。过年的时候一定回来，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糯米饭。”当汽车经过我家门口的一瞬间，我看见母亲的目光在焦急的探望，我努力挥手，但是车一转弯，就已经望不到了。

列车开进陌生的城市。我看着形形色色的人，因追寻目标而匆忙地行走，大声地表达。我穿梭在万家灯火之中，迎面捧着大束鲜花的行人陆续走过，他们是否也像当年我拿着“陌上花”时，那般没有目的，没有忧虑。

远离家乡，只有过年才得回家。母亲的皱纹越来越多，母亲的病痛也越来越严重，母亲却每次都说，你在外面要照顾自己。我听着，心酸地只能点头。

母亲让父亲买了个手机，方便我联系家里，但母亲不舍得这长途话费，只在我打电话回家时，从父亲的手里拿过电话，叮嘱几句。

去年，弟弟突然问我：“哥，你为什么这么少往家里打电话？”

我说：“我在外面都挺好的，没什么事，不想打电话来，就是不想让家里担心。”

弟弟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知道不知道，妈妈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叫爸爸把手机放在桌上。因为妈妈怕你打电话来了，我们听不见。哥，你知不知道，妈妈接了你的电话都得向邻居说好几次……”那一次，我趴在桌上哭了一个下午。

母亲去世得那么突然。在中秋节后的一天，母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简单的说说家里的事，说估计是感冒了，没事的。然而，在第三天的凌晨，我接到电话，母亲病危。

北京和家乡的遥远距离，让我也没能看上母亲最后一眼。

两年了。无数次的梦见，母亲回来，为我缝补书包，为我蒸最爱的糯米饭，然后无数次的从梦中醒来，抱着被角哭泣。

五月来了，那田埂上又开满小花了吧？仍然是星星点点，开在湛蓝的天空下，缀在翠绿的草丛中。

陌上花开，儿为母采，路过一程，花落一瓣。

（责任编辑：崔攀）

惟妙惟肖

英国文学中的英雄形 象和反英雄形象

张肖肖*

----年少轻狂时，喜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豪气冲天，而今，却喜欢作为“人”的英雄，英雄也会有“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和落寞。

英雄崇拜是一种原欲，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要么已经自戕，要么正在自戕。人间无意义生活之苦痛便是英雄磨灭之滥觞，贝奥武夫已然远去，陪伴我们的是一一个个意气萧索的人物，厌战的中尉、冷漠的局外人、热情的同性恋者、头发里充满肮脏气味的持不同政见者、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 张肖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我认为，文学作品中，所谓英雄形象，通常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坚强刚毅，屡败屡战；而反英雄形象有多面，或是与英雄有同样的理想和抱负，却难以摆脱命运之束缚，以悲剧告终（哈姆雷特）；或是缺乏支持者，充满迷茫和消极情绪，不相信传统价值（嬉皮士）；或是一直受到失败的打击，却仍不改初衷（盖茨比）等等。

英国文学可以大致分成“英雄史诗年代”、“中古传奇文学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时代”、“浪漫主义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主义时期”。而早在古典文学中就已经有了“反英雄”的影像，例如，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以及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也具有了某些“反英雄”的基因；18 世纪启蒙时期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19 世纪的拜伦式英雄和撒旦式英雄身上，也都反映了“反英雄”精神特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英雄”形象，是在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大量涌现的。

英国文学早期的英雄形象跟古希腊早期英雄形象很像，是半人半神式，贝奥武夫(Beowulf)就是这样一个英雄，因为丹麦受到魔怪格兰道的骚扰，他义无反顾地去与格兰道决斗，实践着尚武精神；后来，他成为国王，在其耄耋之年，毒龙出现，贝奥武夫以垂老之躯勇战毒龙，杀死毒龙而他也因此死亡，可能这样一句话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人生在世，谁都难免一死，要死就死得轰轰烈烈，对于一个武士而言，那样的死，才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英雄是无畏的，哪怕是一去不复返。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这种勇武精神？可能就是所谓的“英雄气概”。

到了十一、十二世纪，英国文学出现了以骑士历险为内容的传奇(Romance)文学形式，这些传奇故事类似于中国的武侠小说。这一时期出现了亚瑟王系列骑士文学，传说亚瑟王(King Arthur)是率领圆桌骑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一统古英格兰的国王，他们一直以严格的骑士准则来要求自己，相传有这样的准则：永不暴怒和谋杀；永不背叛；永不残忍，给予求降者以宽恕；总是给女士以援助；永不胁迫女士；永不因争吵而卷入战斗。在这些骑士文学中，骑士们往往是勇敢、忠诚的象征，

每一位骑士都以骑士精神作为守则，是英雄的化身。每当骑士遇到自己无法匹敌的敌人时，他们往往会带领着自己的队友，喊起“忠诚—信仰—荣耀—勇气”，最后，这些骑士会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家园，骑士们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家园，即使代价是死亡。为荣誉而战，不惜牺牲生命。

另外，相比于古英语时期的英雄形象，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更为丰满，因为有骑士的地方，必然会出现淑女(a fair lady)，典雅之爱(courtly love)成为骑士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造就巨人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而哈姆雷特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他的本质在于思考，他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精神的危机，理想的破灭，使他悲郁愤懑，痛苦异常，也促使他不断思索，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他从家庭的变故看到宫墙外的社会问题，有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只相信个人的作用，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矛盾重重，思考多于行动，时时感到忧郁、茫然，行动犹

豫、延宕，最终也未实现其目标，可能“生存还是死亡，真的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it's a real question”）。

提到哈姆雷特这个“行动的矮子”，不禁让人想起唐吉珂德这个勇士。哈姆雷特是思考多于行动，而唐吉珂德是行动多于思考；哈姆雷特是迷茫在思考的天地中，而唐吉珂德是迷失在疯狂的举动里；哈姆雷特是灰色的悲观主义者，而唐吉珂德是战斗的理想主义者；哈姆雷特是缺乏信仰的怀疑主义者，而唐吉珂德却是对理想和信念永不动摇的可笑的执着主义者。但两者都已经具备了“反英雄”的基因。

到了理性主义时代，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塑造了“啜饮着孤寂的北风，将复仇进行到底，以恶制恶，向社会宣战的”撒旦式英雄，他们永不屈膝，永不投降，敢于抗争，哪怕用邪恶的方式报复。艾米丽·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塑造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就是典型的撒旦式英雄，希斯克利夫因爱人凯瑟琳的背叛因爱生恨，并采取一切手段向其报复，但是“奸诈”和“残暴”是两头的枪刺，使用这枪刺去刺仇敌的人，受的伤要比仇敌更深。凯瑟琳死后，希斯克利夫在精神上已完全崩溃，“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可怕的纪念馆，处处提醒

我她存在过，而我却失去了她！”狂放不羁具有“荒原”性格的希斯克利夫最终在痛苦中死去。希斯克利夫是疯狂的，是在以残忍的方式报复他曾经的爱人，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人，可能“爱情如死亡之坚强”更能解释他的痛苦、纠结、无助与疯狂。

浪漫主义时期，拜伦式英雄出现在诗人拜伦作品中，他们通常具有反叛精神，是海盗、异教徒、造反者、无家可归者……他们具有出众的才华、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情感，敢于蔑视传统秩序和专制暴政，但他们的反抗又总是和孤独、忧郁结合在一起。拜伦式英雄总在“反叛”——反叛社会准则，反叛人生。在《堂璜》中，海蒂这位传奇般的女英雄是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她“多愁善感、热情洋溢、痛悔交加，但从不唏嘘彷徨”。海蒂无矫揉造作之气，无陈腐观念，却十分勇敢。当海蒂无意中碰到奄奄一息的堂璜时，便立刻为他的年青和魅力所吸引，任爱情蔓延。海蒂面对死亡的态度可以说是对拜伦式英雄的最好诠释。面对灾难，她没有丝毫畏惧，在她向父亲请求原谅未果之后，便显示出不顾一切的激情与决心。在接下来的12个昼夜里，海蒂像花一样凋零枯萎，“头颈低垂，象雨中零落的百合……”海蒂就这

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她生来就不是要过漫长而平庸的生活，而是像一团烈火，宁愿燃烧得短暂却一定要热烈，要么灿烂地生，要么悲壮地死，“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也不过如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信仰失落的时代，也是等待救赎的时代，人们在等待希望，“但希望迟迟不来，苦了等的人”。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人们迷失在荒原中，一直在“等待戈多”。就在这个荒诞的世界，荒诞的年代，反英雄应时而生，“反英雄”全然失去了古代英雄叱咤风云、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们既缺乏崇高的人生目标，更缺乏维护某种信仰的意志力量；他们经常忧郁怪僻、荒谬可笑或厌恶社会，面对人生的难题表现得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他们不敢肯定自我、坚持理想行为，一遇到人生的障碍，便即退缩，他们通常采用“阿 Q 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到灯塔去》，拉姆齐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悲剧式的英雄（如果在现代主义小说中有英雄的话），在寻求客观真理并为之斗争的事业中，他“冲过死亡之谷”，“穿过弹雨”，“四处冲杀”。他坚信，在混乱无序的世界里，一定存在着一种客观

真理，所以他坚定地守卫着那片被混乱逐渐啃噬的客观真理的阵地边缘，“锐如刀刃，利如铁锹”，“孤独得像一只失群的鸟儿一样”。

英国文学是一部描述英雄心灵的历史，在英雄的变异中，我们可能已找到了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

就我个人而言，年少轻狂时，喜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豪气冲天，而今，却喜欢作为“人”的英雄，英雄也会有“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和落寞。就像傅雷在《约翰·克里斯多夫》序中写道，“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你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要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责任编辑：武亚宁）

边读边说

心灵的漂泊与刻写：语言·难以超越

——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随想

姜边*

灵魂之思是先验的，漂泊的，自由的；语言之思是经验的，设定的，有序的。灵魂自身本是一片无需语言逻辑干扰的浑然但空灵的世界——一片先在于逻辑的世界。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本很薄的论著，但内容却相当丰富。它伟大的丰富性并非来自于对无尽的具体知识的涵括，而在于它强大的启示力。索绪尔在教程中从不企图对他所提到的问题套上任何定论和权威，除了对语言学范围内的术语和学术概念作出非常精确的界定和澄清以外，他的每一项论述都是启发性的，他的伟大性在于他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开放的自我认知体系，不断地启迪后生。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

绪尔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学科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提出了语言的唯一定义：“在语链中排除前后的要素，作为某一概念的能指的一段音响。”

语言符号系统里“只有意义与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并且“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除“概念”是心理的外，需要加深理解的是“音响形象”也是心理的。“音响形象”不同于声音、音节的物质特性，它是“声音的心理印迹”。索绪尔的解释是：试想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我们不动嘴唇，也不动舌头，就能自言自语，或在心里默唸一首诗。“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语言符号虽然主要是心理的，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由于集体的同意而得到认可，其全体即构成语言的那种种联接，都是实在的东西，它们的所在地就在我们脑子里。”

* 姜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此外，“语言的符号可以说是可以捉摸的；文字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里。”在表音的文字体系中，“文字符号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索绪尔认为，虽然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把它们已成固定的视觉形象”。可见，文字只是“视觉形象”，文字≠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是由“口说的词”构成的，“它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且是稳固的，不过书写形式的威望使我们看不见罢了”。索绪尔提到，文字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威望的若干原因中有一点是：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随想：那么，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推得，“文字”两层之隔于“意义”。“文字”与“意义”的结合历程途经两次抵达：文字的“能指”（视觉形象）首先抵达音响的“能指”（音响形象）后形成一体；“一体”随即与“所指”（概念、意义）不期而遇。音响能指与概念所指之间不期而遇，而文字与概念的相遇是一次文字的前往。是文字在寻找意义，而非相反。结果，文字的视觉形象因得到“意义”的赋值在心灵留下印记，这个印记兼具视觉素质

和声音素质。

索绪尔这里说：在表音的文字体系中，文字符号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模写”这个词和文字对语言的功能，居然让我联想到《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对“画家”和“画作”的相关解读：

虽然世间有许多床和桌子，但是床的理念与桌子的理念却是唯一的。工匠注视着理念或形式创造出许多实在的物体，而非理念与实质本身。而画家确是模仿品的模仿者，他的画作是对影像（模仿品）的模仿物。画家连工匠都不如，画作与真理、自然之间有两层之隔！

文字和“画作”都是视觉形象。如若试图对一副画作进行语言的解读和阐释，那么，首先画作的视觉形象映入双眼，然后与心中的概念意义和音响形象同时结合，即，视觉形象经过语言的加工，变成了一段流动的阐释，然后被刻写在心灵某处。

“文字”与“图像”都在寻找“语言”。虽然，文字是对声音的“模写”，仿佛显得它并不直接与“概念”和“意义”发生关系；而“图像”仿佛在挣扎着穿越心灵搜寻“概念”和“意义”，仿佛与“声音”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画作要被理解和阐释，就必定是在追随“语

言”。

当然，语言系统和语言的文字系统都是“符号的”，即能指与所指，也即文字、音响形象与概念之间具有任意性和不可论证性。而图像表现的能指与内心的所指之间却可能构成“象征”的关系。索绪尔说：“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难怪，图像的视觉形象仿佛总是在追逐意义。

二

“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

论证语言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需要考虑两个要素——“观念”和“声音”——在语言运行中的作用。

“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同“飘忽不定”的心理王国相比，声音也是无形的，但它是“一种可塑的物质，它本身又可以分成

不同的部分，为思想提供所需要的能指”。因此，设想“全部语言事实，即语言”，“为一系列相连接的小区分，同时画在模模糊糊的观念的无限平面”和“同样不确定的”声音的平面上：“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语言是在思想和声音“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分解”和“交配”时“制定它的单位的”。“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但却产生了这一“颇为神秘”的“区分”事实。“所以语言学是在这两类要素相结合的边缘地区进行工作的；这种结合产生的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猜想：思想≠概念的“所指”。在语言产生之前，已有一个先在的心灵之境，它构成的“思想”世界正如索绪尔所说“飘忽不定的心理王国”和“浑然之物”。语言的出现赋予这个世界以“重力”，这样，“语言”颇像一尊“神”，因为它赐予内心世界以“秩序”之稳——这个“秩序”内在地包裹着“逻辑”。语言虽是社会的产物，但语言的秩序里却有几分相似于“神”的秩序

的东西：语言秩序中，所指与能指的结合是偶然的、不可论证的，是排斥逻辑表述的；之后，人通过进一步的社会交往在此原初秩序之上进而加以逻辑的布局，如语言的交流和语法的生成就体现了语言秩序的逻辑追求；“神”的秩序中，世间万物的产生也是偶然的、不可论证的，人无法用理性与逻辑将造物主的意图捕捉；造物主在完成原初的宇宙秩序架构后隐退，让被造物按自身逻辑去继续形塑这个秩序。这么说，在语言世界中，也有一个先于逻辑秩序的根本性结构，那么不妨猜想，这片自由天地恰恰制造了语言自我解放的现场。

音响形象与概念的结合意味着“区分”，意味着对世界进行“命名”和“确定”，必然意味着下一秒钟理智要对世界认知，必然意味着逻辑的生成。语言和文字与逻辑的东西不可分割地契合着，世间任何事物，一旦经由语言的表达，就不可避免地暗含“因为”与“所以”。语言是束缚。灵魂之思是先验的，漂泊的，自由的；语言之思是经验的，设定的，有序的。灵魂自身本是一片无需语言逻辑干扰的浑然但空灵的世界——一片先在于逻辑的世界。哲人说过：灵魂一旦言说，那么灵魂自身便不再言说。很早之前看到的这句话，由于当时的

困惑，反而助我深刻记忆，此时才顿悟。

那么，对于那片一定存在的语言缺席的灵魂天空的“思想”，如果用语言来命名它，就是人们时会说的“不可言说”之物。

三

索绪尔教给了人“语言”的东西，他其实教给了人“语言”以外的东西：语言是逻辑的，那么，语言无法表达逻辑之外。

语言逻辑之外是感性体验本身。之前所说的力图对一副画作进行语言解读和阐释，就是在给一种直观的体验加上束缚与限制。

反对阐释，即克服先入为主的对“意义”的搜寻，而是让体验、直觉直面对象本身，直面“根”的本质构架，暂时搁置预先设置的认知框限。从这一点上来讲，被苏格拉底批判的“画家”具有带着人通往真理的潜能，他的作品是可以具有强大穿透力的。的确，我们不该站在现代人和复杂的现代审美学角度来批判苏格拉底对当时“艺术”的贬斥，但是，苏格拉底的“画家”或许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申辩：我的画作只是力图给观者提供一个“视角”，无论站在这个“视角”上你看见的是被画作模仿的那个实物，抑或穿越了两层阻隔进入了神的

理念世界，一切取决于你，仅此而已。艺术不是“模仿”，它提供的是另一种视角，是区别于语言的体验的启发。

之前看到一些今年的国际新闻摄影作品，每一张图片下方都配上一段具有新闻价值的文字说明，向人解说图片背后的真实事件。借助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像与真实事件之间构成了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人，面对图片与文字的组合，首先看到的是具有视觉刺激的画面，然而随后，常常不加停顿地转向配合图片的文字，搜寻所谓的意义。人往往忽视了画面本身的穿透力带来的心灵体验。照片中一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和他白蒙蒙的双眼、他无法聚焦的眼神，人在将它久久凝视的语言空白中得到的感性体验，绝不会轻于对“这是位曾遭日本兵蹂躏的老人和他悲惨而无根的一生”这一事实的道德认知带给人的不能承受之重。新闻图片是视觉艺术与语言的道德判断间的相融相合，如若带着先入为主的道德批判来阐释一张图片，图片就失去了本身的艺术生命，新闻照片不过成为仅此而已的一段新闻。所以，为避免感性体验中的敏锐感在这个文化产品过剩的时代中的退化，让心灵漂泊起来，让它与前方的体验自由赴约。

四

但是，不能因此无法自拔地沉沦于神秘的内心不可知论的偏执中。体验本身最终还是会回返语言，因为语言使它变成印迹凝固在记忆里。深藏的心灵世界昏暗、闭塞和神秘，而语言将它启明、开放，使它流淌、灵动、澄澈。这就是语言对心灵的刻写，从这层意义上讲，语言难以被超越，或许真的无法被超越。

前面，受到索绪尔启发，将语言秩序比为“神”的秩序，并猜想，在语言世界中有一片先“逻辑的”一秒而产生的自由天地制造了语言自我解放的现场。此刻可以这样理解：语言有自己的生长空间，它自身也借助着心灵的感性体验解放着自我。

记起苏珊·桑塔格在《论风格》中说过：

最吸引人的艺术作品，是那些使我们产生一种艺术家似乎别无选择的幻觉的艺术作品，他是如此全神贯注于他的风格。请把《包法利夫人》和《尤利西斯》的构造中那种牵强、费劲和混杂的风格与诸如《危险的关系》、卡夫卡《变形记》这些同样讲究的作品的某种轻松、和谐的风格做一个比较。前两部作品的确伟大。然而，最伟大的

作品似乎是被分泌出来的，而不是被构造出来的。

“分泌”是苏珊·桑塔格这段话中最重的语词。此刻此地，可以借用它理解语言通过刻写心灵的体验，实现自我的解放。真正“美”的作品的语言，不是对本来就远离真相的偏见的复述，也不是塑造出来的；它起因于对心灵的一个重压，接着以虔敬对体验本身进行关注与聚焦，也因此被思想和心灵“分泌”出来。作品的语言本身因此具有灵动的生命，能够带给受者更丰富的感性体验，它去除了对世界的

复制，带来体验之物自身的那种透明和本来面目的那种明晰，让人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人所拥有的东西。

语言在“发现”一场体验后，又难以逃脱身陷“逻辑的”宿命，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仍然解放了自我，丰满了自我，因为它自身的价值收获与意义更新又带来了一场全新体验。

（责任编辑：许子兰）



☆出口成章

音乐乱想



朱承璋*

……Woodstock, Bob Dylan 等一连串伟大名字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生力是千百年来日夜流淌在西人血液中的批判精神所赋予的，她直接同文明母体接通，输送古而弥笃之精神价值与滋养，混合时代特征元素，产生化合反应生成雷霆万钧之力，驱动社会革新和政治重构。

自从万分荣幸地收到编辑部同仁建议，让我写点儿音乐笔记

* 朱承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估计是看到我成天琢磨，很销魂的样子），我就开始心虚了，虚者有二，无知，无语。好在思绪踌躇之际，忽如一夜春风来，吴总喇叭猛一开，“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在下不由自主哼起来鸟...），被农村重金属用奔放、激昂、狂野的声线渲染出的最炫民族风让鄙人顿时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是滴，民~~族~~风~~

最近，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和优酷合作出品了一档真人脱口秀节目——《晓说》。节目中，高某开炮说汉人无音乐细胞，理由是汉人从不重视音乐人，大汉民族的历史里有木匠（鲁班）、医生（华佗）、顶级妓女（陈圆圆等）、疯子（楚狂陆通）、傻 X（赵括）、阉人，冒牌阉人们更是根本不用举例，惟独难见一个正牌音乐家（以音乐为目的，区别于 XX 才子等文人墨客附庸风雅之辈以音乐为手段互“别苗头”）。凭在下浅薄学识，也就认得伯牙、子期了，但细想来伯牙、子期的典故乃借曲抒情，抒的不完全是挚爱音乐之情，主要是说 A 弹罢一曲 B 听懂了，B 弹罢一曲 A 听懂了，于是山岳流水为之动容，苍穹

霄汉为之变色，简单讲，ji情四射！知音者非音也！再者，咱们的民族乐器叫得上名的都是X“胡”（鲜卑传入），琵琶（印度传入），唢呐（波斯传入），一听就不是本家嘛，虽然高晓松漏了古琴，但在这个连古筝和古琴（都是汉族乐器）都没几人分得清的年代，谁还有脸说大汉民族音乐香火鼎盛、厚积薄发呢？三者，咱们的诗词歌赋或豪迈或婉约，百转千回，美轮美奂，天上人间，可宋词、元曲有几首词牌曲牌的曲谱被保存至今？

我们对比一下西洋，名垂青史之音乐大师浩如繁星，更有若干堪称人类文明巨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洋人对音乐家的重视可见一斑。至少在漫长历史叙事和文明演进中，西方音乐家担当的特殊地位是令汉人爱乐者羡慕不已的。

中世纪早期西方宗教弥撒——一如《羊羔经》、《荣耀经》——就曾以空灵质朴的“叙事叹”打动过圣·奥古斯丁，并得到希波主教的热烈推崇。宗教音乐因其荣耀主的功能被广泛推广，并有大量手抄本曲谱留存于世，许多宗教仪式都具有音乐性，多种多样的音乐形式（合唱、复调）完整地流传下来，为十六世纪开始的西方音乐革新奠定了知识基础。而同一时期的汉人音乐却早已湮没无闻，万幸流传

至今的作品，如《霓裳羽衣曲》等，还得经历一番考据才好意思见人，甚是可怜！

在这之后，西方音乐的宗教性并没有因为教权的衰弱而减少，反而进一步发酵，把经院神学的理性推演带入了音乐理论研究中，巴赫的《十二平均律曲集》和基于十二平均律制的标准化乐器——钢琴应运而生，这一作曲利器因其突出的实用性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研习音乐之必备，稍有音乐教育经验的人都知道，乐理知识基本都可以通过认识钢琴琴键习得，效果比死记硬背好得多。我们汉人对十二平均律的认识早洋人半个世纪，为啥没有“张巴赫”，“李巴赫”？没有汉版钢琴？

再看看传世音乐家的数量和质量，笔者能随便叫上一串儿西洋一流音乐家，亨德尔、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肖邦、李斯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马勒、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咱们也有传世大师和作品，但被汉字承载的规模和质量就逊色很多，传统教育理念也不接受他们被宣传，即便有也不为人知，飘零陷落在历史流沙中，渐渐泯灭无闻。汉人知识界（“仕”阶层，不仅垄断知识，更垄断整个知识产业链和各种物质资源）相对

轻视音乐人的贡献同西方大哲对音乐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献给瓦格纳的序言中指出的，“如果他们认为艺术（此处主要指音乐艺术）是系在‘严肃生活’上无足轻重的风铃的话——见到我如此认真地对待一个审美问题，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我应该告知读者，艺术乃是人类所认识的人生的最高使命及其真正的形而上的活动，现在我把这篇文献给他们——我在这条路上的崇高的战友们。”对音乐家如此彻彻底底地“唱高调、戴高帽”，很难在汉语世界看到。延拓到当代西方音乐界，尤其是不被国人熟知的民谣、摇滚领域（笔者统称白人音乐），Beatles（“披头士”译法略带贬义，知识界对音乐人看法可窥一斑），Woodstock, Bob Dylan 等一连串伟大名字背后所蕴含的巨大生力是千百年来日夜流淌在西人血液中的批判精神所赋予的，她直接同文明母体接通，输送古而弥笃之精神价值与滋养，混合时代特征元素，产生化合反应生成雷霆万钧之力，驱动社会革新和政治重构。此等汹涌的时代暗流乃音乐家杰作无疑，限于篇幅不再赘述。问题是音乐为何能有如此神力？在我们看来这种关联理应十分可笑，试想历史上某某变法是假音乐

之力推动的，谁会信？但在洋人那儿却是另一番景象。

是不是说汉人音乐注定安寝末流，音乐家注定“花自飘零水自流”呢？也许这个命题本身就错了，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贝多芬不仅属于德意志更属于全人类，凤凰传奇不仅属于“农村重金属”更属于“世界重金属”。当然不能简单地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弥合两者的异质性，但是音乐以其独特的包容力和感染力俨然成了一种“世界语”，远隔重洋，也能沟通无限。所以对我们而言，大可多多涉猎外邦作品，要知道现代西方流行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jazz, blues 等音乐形式，强调节奏的多样性，其主要灵感来源于黑人音乐，和白人没太大关系。可现在却被白人音乐收归一统，可见咱们汉人大可不必为“不堪”的过去黯然神伤，妄自菲薄，吸收借鉴外邦音乐特长，最终可为自己所用。凤凰传奇在这方面做了表率，“神曲”——最炫民族风——大有“一统江湖”之势，所到之处从者如流，蔚为大观。我们是否能隐隐在她们的乐曲中听出一丝蒙人长调的遗音呢？

胡言乱语，急就章，且写到这里吧。

（责任编辑：武亚宁）

◎有龙则灵



陈安龙*

其实从来没有过那么温情的雨，从来没有过那么灿烂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过那么壮怀激烈的青春！大雨过后太阳照常升起，但曾经的纯真爱情，曾经的理想与激情，曾经萌动的青春岁月，都伴随着新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彻底湮没了。

最近纷繁复杂的琐事让我感觉这个夏日尤其的令人焦躁不安。听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那

* 陈安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虽漫不经心却触动心弦的画外音，心似乎一下子又静了下来。

阳光灿烂的日子见证了青春的躁动和叛逆，见证了青春的蜕变与成长。但灿烂的阳光下却透着丝丝的凉意，直透心底，我们的青春似乎注定无处安放，那曾经为之热血追逐的理想早已在心底埋葬。

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中间，这部电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具有梦幻色彩和青春荷尔蒙气味的成长故事，一个同样是有冲动、有爱情、有性、有幼稚、有失败、有冒险、也有成长的青春故事……

而这个看上去阳光灿烂的成长故事却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展开。上世纪70年代初的北京，忙着“闹革命”大人无空理会小孩，加上学校停课无事可做，以军队大院男孩为突出代表的少年人便自找乐子，靠起哄、打架、闹事、拍婆子等方式挥霍过量的荷尔蒙。外面的世界正闹得天翻地覆时，他们却在自己的天地中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迷上了钥匙并开始制造它们，先是把自己家的各种锁一一打开，偷看大人的秘密，后来又发展到未经邀请的去开别人家的锁。每当锁舌铛的一声跳开，我便陷入无限的欣喜之中。这种感觉只有二战中攻占柏林的苏联红军战士才

能体会到。”这就是马小军，像文革中的很多孩子一样，心中有一股浓浓的英雄主义的理想情结。攻克柏林的苏联红军、《列宁在1918》中的瓦西里，想象中克里姆林宫，哼唱着的《英雄赞歌》，这些东西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他讨厌无聊的课堂，喜欢从一个屋顶转到另一个屋顶，从一间房溜到另一间房。兄弟有难时，该出手时就出手，用暴力解决所有问题，用板砖证明自己的英勇和荣耀。实在太无聊了，跟朋友聚在一起相互的吹嘘，用谎言把自己扮成一个和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胆大妄为的暴徒，极尽夸大渲染之能事。或者只是对着镜子强力吐槽，发泄心中的欲望和激情。还有啤酒、老莫、香烟、武斗和内参片……日子就这样在耀眼的阳光下一天一天过去，直到米兰的出现，彻底打破了马小军内心的平衡。

马斯卡尼的旋律下，马小军游荡在那栋楼的周围，焦躁不安、披星戴月地守候着梦中女神的出现，整个人就像丢掉魂魄似的恍恍惚惚。在那个经典的把玩望远镜的场景中，米兰那张彩色照片中的形象始终在马小军心中挥之不去。他对照片中的女主人公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爱恋，他静静地趴在米兰的床上，捡起一根发丝，迎着满盈的阳光仔细端详。这是一种纯洁的感情，

他圣洁的目光和小翼翼的动作说明了他对这份感情的重视。而之后在与米兰的交往中，马小军也逐渐从青涩的懵懂逐渐蜕变成长。那张米兰的照片也奇迹般的由彩色变成了黑白。

对米兰的那份纯洁的情感使马小军经历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段记忆似乎定格在了昏黄的阳光下马小军骑着单车送米兰回农场的画面中。“那是我一生中美好的一天，晨风的抚摸使我一阵阵起了鸡皮疙瘩，周身发麻。”但这么美好的一段记忆却总是伴随着一股烧荒草的味道，可是大夏天哪来的荒草呢？而马小军与米兰在电影中唯一一次令人欣慰的拥抱也让人感觉是那样的不真实。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第一次下起了瓢泼大雨，马小军与米兰在雨中相拥。两人似乎终于要上演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经典桥段，但是雨过天晴后米兰依旧在和刘忆苦打情骂俏的现实，证明了马小军的幻想真的只是一厢情愿。而之后生日宴会上与刘忆苦的拼杀也只是马小军自己的幻想。其实从来没有过那么温情的雨，从来没有过那么灿烂的阳光，也从来没有过那么壮怀激烈的青春！大雨过后太阳照常升起，但曾经的纯真爱情，曾经的理想与激情，曾经萌动的青春岁月，都伴随着新

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彻底湮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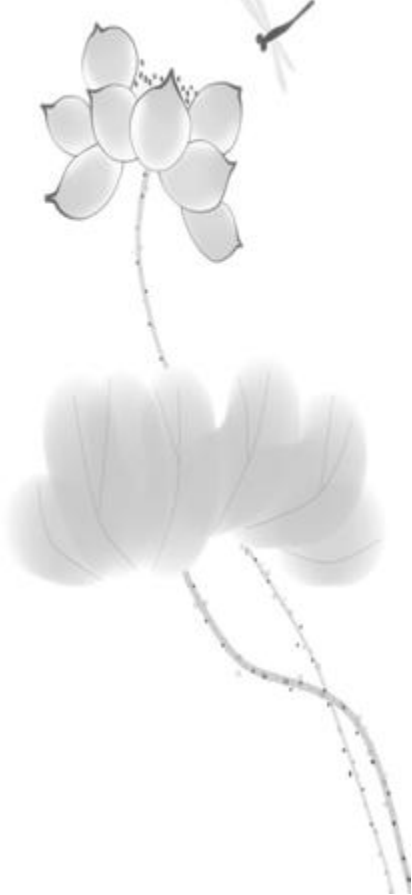
马小军与米兰这段温暖、暧昧、甜美却最终苦涩的回忆让讲故事的人总是不由自主的把事实与幻觉搅到一起。“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实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的头脑混乱，真伪难辨。”“我现在怀疑跟米兰第一次相识就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再马路上遇到过她。我和米兰根本就不熟，米兰是照片上那个女孩吗？还有刘北蓓，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或许她们俩原本就是同一个人。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却变成了谎言。”

曾经的期许像一个泡沫，虽然五彩斑斓，却终究幻化了。姜文的记忆终结于一个富含隐喻的场景，马斯卡尼的音乐声中，马小军想从水中爬到岸上，水中挣扎的他，得到的是众人的俯视和脚踩，一次次的徒劳的努力让他最终放弃了，如死尸一般随波逐流。

回忆结束了，回到现实了。颜色却从流彩的黄色变成了黑白。承载着记忆黄色让人温暖感慨，正在行进的现实反而冰冷低调。那个

依旧骑着扫把的傻子在最后的出现中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傻 b！”他是在嘲笑他那群开着凯迪拉克，功成名就却早已埋葬理想的朋友吗？！心有戚戚焉，不过也许理想还在，只是被我们一不小心弄丢了。我们需要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把那些遗落的理想找回来。一切都没那么难，只要自己漫步徐行，冰冷的黑白生活总会被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取代！

（责任编辑：许子兰）





专题：“中国—白俄罗斯关系二十年”研讨会

值此中国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建交二十周年之际，我国首个以白俄罗斯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于4月27日在学院成立。当天下午的揭牌仪式结束后，就中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展望举行了首场研讨会。我国原驻白俄罗斯大使鲁桂成、政务参赞王宪举、武官殷卫国以及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历史学系克拉苏林（音）副教授分别作了专题报告。第二场研讨会在5月4日下午进行，贝文力老师首先做了主题发言。

鲁桂成大使：中白关系的特点

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正确的、及时的。

首先，白俄罗斯值得研究。白俄罗斯自然风光好、环境优美；白俄罗斯人民向往和平、严于律己，对客人热情；白俄罗斯的国情值得研究。

其次，中白关系值得研究。我自己在白俄罗斯工作了三年零三个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中白关系有下列特点：中白

政治互信强，白俄罗斯信赖中国；中白两国在国际上的关系很“铁”，立场一致；中白合作的互补性强，经贸发展迅猛；中白关系的潜力大，现阶段我国的资金、设备、现代化管理经验都与白俄有互补性，白俄企业需要现代化。另外，还存在两国首都间未实现直航、在白俄吃不到中餐等问题。





王宪举参赞：中白建交二十年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我在白俄罗斯工作了六年，在此为大家提供一点背景资料。

白俄罗斯地理位置很重要，它位于欧洲的中心，在地缘政治及战略地位上有重要作用。历史上拿破仑军队曾惨败于此，《布列斯特和约》在白俄签署；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俄国的第一枪在布列斯特要塞打响；1991年12月8日，关于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在白俄签订。苏联或俄罗斯与欧盟在白俄展开争夺和较量。

苏联或俄罗斯与欧盟在白俄展开争夺和较量。

白俄是我国的“铁哥们”，是我们的“铁票仓”。在联合国关于中国的重大问题如台湾、西藏、人权、奥运会等问题都与中国站在一边。中白互访密切。中国进口白俄的钾肥，白俄是世界上第三大钾肥出口国。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访问白俄时向白俄提供了十亿美元贷款。两国还轮流举办了文化交流活动，白俄已建立了两所孔子学院，许多高校开设了汉语课程。

白俄很独特。白俄罗斯为什么姓“白”？关于“白”字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说，白俄罗斯民族爱穿白色服装，崇尚白色；一说，“白”指干净，为白俄罗斯人所崇尚；一说，“白”指白俄罗斯民族的纯洁性，他们属东斯拉夫民族，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后代占领过俄罗斯，但没有占领白俄。

“一白二绿三美”，白俄罗斯姑娘温柔善良勤劳，受教育程度高。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曾宣布“禁止白俄罗斯姑娘出国”，他认为白俄美女是白俄的战略资源。

目前中白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2014年白俄将举行国际冰球锦标赛，中国承建白俄机场，但在执行协定中存有问题且至今仍未解决；中国工厂在白俄砍伐树木，遭到白俄抗议；在白俄建北京饭店一事也有砍伐树木的问题而遭到白俄人民反对。

我国对白俄的了解不够，对白俄的重视不够。比如说，白俄七月份的巴扎国际艺术节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但我国很少派代表参加。所以，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必要的。



殷卫国武官：中白军事安全合作关系的政治意义

中白两国军事安全合作的主要方面是“军警特宪”，涉及十个大的政府部门、六大方面。1993年，由中央军委任命的武官处在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成立，武官的交接工作是在驻在国进行的，不同于外交官在本国进行交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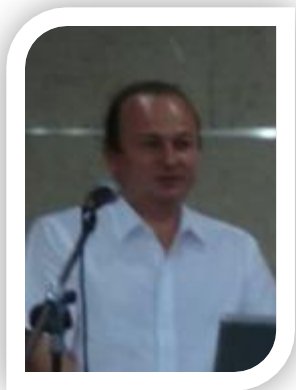
中白两军关系的特点：高层接触密切，沟通频繁，互访多；多层次，宽领域，

多种方式；两国军事院校交往密切。

中白军际合作：我国1995年起从俄罗斯、1996年起从白俄罗斯引进先进的武器装备。中白警务部门的合作：2004年签署《警务合作协议》，2005年起正式合作，2007年建立了两国首都警务合作关系。2008年建立了两国卫队部门的合作。另外，白俄紧急情况部与我国消防局建立了交流合作。

中白两国军事安全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第一，它向外界发出了政治信号：中国支持白俄总统和人民，尊重其主权独立。白俄正受着美欧其他国家的政治挤压和渗透。第二，中白的传统友好关系需要继承。第三，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为两国安全利益带来了实在成果：中国的军事人员白俄军事学院进行培训，两军联合研制武器，相互借鉴经验等。

关于两国军事安全合作的特点，我引用两句话来结束：一句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2005年所说——“白俄对中国来说无秘密可言”，一句是我国对此的回应——“中国是大国，我国做什么事也不用看别人的眼光行事”。



克拉苏林（音）教授：白俄罗斯历史当代研究：主要研究课题和流派（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白俄罗斯共和国获得独立为白俄罗斯民族以及白俄罗斯历史科学揭开了新的前景。20世纪80年代白俄罗斯史学家做研究时使用的档案、考古和文化学资料与苏联时期官方的说法是相矛盾的。90年代社会政治的变化为白俄罗斯历史新观念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白俄罗斯

民族的历史。

90年代下半期到21世纪初，白俄罗斯国内史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形成了更接近实质的现代历史知识的地区国家概念。现代白俄罗斯历史学派的特点是：在评论上具有相对的矜持性，对很多国家历史问题的评价和定性更倾向于妥协。在关于白俄罗斯国家体制形成问题上，这种温和的方法特别明显。

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白俄罗斯和历史学界发生的变化都是具有全球性的。尽管争论仍在继续，但白俄罗斯国内的历史新观点已经对白俄罗斯人的自我认识以及他们对历史过程和白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评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贝文力副教授：白俄罗斯的“宽容性”与“联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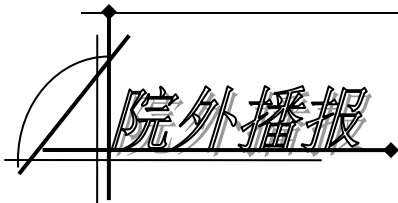
白俄罗斯位于欧洲的中心，自古以来东西部文明在此交汇、对立、冲撞。为了能顺利地生存发展，白俄罗斯人需要理解和结合各种文明，维持各种力量的平衡，这构成了白俄罗斯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宽容性的基础。白俄罗斯人始终宽容地对待其他民族，没有“特殊民族”、“优等民族”的意识，没有要在确定和实现世界发展目标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欲望。白俄罗斯从未发生过因民族和宗教原因

大规模移民的现象，相反，这里经常是其他国家受迫害人士的避难所。宽容性使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能在白俄罗斯和谐并存。

与宽容性相连的是“联盟性”。联盟能够为白俄罗斯生存发展提供保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白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首先是关于缔结联盟或者就联盟条件进行谈判的文化。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白俄罗斯是唯一将俄语与白俄罗斯语共同定为国语的国家。白俄两国全方位密切合作，同时，白俄罗斯在内外政策上高度独立，不听命于莫斯科，更反对以联邦主体的身份并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希望与所有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卢卡申科多次用“我们几乎是同一民族”来强调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波兰在历史、文化、宗教上的相同相融关系。

（责任编辑：曾乔圆）





中山大学举行“西方宪政民主发轫期的思想与人物”学术研讨会

2012年4月15—16日，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西方宪政民主发轫期的思想与人物”学术研讨会。

会议着眼于西方早期近代面临的“建国”与“限权”这个双重主题，对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托克维尔、卢梭、康德、柏克等理论家的政治思想、美国革命与美国立宪的宗教及政体选择维度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还从西方早期近代的政治理论出发，对现代性与现代宪政秩序的基础、政治法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等问题进行激烈交锋。

（来源：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网站）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讨会

2012年4月16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文化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大学、察哈尔学会、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文汇报》、《解放日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机遇、新使命、新途径及上海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和思考等问题展开交流和研讨。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综述

为迎接即将于2012年6月20—22日举行的里约20周年峰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于2012年4月17—18日合作举办了“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环境和科学协会、印度包容性增长委员会、英国和巴西外交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气象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里约 20 周年可持续发展峰会前的评估、绿色发展的关键议题和创新全球可持续治理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第七届清华国际安全论坛

2012 年 4 月 21 日上午，第七届清华国际安全论坛在紫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以“中国外交改革与调整”为研讨主题，邀请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着重讨论了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的改革与调整问题，三位专家结合当前的南海问题和中国不结盟问题分析讨论了中国外交改革与调整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来源：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网站）

第三届“国际事务中的欧洲联盟”（EUIA）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由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VUB-IES）、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UNU-CRIS）、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ULB-IEE）和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事务中的欧洲联盟”（EUIA）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科学院举行。本次会议议题涵盖“欧盟深入的贸易议程”、“欧盟对外决策制定”、“欧盟与财政危机”、“欧洲议会及其国际行为能力”、“欧盟的全球行为体能力”、“欧盟与中国”、“欧盟与国际组织”、“欧盟与国际维和”以及“欧盟与地区安全”等 39 个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各领域专家围绕“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局势”、“欧债危机”和“欧洲银行业规制”等热门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来源：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中央党校举办首届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

2012 年 5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梁言顺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中央党校、新华社、国

际关系学院、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共包括四个议题：国际格局变动与中国国际战略选择；亚太格局变动与中国周边战略构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与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新形势下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

（来源：国际战略研究所网站）

复旦大学举行“转型中的欧洲：法国大选后的欧洲政治发展”小型研讨会

2012 年 5 月 12 日下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举行第一期小型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转型中的欧洲：法国大选后的欧洲政治发展”，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法国大选、政府变更与欧洲政治转向”、“欧洲债务危机的现状与趋势”、“欧洲社会政策改革与民众抗议”、“政治变动、债务危机与欧洲一体化发展”及“欧洲外交与中欧关系”五个方面论题展开了研讨。

（来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网站）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关院召开“中国海洋战略”研讨会

2012 年 5 月 16 日下午，“中国海洋战略”研讨会在上外召开，该研讨会主要从“安全视角”和“国际法视角”对中国海洋战略进行探讨。

上海政法学院倪乐雄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中民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马嫫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马骏副研究员分别从“南海军事冲突”、“海权与中美关系”以及“战略对冲的潜在政治风险”等角度对影响中国海洋战略的安全因素进行分析。华东政法大学管建强教授、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海洋法研究中心金永明副研究员则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中国南海九段线法律地位定位”、“中国海洋战略与海洋法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刘丹副教授、上海海洋大学储晓琳博士则从“渤海蓬莱 19-3 事故中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问题”和渔业发展与对中国海洋战略发展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角度进行阐述。

（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网站）

（责任编辑：曾乔圆）